谜一样的清明上河图

野岛刚／著
Nojima Tsuyoshi

张惠君／译

謎の名画・清明上河図
北京故宫の至宝、その真実

【精致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NAZONOMEIGA·SEIMEIJOUKAZU by Tsuyoshi Nojima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ensei Publishing Inc.

Traditional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2014 by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SSAP）

This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ensei Publishing Inc.，.

本书译稿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出版

野岛刚（**Nojima Tsuyoshi**）

1968年出生，日本朝日新闻社记者。曾任职于朝日新闻社佐贺支局、西部本社等，2001年起担任驻新加坡特派员。曾赴伊拉克、阿富汗等战地前线采访。其后担任东京本社记者，2007年至2010年担任驻台北特派员，采访报道华人圈的政治、外交、文化等多面向议题，目前担任朝日新闻国际编辑部副部长。著有《伊拉克战争从军记》《银轮的巨人GIANT》《两个故宫的离合》等书。

张惠君

1970年出生，台湾大学政治系毕业，日本东京大学法学政治学研究所硕士。译有《汉尼拔战记》《两个故宫的离合》。

谜一样的清明上河图

【精致版】

謎の名画・清明上河図
北京故宮の至宝、その真実

野岛刚
Nojima Tsuyoshi
/著

张惠君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致中国读者

为了创作《谜一样的清明上河图》这本书，我曾到访河南省开封市和辽宁省沈阳市。

无论从历史上还是地理上来看这两座城市都完全隔离，但因为《清明上河图》这幅画，它们在我心中紧密联结在一起。

访问开封是在2011年秋季。令我吃惊的是，如今开封已与《清明上河图》中所绘之景大相径庭，最初多少抱有些许失望的情绪。

《东京梦华录》中描绘了北宋首都开封的繁荣，那时开封是座当之无愧的梦幻之都。都说中国历史上商业与文化最鼎盛、民间社会最具活力的是北宋时期。而将那个时代一览无余地呈现出来的，正是首都开封。

而现在的开封，在中国只不过是座很普通的地方城市。在地方城市中开封也算不上最有魅力。总体印象是非常不方便。我从东京飞到北京，再从北京飞到郑州，然后乘出租车花上两个半小时总算来到了开封。住宿的开封宾馆（我在中国入住名叫“某某宾馆”的酒店一般都没什么好结果）里暖气基本上不能用，我被冻得瑟瑟发抖，裹在湿冷的被子里将就了一宿。

关于开封城市面貌的变迁，来到开封市博物馆后我终于理解了其中缘由。地处黄河流域的开封城，历史上多次被洪水带来的泥沙掩埋，《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北宋时代的开封，如今长眠于地表之下数十

米处。北宋时期所保留下来的唯一现存建筑物只剩一座被称为“铁塔”的巨大佛塔。登上铁塔俯瞰开封城，果然《清明上河图》中的开封街景已经完全感受不到了。

但是，开封之行并非没有收获。我来到开封市内“清明上河园”主题公园后，此前些许沉闷的心情一下子豁然开朗了。因为该主题公园的正面入口处，屹立着《清明上河图》作者张择端的巨大人物塑像，俯视每一位到场游客。

张择端本人在历史上是否真实存在尚存疑问，史料中的记载比较贫乏，只不过在《清明上河图》结尾处标有他的名字。传于后世的作品除了《清明上河图》，其他一件也没有。倘若他真实存在，也很可能是身份地位不高的职业画工。

在中国绘画史上，北宋是个璀璨的黄金时代。据说中国艺术中“诗书画”三大领域最为重要。一直以来文人若能在这三大领域登峰造极，达到“诗书画”三位一体之境地，就会最受世人敬仰。各时期每一领域的评价已成定论，诗在唐代迎来鼎盛，书法在魏晋五代走上巅峰，而绘画则在宋朝迎来最辉煌时期。宋代相继诞生了许多名留青史的传世之作。

那样一个时代，张择端运用在《清明上河图》中使用的“界画”技法，认真细致、孜孜不倦地持续创作了无数作品。然而，其中大部分估计很可能并未被宫廷收藏，而是让下级官吏们买去，或装饰在酒楼餐馆里了吧。

尽管如此，从北宋时期历经千年沧桑流传至现代的《清明上河图》被誉为中国第一画。上海世博会时中国国家馆内也上映了《会动的清明上河图》以飨世人。

在现代中国被人们树起巨大雕像的北宋画家只有张择端一人，可以

说力压叱咤同一时期的郭熙、巨然、范宽等众多书画名家。由此看来，历史真是一件令人捉摸不透且痛快淋漓的东西，后世究竟发生什么完全无法预料。置身开封街头的我切实感受到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我到访沈阳是2011年冬天。当时中国东北正经历寒潮，沈阳冰天雪地，似乎每呼一口气都要结冰，公营住宅的房檐下挂着许多大白菜。在沈阳期间我品尝到了著名的朝鲜族狗肉火锅，非常美味。

在沈阳的最大收获是采访到有关《清明上河图》真迹的发现者、杨仁恺先生的故事。本书中也有介绍，辛亥革命爆发后溥仪将《清明上河图》从北京紫禁城中带出，临时保存在伪满洲国的首都奉天。但伪满洲国灭亡后该画作下落不明。杨仁恺在沈阳的仓库中发现这幅很可能被人们丢弃并永远遗失的《清明上河图》，挽救了“国宝”。

后来杨仁恺在散失于东北民间的“东北货”中探寻美术品，为此辗转奔波，被称为“国宝鉴定大师”。我到沈阳时杨仁恺先生已经过世，但我采访了许多与杨先生关系颇深的人物，如杨先生的爱徒、辽宁省博物馆前研究院戴立强等人。采访的成果也在本书开头部分进行了详细记述。

如果当年溥仪没从北京紫禁城中拿出这幅《清明上河图》，毫无疑问它肯定会被蒋介石带到台北。伪满洲国对中国来说是段屈辱的历史，但如今国宝《清明上河图》能顺利重返北京故宫，无疑是因为溥仪当年将它带出了北京城。尽管《清明上河图》在近代史中跌宕沉浮，但通过杨仁恺的不懈努力它最终还是留在了大陆。

有句话叫“文物有灵”。这是故宫职员们口口相传的一句话。为保护故宫文物免遭日中战争的炮火硝烟，他们持续10多年搬运转移故宫文物。在转移文物过程中，职员们曾几次遭遇不可思议的状况，只能让人笃信这些文物本身具备超出人类认知能力的神奇“生命力”，自己在危机中躲过一劫。

回顾《清明上河图》的多舛命运，我也不得不认同“文物有灵”这句话。被称为“四度出宫，五度入宫”的《清明上河图》，在宫廷与民间流传辗转，历经无数民间收藏家之手。沈阳之旅让我有幸接触到《清明上河图》神秘历史的一角。

2012年1月至2月间，为纪念日中邦交正常化40周年，北京故宫博物展在日本举行，《清明上河图》首次走出海外，暂借到日本展出。本书恰在这一时期出版。如今有机会在中国大陆翻译出版，我感到非常荣幸。

本书题为《谜一样的清明上河图》，日本和台湾出版后不少读者问为什么称之为“谜”。关于其中缘由希望大家能读读这本书。毫无疑问我也是被《清明上河图》之“谜”所深深吸引的人之一。同时，本书也是揭开谜团的成果，现在仍在一点点地继续努力解“谜”。在本书中，作为一个日本人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解读“中国第一画”之谜？能否为《清明上河图》提供一些新鲜观点？希望诸位在中国美术鉴赏方面独具慧眼的中国读者能做出各自的判断，作为笔者我将感到无上光荣。

最后，感谢为本书在中国出版竭尽全力的日本勉诚出版社冈田林太郎社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各位以及翻译这篇序言的友人孟庆峰先生。从执笔创作本书时起我就梦想着有朝一日让它在《清明上河图》的“故乡”中国大陆上市。这次得以顺利出版，我从心底感到无比喜悦。

野岛刚

2013年12月10日

目录

- 序章 谜一样的名画
  - 谜一样的“天下第一奇画”
  - 画家张择端
  - 每二十三平方公分就有一人的人口密度
  - 《清明上河图》的特殊性
  - 虹桥在哪里
  - 无数的《清明上河图》
  - 《清明上河图》佚失的部分
  - 五度入宫、四度出宫
- 第一章 奇迹的绘画——《清明上河图》
  - 中国美术史的最大发现
  - 因为辛亥革命流到东北
  - 《清明上河图》因北宋灭亡而流出
  - 《金瓶梅》的“亲生父母”是？
  - 权力者追求的《清明上河图》
  - 清代后再入宫廷
  - 从沈阳到北京
- 第二章 散布至全世界的《清明上河图》
  - 世界上的五十件《清明上河图》
  - 三大系统的《清明上河图》
  - “苏州片”量产的《清明上河图》
  - 最后诞生于世的清院本
  - 战后发生的国际真迹争论
  - 饶富趣味的论文巨作
- 第三章 美食之都——开封
  - 孙羊正店
  - 脚店也有正店的等级
  - 宋代的饮食
  - 权力阶级崇尚粗食

    - 宋代的酒
    - 宋代的茶
- 第四章 幸福时代——北宋及大都会开封
    - “梦幻都市”的记录
    - 水运孕育的都市
    - 北宋政治及风流天子
    - 科学技术的发达
    - 九百年后的开封
    - 掩埋的开封再现
- 第五章 体验《清明上河图》
    - 享受“都市体验”的画
    - 从荒郊野外开始
    - 汴河的热闹
    - 最高潮——虹桥渡桥
    - 桥西边的店面
    - 穿过城门的骆驼队伍
    - 俯瞰的角度因地而异
- 第六章 现代生活中的《清明上河图》
    - 会动的《清明上河图》
    - 展现最尖端的科技
    - 诸多未解之谜
    - 来历的趣味
- 结语
- 参考文献

序章 谜一样的名画

《清明上河图》是幅充满谜题的画作，甚至可以这么说：这幅画本身就是一个谜。

究竟在什么时代画出？众说纷纭。

就连作者，也几乎没人知晓他是位什么样的画家。

画的名称是“清明”“上河”，不过大家也不太清楚它的由来典故。

有人说，画作已经佚失掉一半，也有人说，现在的样貌就是完整的作品。

而画作的地点，有人说是北宋的首都开封，但是不知道究竟在开封的哪里。

《清明上河图》在中国历代名画中算是数一数二的名画，也有着“天下第一画”的称号。

可说是国宝中的国宝，名画中的名画。

在接待重要外宾访问中国使用的贵宾室，或者中国高档餐厅等场所，想象一下这些地方墙上挂的画，也许你就会有一点概念。

如果让中国人举例说出一些历史名画，应该很多人会提到《清明上河图》。从这个角度把它形容成“中国的《蒙娜丽莎》”，似乎也很贴

切。

然而关于《清明上河图》，不明白之处实在太多了。

“《清明上河图》受到××时代的画风影响，××将此技法发挥到淋漓尽致，××出生于××年……”这种由美学专家所作的制式解说，与《清明上河图》的本质相去甚远。

谜一样的传说，反而引发人们的兴趣。

诸多未解的谜题，让许许多多专家及研究人员长年投入论战。有关画的时代、画的名称、画的作者、画的历史、画的意义，以及画中描绘的社会、建筑、民俗、饮食等各项细节都有深入的研究，不知不觉中形成了“清明上河学”这样一个跨领域的研究门类。

《清明上河图》有“天下第一画”之称，我认为还可以加上“天下第一奇画”的称号。

《清明上河图》的确是一幅充满谜题的画作。

谜一样的“天下第一奇画”

《清明上河图》是北宋徽宗在位的宣和年间（一一一九—一一二五），宫廷画家张择端描绘北宋首都开封的繁华景象的。现在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严谨地说，北京故宫的《清明上河图》不能百分之百确定是张择端的作品，但大家公认这幅画是真迹。

先从《清明上河图》的名称说起。

清明节是每年春季时的中国传统节日，在这一天到祖先的坟前锄草

祭祀。由于是休息的日子，人们除了去扫墓，还有很多人上街逛逛。《清明上河图》的“清明”，应该是因为描绘某年清明时节的街景而得名。

然而如果是春季，画中却出现许多非春天的场景。有人指出了一些矛盾的地方，例如餐厅门口张贴着宣传秋季才有的“新酒”的“广告”。

除了“清明节由来说”外，也有人倾向于主张这幅作品呈现了徽宗时代天下太平之治的和乐景象，因此命名为“清明”。这是“天下太平由来说”。如果作者真的是宫廷画家张择端的话，用作品命名向皇帝呈递敬意也不是不可能。

还有一个说法是，当时开封有个地方叫“清明坊”，因为是描绘这个地点，所以命名为“清明”，这是“地名由来说”。

描绘的河是“汴河”。开封位于河南，距离黄河不远。河南地处“中原”，这是中华的中心。宋朝称开封为“汴梁”，该图描绘的是汴河的上游，因此称为“上河”，这个说法也广为人们相信。事实上，开封的确位于汴河的上游。

还有一种说法解读“上河”的意义。流经首都开封的汴河，当然是代表宋朝的重要河川，“上河”的“上”字，有着日文“御”字的意味。

也有人认为，“上河”的意思是“去河那边玩”，因为中文的“上”有“去”的意思，即使到现在，在中国到街上去也会说“上街”。

无论是“清明”或是“上河”，作者张择端都没有留下只字片语的说明，每个说法都没有关键的证据，每个说法都讲得通，只能继续议论下去。

画家张择端

到底张择端是个什么样的画家呢？

这里有一个“谜团”未解，那就是这幅《清明上河图》并非张择端的个人作品，而是宫廷画家的集体创作。

《清明上河图》描绘出来的世界丰富多彩，精心刻画众多的人物及建筑物，实在不是一人之力所能负担。

然而，《清明上河图》的真迹，不仅笔触逼真，而且超过五公尺画轴的笔法一致，如果不是出自同一人之手，几乎不可能维持相同的风格，这也经过专家们传统手法的鉴定。

之所以对于这幅画究竟是否出自张择端一人之手抱持怀疑的态度，其中一个原因是几乎找不到有关张择端的公开记录。与这个时代的著名画家郭熙（约一○二三—一○八五）、李唐（一○六六—一一五○）、黄庭坚（一○四五—一一○五）等人相较，他一点名气也没有。

有关张择端相关资讯的唯一线索，只有金朝的官员张著在《清明上河图》记下的题跋。这是在北宋灭亡六十年后，也就是一一八六年清明节的隔天，他是这么写的：

> 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按：今山东省一带）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按向氏《评论图画记》云：《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选入神品……

有人说《西湖争标图》就是现在保存于天津艺术博物馆的《金明池争标图》，不过这完全是推测。这段题跋至少证明了张择端的存在，但对于这个人的生平，谁也不清楚。有人认为张择端不是北宋人，而是南宋人，也有人说他是金朝人，意见不一。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因为张择端出生的年代，代表了《清明上河图》这幅历史名画诞生的年代。

其他的题跋尚有宋徽宗用最擅长的“瘦金体”在画轴的开端写的“清明上河图”五个字。

倘若为真，足可证明张择端是北宋末期的人。然而迄今仍留存的这幅张择端画的《清明上河图》上，并没有宋徽宗的亲笔落款。究竟是在转手的过程中不见了，或者本来就没有，不得而知。

张择端将画作献给宋徽宗，而徽宗是一位风流天子，雅好文艺，邀集多位文学艺术人士，竞相完成优秀的作品。徽宗对于政治没有兴趣，北宋国力孱弱，被金灭亡。徽宗自己也被金人带到北方，后代的历史学家对他因为艺术而亡国，多有批评。

徽宗喜爱书画，留下不少名作，例如《桃鸠图》——这幅华丽中带有质感的花鸟图已被日本指定为国宝。他具有澄透的美感品位，为一般皇帝所不能及。

因为有这样多才多艺的皇帝，艺术文化不可能不兴盛，“翰林院”成为主体重心，也是直属于皇帝的最高艺术学院。

翰林院集合了学者、文人、僧侣、道士、技术人员，扮演皇帝咨询顾问的角色。翰林院始于唐代，到宋代时规模扩大，在徽宗时期人数扩增达数千人之多。张择端是其中一人，负责绘画，《清明上河图》在他的笔下诞生，呈献给徽宗。

然而，这样的“通说”尚有疑点。

北宋时期编纂的《宣和画谱》，可称得上是中国最古老的宫廷收藏目录。

二十卷的画谱，收录了晋代到宋代二百三十一位画家的六千三百九十六幅作品。但是这本《宣和画谱》没有《清明上河图》，也没有张择端的名字。这可让研究人员追溯《清明上河图》来历的时候，伤透脑筋。

因此也有一说认为，在北宋灭亡后，南宋因为怀念北宋而描绘出《清明上河图》。明代著名的文人董其昌就是采这个立场，在其《容台集》中如此写道：

乃南宋人追忆故京之盛，而寓清明繁盛之景，传世者不一，以张择端所作为佳。

董其昌断言的论证为何，并不清楚，然而由此得知，当时的文人阶层普遍认为《清明上河图》是南宋时期的作品。

再者，前面提到张著的题跋，因为张著是金人，也有人由此类推张择端是金人。

然而，如果张择端是南宋人或金人，应该不可能对北宋的京城开封如此熟悉，到金朝时，开封的繁华早已被摧残殆尽，只能完全靠传闻或者记录创作。

《清明上河图》如果不是由见证那个时代的人来画，应当画不出那种逼真的力道。张择端享尽了北宋繁华，亲眼目睹感受那个时代的氛围而创作，这才比较合理吧。

这是许多中国专家目前的普遍观点，我也有同感。

每二十三平方公分就有一人的人口密度

张择端献给宋徽宗的《清明上河图》，是画卷的形式。

在当时北宋文化的绘画表现手法上，画卷是主要的形式。到唐代为止，壁画一直是建筑物装饰品的主流；到了宋代，画卷成为主流。过去由王公贵族独占的艺术文化，在北宋时期大量流入民间，致富的商人或者专业人士开始形成买画的风潮，从这个观点来看，携带方便的画卷也比较便利。

事实上，以画卷的长度而言，《清明上河图》并没有特别地长，当时也有其他更长的画卷。

但是《清明上河图》具有其他绘画所没有的独特个性——那就是登场人物众多。

在画长五百二十八公分、高二十四点八公分的空间内，登场人物超过五百五十人，从画的面积计算“人口密度”的话，大约是每二十三平方公分就画有一人。细致描绘的不只是人物。建筑物、家具、动物、植物、日用品等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涵括在内。六十头家畜、一百栋以上的房屋楼宇、二十多艘大大小小的船只，栩栩如生。令人惊叹的是每个人物、物品、动物都不同，表情、服装、动作、造型都没有重复。简单说，张择端的创作完全没有偷懒。

张择端是“界画”的达人。所谓“界画”是使用“界尺”等特殊工具，正确写实描绘建筑物的技法。张择端活用“界画”，将北宋社会以画的形式留下记录，就像一部百科全书。

我们必须要感谢张择端，中国传统的绘画世界是将风景极尽抽象化，而像《清明上河图》这样极尽具体化的作品，在当时绝非主流。

张择端不带偏见地观察都市，为后世的我们留下宝贵的写实记录。透过张择端之眼的描绘不一定完全反映了那个时代，但至少谁也不能否认他为北宋时期的普罗大众生活，提供了最佳素材。张择端传递了远超

过大量文献所能提供的资讯。

《清明上河图》的特殊性

如果不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很难理解《清明上河图》的特殊性。

北宋的水路交通发达，从江南地区把米粮等丰富的物资大量北运，开封呈现空前的繁荣。市民打破了商业区和住宅区的限制，在空地上有摊贩、街头艺人表演、说书活动，小馆子聚集人潮，无论白天黑夜都有人在喝茶饮酒。在《清明上河图》中，活灵活现地描绘了热闹都市生活的各行各业。

还有装潢得富丽堂皇的大餐厅、小摊挂着“饮子”的招牌卖冷茶、手上拿着剃刀的理发师傅、看着命盘的算命师、当铺、饭馆，生动刻画了开封这个商业城市的活力。

据说当时的开封可以二十四小时自由外出，而唐代的长安则是严格限制夜间外出。北宋已经发展出相当成熟的自由，当时人们称之为“梦幻都城”。

北宋虽然还是封建时代，但显然与唐代大异其趣。根据日本钻研“中国学”的重要学者内藤湖南的说法，中国史至唐代为“中世”，到了宋代就进入了“近世”。在唐代以前，有势力的豪门贵族独占官位，依其个人的意志掌控权力；到了宋代科举制度比较健全，具有实力的地主或商人子弟也可以当官，因此宋代的都市大众文化与消费都显得朝气蓬勃。

张择端深入凝视庶民生活，连社会底层的乞丐和苦力的表情动作都如实描绘。这种超越阶级的视野，在中国文人中相当难得。光是这部

分，《清明上河图》已为现代的我们提供了理解当时社会全貌的珍贵材料。

虹桥在哪里

仔细的绘图当中，提示了诸多的谜题。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位于图画中间最醒目的主体——“虹桥”。

位置正好在中央，把人物的动作表情描绘得最仔细而且十分生动。

虹桥是一座巨大的木造桥，没有支柱，因为看起来像彩虹的形状而得名。桥板是用二十根木材以横木的形式建构而成，以钉和绳加以固定，推测长为二十米，宽八米。就算以现在社会的眼光来看，也是一座不小的桥。

因为没有支柱，也称之为“无脚桥”。这项设计是为了不妨碍水路的行舟往来，在当时，这种木造的建筑技术可说是划时代的创举。这样的“无脚桥”据说是山东省青州来的技术工人所设计，朝廷予以采用，在汴河流域的几处都有架桥。

在虹桥上人来人往，人数多到令人担心会不会把桥给压垮，桥的两侧小摊商家林立，有驻足者，也有人快步疾行过桥到对岸，桥下的汴河，河水潺潺不绝，有插竿者，也有撒网拖网的人。

从创作的角度观之，通常如此写实的绘画很容易让人觉得无趣，但是张择端的笔，画俗事却不俗，笔触富有诗情。在中国绘画进入成熟期的北宋，此画维持了高度的艺术性，达到一流艺术作品的水准。以现代建筑工学来看，画中虹桥的结构是依照正确的比例画出，超高的绘画功力甚至可以作为摹写现代桥梁的参考。

这座虹桥的地点所引发的辩论，是另一个问题。

虹桥的地点，也就是《清明上河图》的地理位置，多数的中国专家主张是在“开封市内东南方”。记录北宋末期开封情形的《东京梦华录》一书中，以“以东水门外七里曰虹桥，其桥无柱，皆以巨木虚架，饰以丹，宛如飞虹……”描述汴河，这段叙述大致与画中的虹桥相符。

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清明上河图》并无特定的地点，这是作者张择端自己凭空想象的地方。伊原弘是研究《清明上河图》的代表性专家，他认为“并不是在开封这个地方，而是开封近郊的一般城市聚落”。而虹桥也是以开封某处的桥梁为对象所画出来的。

总而言之，没有史料记录，每个主张都有其合理性，提出相反意见的也有一番道理，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论战。

无数的《清明上河图》

世上究竟有几张《清明上河图》呢？每个时代都有《清明上河图》的仿本，兼备该时代的特色。

著名的仿本据说有三十张到四十张，如今散落于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美国、欧洲各地。

明代时以江南地区的苏州为中心，画成《清明上河图》。著名画家仇英（约一四九四—一五五二）的仿本颇负盛名。景色不是开封，而是换成苏州。

清朝时五位清宫画院的画家画出清院本的《清明上河图》，现收藏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

这五位画家是陈枚、孙祜、金昆、戴洪、程志道，每位都是当时第一流的画家，在乾隆皇帝时完成（一七三六），参考历代各朝的仿本，集各家之所长，再加上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所没有的明清特殊风俗。这幅作品去除了宋代的风味，强调加深明清的特色。出现的人物超过一千人以上，与其说是震撼力十足，给人的印象反而比较接近极为精致的工艺品。

受到西洋绘画的影响，街道和建筑物均以透视技法作画，其水准可与张择端的版本一较高下。

《清明上河图》佚失的部分

《清明上河图》长五百二十八公分，原本更长，后半部分在某个时代佚失了。这在过去的中国美术专家之间已形成通说。

“预期会有新的发展，却唐突收尾。城门在边界上欠缺平衡，街景才刚开始却就结束，可以想象应该有相当的长度被截断。”研究《清明上河图》的重要学者古原宏伸的著作《中国画卷之研究》中，记录着这段文字。

此外，也有一个叫李东阳的人在明代时写下跋文说长达“二丈”，而五百二十八公分相当于当时的一丈半多，如果说画作没有部分佚失就会出现矛盾的情形，这也是支持佚失说的原因。

另一方面，也有反驳佚失说的看法。

二○一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在早稻田大学聆听北京大学教授杭侃的演讲。杭侃认同的不是佚失说，而是“完整说”。杭侃专研宋代考古学，也是研究《清明上河图》的重要学者，著有《东京梦清明上河图》。

杭侃的看法是“现在的《清明上河图》就是完整的作品”。他的理由是：“仔细观看，画不是突然结束的，借由两棵树遮掩道路而结束，这里应该解读为作者构图的想法。”此外，图画可以分割成“郊外”、“汴河和虹桥”、“热闹街景”三段，以现在的长度结束尚称合理。

对于杭侃的见解，我认为也有一点道理。究竟有无佚失的争论将在本书的第一章及第六章说明，出现这样的“新说法”也显示出《清明上河图》饶富趣味。

五度入宫、四度出宫

《清明上河图》历经的历史也有诸多谜团。

《清明上河图》惊涛骇浪般的历史，中国称之为“五度入宫、四度出宫”，意思是五度进入宫廷，又四度从宫廷流出。

重复着被宫廷收藏、又流出、再回到宫廷的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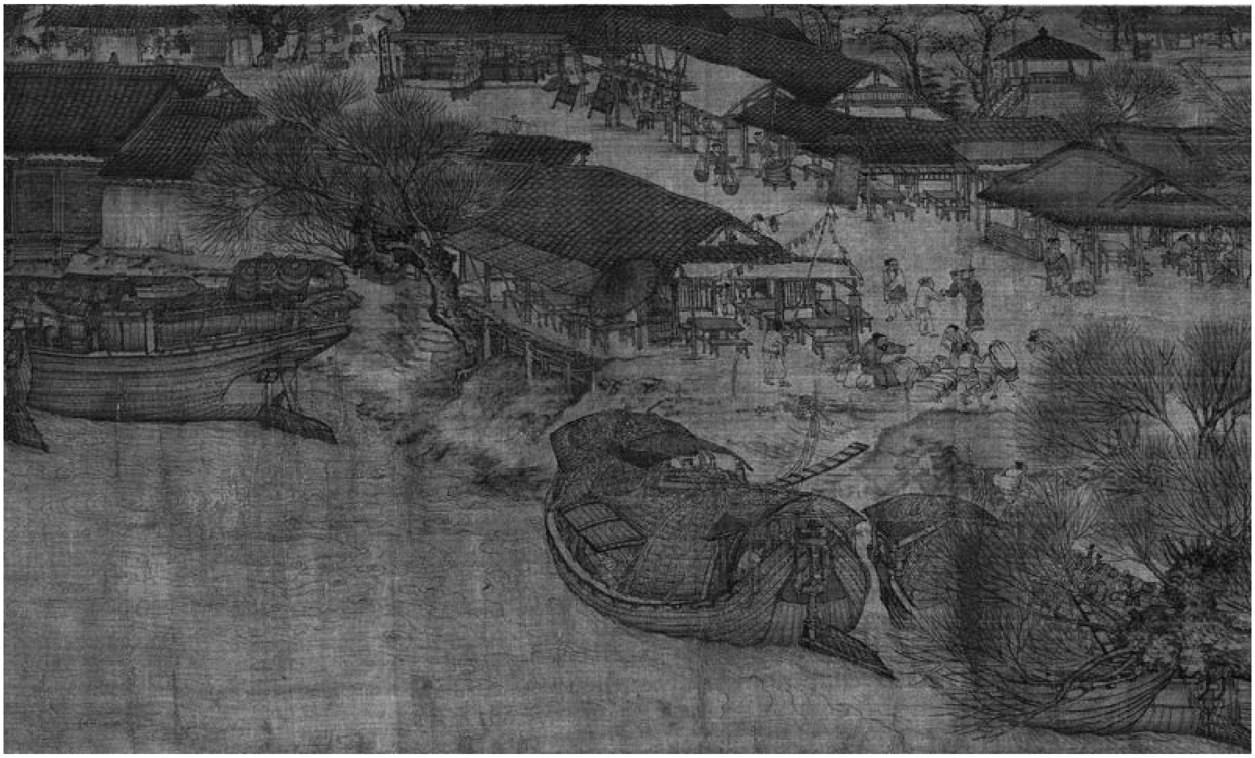
名画会引发人类的欲望，许多名画多多少少都曾卷入麻烦。但是这幅《清明上河图》，遇到的麻烦似乎特别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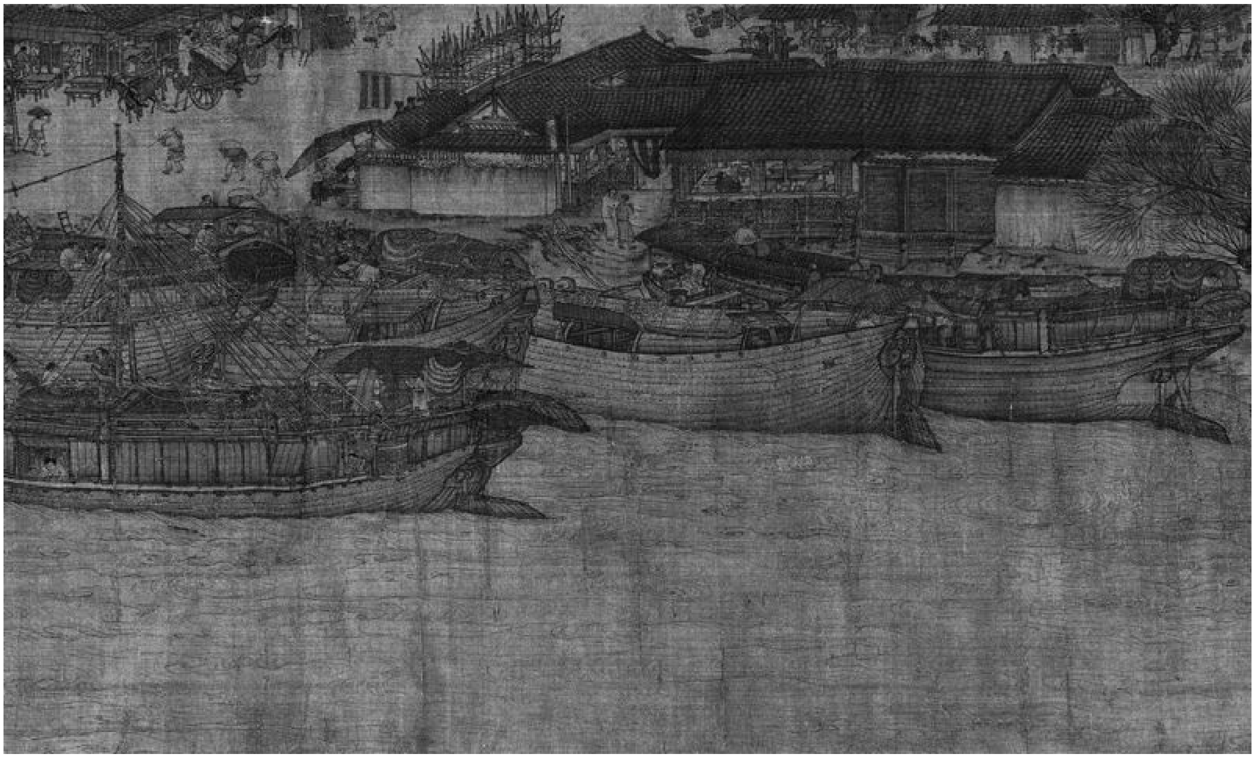
此外，曾经是《清明上河图》拥有者的人当中，有不少人的命运多舛，这也是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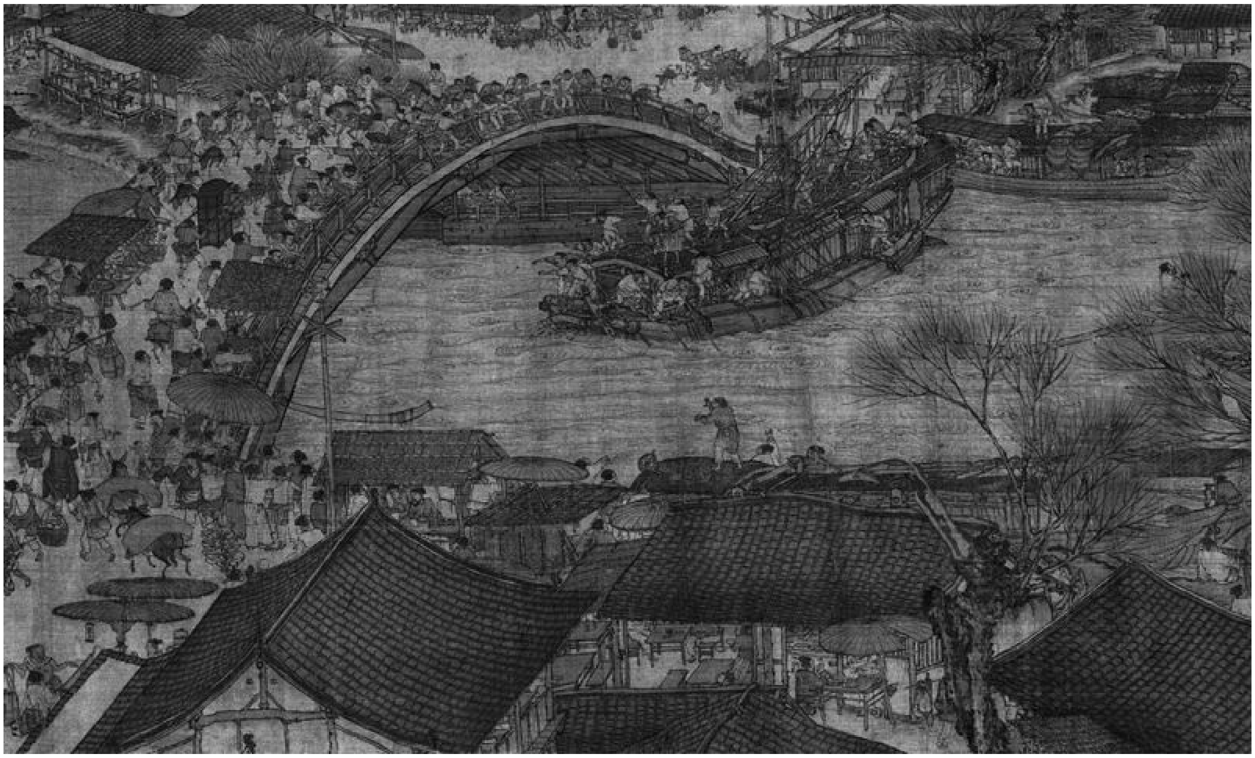
就以时代较近，日本人也相当熟悉的例子来说，清朝末代皇帝、也是伪满洲国皇帝的溥仪遇到很多麻烦，他把《清明上河图》带出紫禁城，运到伪满洲国首都新京（现在的长春）。

伪满洲国灭亡后，溥仪被逮捕，《清明上河图》也在战后的混乱中遗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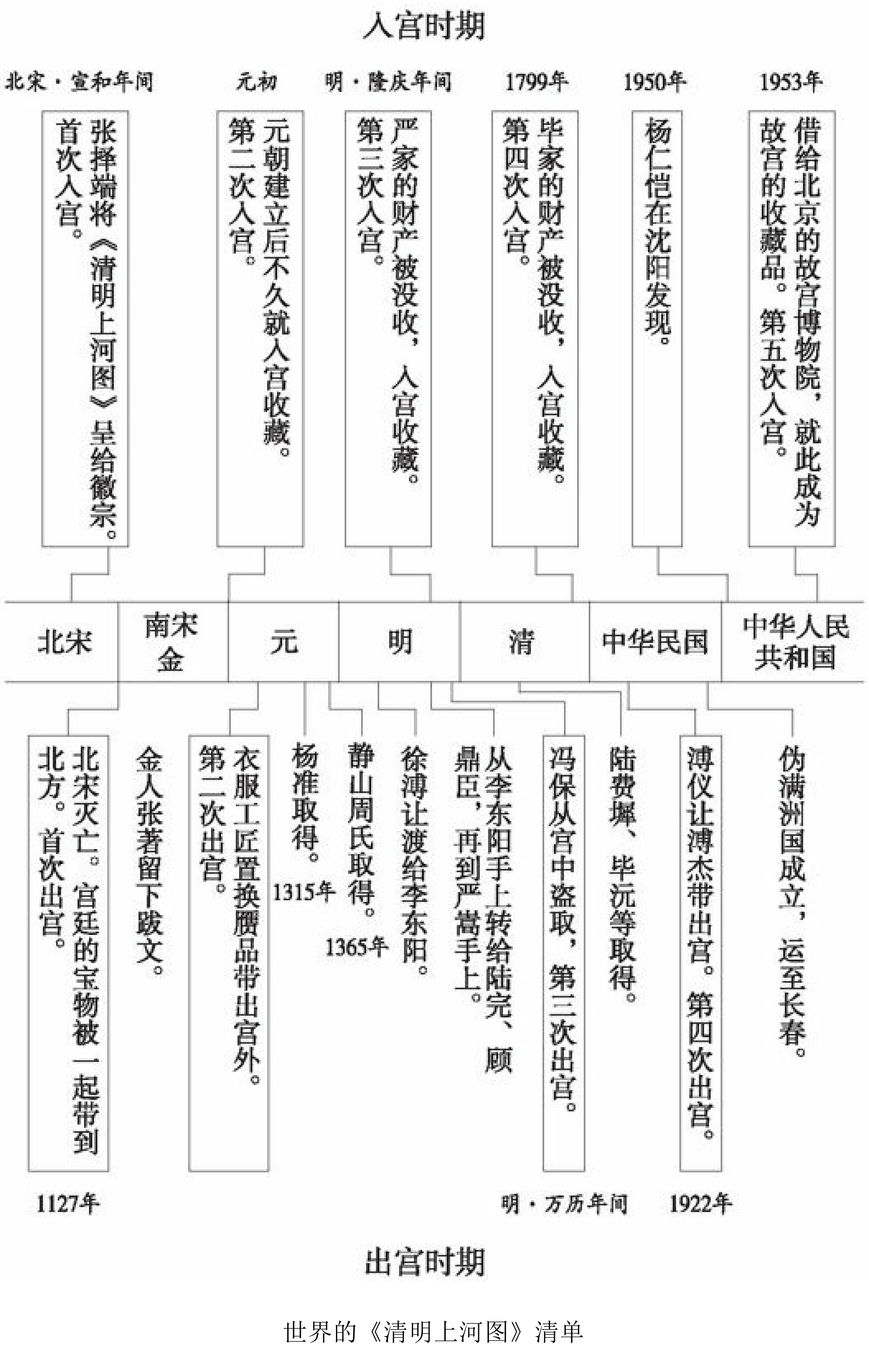
我们就从这个“再度发现”的故事，开始解开《清明上河图》的谜团吧。







《清明上河图》“五度入宫、四度出宫”的历史


入宫时期
北宋·宣和年间
张择端将《清明上河图》呈给徽宗。首次入宫。
元初
元朝建立后不久就入宫收藏。第二次入宫。
明·隆庆年间
严家的财产被没收，入宫收藏。第三次入宫。
1799年
毕家的财产被没收，入宫收藏。第四次入宫。
1950年
杨仁恺在沈阳发现。
1953年
借给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就此成为故宫的收藏品。第五次入宫。
北宋
南宋 金
元
明
清
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北宋灭亡。宫廷的宝物被一起带到北方。首次出宫。
1127年
金人张著留下跋文。
衣服工匠置换赝品带出宫外。第二次出宫。
杨准取得。
1315年
静山周氏取得。
1365年
徐溥让渡给李东阳。
从李东阳手上转给陆完、顾鼎臣，再到严嵩手上。
冯保从宫中盗取，第三次出宫。
明·万历年间
陆费墀、毕沅等取得。
溥仪让溥杰带出宫。第四次出宫。
1922年
伪满洲国成立，运至长春。
出宫时期

世界的《清明上河图》清单

	时代	作　者 （如为仿本，则为模仿对象的时代及作者名）	书　名	收藏者
1	宋	张择端	《清明上河图》（真迹）	北京故宫
2	宋	张择端	《清明上河图》	美国斯坦福大学美术馆
3	宋	张择端	《清明上河图》	大英博物馆
4	宋	张择端	《清明上河图》	大英博物馆
5	宋	张择端	《清明上河图》	大英博物馆
6	宋	张择端	《清明上河图》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7	宋	张择端	《清明上河图》	台北故宫
8	宋	张择端	《清明上河图》	台北故宫
9	宋	张择端	《清明上河图》	辽宁省博物馆
10	宋	张择端	《清明上河图》	日本私人收藏家
11	宋	张择端	《清明上河图》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 （Freer Gallery of Art）
12	元	赵　雍	《清明上河图》	中国台湾兰山千馆
13	明	仇　英	《清明上河图》	日本宫内厅
14	明	仇　英	《清明上河图》（A）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15	明	仇　英	《清明上河图》（B）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16	明	仇　英	《清明上河图》	辽宁省博物馆
17	明	仇　英	《清明上河图》	日本仙台市博物馆

世界的《清明上河图》清单-续表**1**

	时代	作　者 （如为仿本，则为模仿对象的时代及作者名）	书　名	收藏者
18	明	仇　英	《清明上河图》	荷兰阿姆斯特丹博物馆
19	明	仇　英	《清明上河图》	法国契努斯基美术馆（Musée Cernuschi）
20	明	仇　英	《清明上河图》	大英博物馆
21	明	作者不明（仿仇英）	《清明上河图》	北京故宫
22	明	作者不明（仿仇英）	《清明上河图》	北京故宫
23	明	仇　英	《清明上河图》	台北故宫
24	明	仇　英	《清明上河图》	台北故宫
25	明	仇　英	《清明上河图》	台北故宫
26	明	仇　英	《清明上河图》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
27	明	仇　英	《清明上河图》	私人收藏家（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十日拍卖会得票）
28	明	赵　浙	《清明上河图》	日本林原美术馆
29	明	沈　源	《清明上河图》	台北故宫
30	清	罗福（日文）	《清明上河图》	北京故宫
31	清	清院本	《清明上河图》（真迹）	台北故宫
32	清	刘九德	《清明上河图》	?
33	清	谢　遂	《清明上河图》	?
34	明	作者不明	《清明上河图》复制本	?

世界的《清明上河图》清单-续表**2**

	时代	作　者 （如为仿本，则为模仿对象的时代及作者名）	书　名	收藏者
35	?	白云堂	《清明上河图》	中国台湾翁氏
36	明	仇　英	《清明上河图》	日本大仓集古馆
37	明	夏　芷	《清明上河图》	日本筑波山神社
38	?	?	《清明上河图》	日本冈山县妙觉寺
39	宋	张择端	《清明上河图》	?
40	宋	张择端	《清明上河图》	美国芝加哥私人收藏家
41	宋	张择端	《清明上河图》	日本京都中西家
42	明	仇　英	《清明上河图》	日本大阪滨地家
43	明	钱　谷	《清明上河图》	台北私人收藏家
44	清	柳里恭	《清明上河图》	日本奈良县立美术馆
45	明	仇　英	《清明上河图》	?
46	明末清初	作者不明	《清明上河图》	北京故宫
47	清	作者不明	《清明上河图》	北京故宫
48	清	作者不明 （仿石涛）	《清明上河图》	北京故宫
49	现代	冯忠莲	《清明上河图》	北京故宫
50	现代	吴子玉	《清明上河图》	吴子玉本人

第一章 奇迹的绘画——《清明上河图》

中国美术史的最大发现

一九五○年八月，沈阳。

沈阳是中国东北的重要都市，伪满洲国时名为“奉天”，也是“后金”的首都，称为“盛京”，由清朝建国以前女真族的努尔哈赤所建立。

位于沈阳市中心东北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的前身，于一九五九年改名）的仓库，年轻的杨仁恺站在这里。杨仁恺后来成为中国代表性的文物鉴定家，有着“人民鉴定家”、“鉴定大师”的称号。

此时杨仁恺的职衔是“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文化处研究室研究员”。

在伪满洲国政府垮台后，从伪满洲国政府流出了大量绘画和陶瓷到市场上，甚至有“东北货”之称。其中有许多赝品或是仿本，当然也有精品中的精品。杨仁恺的工作就是把仓库中的文物一一鉴定，分出真品及赝品。

杨仁恺于一九一五年出生于四川，连大学也没读过，是个小地方的教师。如果没有战争，他可能就在故乡四川终其一生。然而动荡的历史给了杨仁恺不同的人生。

一九四○年代初期，日本军队入侵中国，国民政府迁移到重庆，通过熟人的介绍，杨仁恺开始在出版社工作。在这里担任艺文杂志《说文》月刊的编辑。

考古学者卫聚贤是《说文》的总编辑，他曾参与民国时期多处古迹的挖掘工作，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移居香港，后来搬到台湾。当时在卫聚贤周遭尚有郭沫若、商承祚等重要文化界人士，都与国民政府一起疏散到重庆。杨仁恺负责看稿子，也和这些人熟悉起来，增长了中国美术的相关知识。

担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特别喜爱杨仁恺。当时故宫文物从北京的博物院疏散到中国西部的四川省，马衡也在重庆。杨仁恺从马衡身上学到中国艺术的入门知识，经常浏览宋代、唐代的珍贵古书画。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随即展开国共内战，《说文》也停止发行。杨仁恺为了找工作搬到北京，希望在北京运用他在中国艺术方面的知识，因此他到著名的古董街“琉璃厂”附近的古董店工作，培养鉴识的眼光。后来他自称“我是在琉璃厂大学毕业的”，引以为傲。

一九五○年起移居沈阳，在东北人民政府的文化部任职，善用他的

文物知识。沈阳故宫存有世界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他常常到东北博物馆帮忙整理。

在仓库内，摆在杨仁恺面前有三张几乎相同的画卷，都叫做《清明上河图》，描绘古时候的街道市集，在中国对于绘画多少有点常识的人都听过这幅画的名字。

这幅画的仿本和赝品极多，大家相信真迹已经散佚不见。包括杨仁恺在内，没人会想到真迹就在这里。顶多就是混杂了明代时画的品质比较好的仿本，回流到收藏品较少的博物馆中，没有什么好期待的。

开始鉴定的杨仁恺，打开第一张《清明上河图》。一看就知道是赝品，完全没有价值。

接着鉴定下一张，博物馆内其他同事曾说“说不定是真迹”，果然一眼瞄过就知道是好东西，杨仁恺原本认为是“明代的作品”，但是品质相当好，也有可能是仇英的真迹。先选到“收藏”这一边。

到了最后一张画。之前已经听说“是赝品的可能性很高”，他没有多想就把画摊开，突然背脊感到一阵凉意，脸上露出笑容光彩，不假思索地大叫“就是这个！”

各个时代的中国的绘画具备了各自特色，因为每个时代都有偏好的笔法和颜色。

很明显，眼前这张是宋代的绘画。

在中国，对宋代的绘画评价极高。因为年代久远加上数量稀少，宋代留下的高水准名作被称为中国绘画的最高峰。

当时东北博物馆几乎没有宋代的画，了解宋代绘画的人很少。杨仁

恺因为过去马衡让他鉴赏过许多宋代的画，又在北京的古董街培养了眼力，因此知道手边的作品就是宋代绘画。

“这绝对不是仿本或摹本，这很可能是《清明上河图》的真迹。”

杨仁恺也避免骤下结论，先找到所有能搜寻到的资料，调查张择端所描绘的《清明上河图》。当时应该没有附照片的书籍图鉴，参考的是《东京梦华录》这类的文献资料。

宋代分为北宋和南宋两个时代（第四章将详述）。《清明上河图》是在北宋末期画的。《东京梦华录》记载了居住在北宋首府开封的孟元老，在北宋灭亡后怀念开封的繁华，巨细靡遗地记录下当时开封的样貌，是部非小说类作品。

在这本《东京梦华录》里所描写的开封，有着仓库等和画里一致的地方，引起杨仁恺的注意，这幅画被判定为真迹。

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术史上，可称为“最大发现”的一瞬间。

因为辛亥革命流到东北

为何在东北出现《清明上河图》？得从辛亥革命谈起。

一九一二年清政府倒台，中华民国政府为了避免增加情势的混乱，允许末代皇帝溥仪留在紫禁城宫内。旧宫廷的费用开销相当大，新政府采取限制预算的措施，如果不变卖清朝蓄积了二百七十年的文物，根本没办法维持生活。

眼看前景惨淡，溥仪还是紫禁城主人的期间，就把手上中华文明精华的珍品带出宫外。他也用“恩赐”的名义交给弟弟溥杰，偷偷地一点一

点拿到市面上卖。依据后来发现的《恩赏目录》，至少有一千件以上唐代到清代的贵重字画由溥杰运出去。《目录》中也包括张择端画的《清明上河图》，究竟溥仪是否在知情的状况下将其交给溥杰，尚不得而知。宫中的确收藏了数个版本的《清明上河图》，也交给溥杰几件，其中确实包含真迹。

历史很有意思——如果溥仪当初没有把它带出宫外，《清明上河图》大概就会随着蒋介石在一九四九年到了台湾。《清明上河图》后来被赋予“国宝”的地位，从这个角度看，溥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功臣。

从北京紫禁城运出的《清明上河图》真迹，先到了天津，后来溥仪到伪满洲国当皇帝，又运到伪满洲国的首都新京（现在的长春），收藏在皇宫内。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溥仪携带大量文物想逃亡到日本，但被苏联军队拦下监禁，送到西伯利亚，再转到中国接受思想改造。从一九四五年直到杨仁恺一九五○年在沈阳发现真迹的这段时间，谁也不知道《清明上河图》遭遇到什么样的命运。这也是这幅画的许多谜团之一。

二○一一年秋天的沈阳，寒流来袭，气温降到零度以下。

为了详细了解杨仁恺“发现”的经过，我来到沈阳。因为杨仁恺已经过世，所以拜访了几位相关人士。

杨仁恺在发现《清明上河图》之后，一举变成名人。从沈阳的辽宁省博物馆职员，晋升为副馆长。退休后也享受终身名誉馆长的待遇，于二○○八年过世。

在辽宁省博物馆，我和师事杨仁恺的人物见面。这天是星期一，博物馆休馆，博物馆的前研究员戴立强正在会客室等着我。

他在博物馆负责裱装工作，个性严谨，谦称自己是一边动手裱装一边学习专业知识，四十几岁以后才获得杨仁恺的肯定，职位晋升为研究人员。

在杨仁恺底下，戴立强负责《清明上河图》、《姑苏繁华图》（徐扬作品）等研究工作，《姑苏繁华图》也是这个博物馆收藏的清代名画。戴立强2010年从博物馆退休。

依据戴立强的说法，从一九四五年伪满洲国倒台到一九五○年杨仁恺“发现”的这五年间，《清明上河图》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推测有以下三种可能性。

第一，溥仪意图逃亡日本，从宫廷带出的好几个行李箱中装有古董和饰品，《清明上河图》也包括在内。溥仪在机场被苏联军队逮捕收押，苏联军队就把《清明上河图》交给当时的东北民主联军（后来并入人民解放军），再移交给东北人民银行保管。

第二，东北地方的人民解放军有位参谋长名叫张克威，他喜爱文物，在长春的市场上偶然买到《清明上河图》，后来寄赠给东北人民银行。

第三，溥仪的随员带着《清明上河图》等文物，后来和溥仪分开，自己逃亡，在大栗子沟这个地方被东北民主联军逮捕，文物被移交给东北人民银行保管。

戴立强说，这三种状况以第一种的可能性最高。但是没有苏联军队的资料，很难查证。

戴立强，摄于中国辽宁省博物馆前（作者摄影）

他笑着说：“我现在没办法确定哪一种状况是真的，每种说法都缺乏关键性的证据，都有弱点，马上就会被反驳。”

无论如何，在那样危险的时期，《清明上河图》被丢掉、烧掉，甚

至不见等都有可能。《清明上河图》逃过一劫，在一九五○年时被杨仁恺找到，避开了永远的“消失”。

杨仁恺对发现《清明上河图》的“伟业”，不太在公开场合提起。

他生前曾在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的专访中直率地说：“溥仪带了三幅《清明上河图》，到底哪一件是真迹，溥仪自己也不清楚，我不过是因为具备经验和知识，所以知道哪幅是真迹。”

杨仁恺的代表著作《国宝沉浮录》中，有关《清明上河图》的叙述很短，让读者有种避重就轻的感觉。

住在沈阳的画家王成，曾经担任杨仁恺的秘书，他说：“他是个具有专业技师气质的人，认为自己只是在做专业的工作，对于周遭的人以特别的眼光看待发现《清明上河图》这件事情，他一点也不觉得高兴。在发现《清明上河图》以后，在东北发掘出堆积如山的古董，他认为这些对于国家的贡献反而比较重要。”如同王成所说，杨仁恺不只是发现了《清明上河图》，他一生都奉献给了发掘“消失的名画”。

中国在革命后，一九五○年代推动反腐败的“三反”“五反”运动，一九六○年代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的风潮，拥有旧宫廷古董将会成为被批斗的对象。运动兴盛时期，企业或个人在革命前偷偷取得的“东北货”，一下子都流到了市面上。

听到这样的消息，杨仁恺以沈阳的博物馆为据点，来回穿梭于长春、营口、天津、锦州等城市，鉴定和收购文物。

因为日本战败后的混乱，伪满洲国士兵进入溥仪居住的伪满洲国宫廷掠夺文物的事情，也广为人知。掠夺者多数住在东北，为了钱就随便抛售文物。当时他的工作就是依据这些信息跑到这些人的家里去制止，说服他们“偷来的是不义之财，还给国家才有道理吧”。

透过这样的方式征集到的文物件数，据说超过一千件。大部分都收藏在辽宁省博物馆，一部分的“绝品”则移送到北京故宫博物院。

辽宁省博物馆收藏品都有编号，从第一号到一三○号都不在博物馆，全都移到故宫等中央级机关。收藏在博物馆的是第一三○号以后的文物。

杨仁恺发现的名作，都是国家一级文物的国宝级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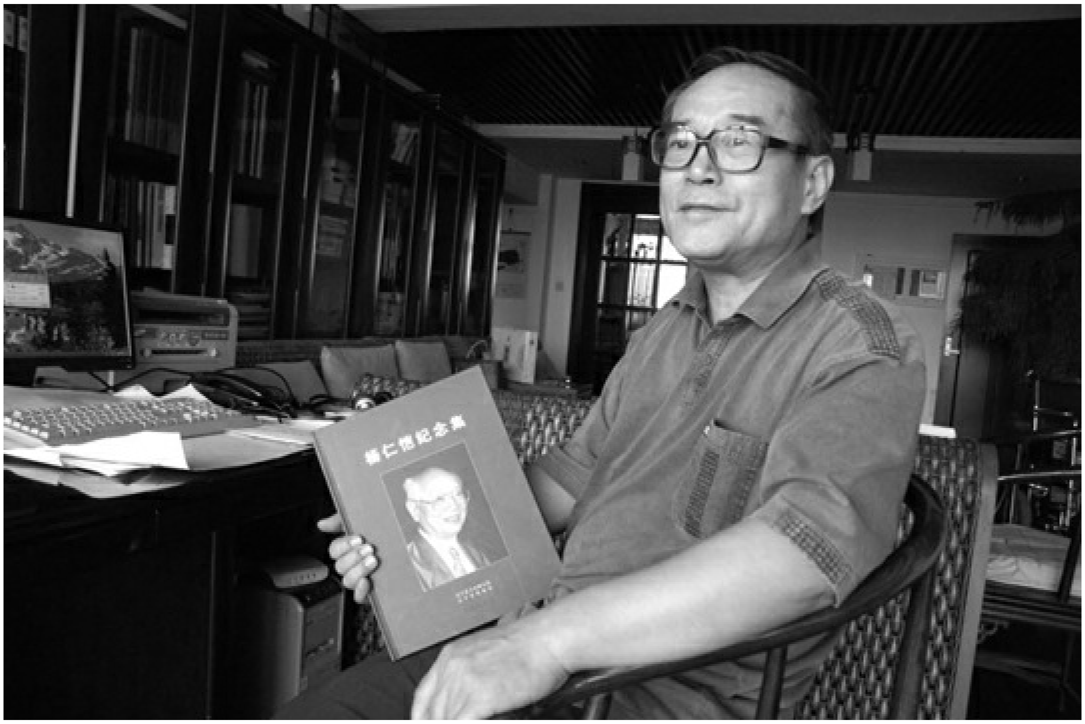
“当时中国各地的博物馆都苦于收集文物，而辽宁省博物馆因杨仁恺搜集到的珍品，显得很有分量。因此北京虎视眈眈，甚至有偷偷被带走的。因为有杨仁恺，北京故宫才能有个博物馆的样子。”王成这么说。

如果没有中日战争，杨仁恺就不会在《说文》工作；如果没有国共内战，他就不会去北京；伪满洲国如果没有倒台，他也不会与《清明上河图》相遇。

从这层意义上看，杨仁恺的人生和发现《清明上河图》，都是中国近代史中动荡的一环。历史、政治、个人的复杂交错，从《清明上河图》这一张画就可以反映出来。

杨仁恺的长子杨健，生于一九四八年，在研究机构的技术部门上班，过去对于父亲的功绩不太关心。当他父亲过世时，见到许多人前来吊唁，才对自己的无知感到丢脸，而将父亲的朋友及同事们寄来的文章集结成一本很厚的纪念集。

在家中和我见面时，杨健说：“我父亲一生都在追寻因为日本投降和伪满洲国倒台而散佚的文物。”他是寻找散佚文物的猎人，捕获的第一件猎物就是《清明上河图》，也是一生中最大的收获。



杨仁恺的长子杨健，摄于沈阳家里（作者摄影）

《清明上河图》因北宋灭亡而流出

杨仁恺发现的《清明上河图》，在一九五三年离开沈阳，移到北京故宫博物院。有关这之后的发展，后面的章节会再提到。

先把时钟的指针调回到《清明上河图》诞生的时间。

在本书序言中，曾经用“五度入宫、四度出宫”这句话来形容《清明上河图》的历史。

一一二七年北宋灭亡，《清明上河图》在开封很可能落入金人之手。这是首次“出宫”。金朝从北宋把人、物、钱等能带的都带到北方去，中国人称此为“靖康之变”。《清明上河图》及其他财宝大概全都运到了金的首都燕京（现在的北京）。

写下跋文的张著，也是官员，但并不是位阶很高的官员。在金朝，张著拥有了这幅描写北宋繁华的《清明上河图》，评价或许并不高。

忽必烈灭金，建立元朝，金人从北宋夺取的文物也由元朝接收。不清楚是在哪个时间点，元朝在建国初期就把《清明上河图》收藏至宫内。此画第一次入宫是张择端呈给宋徽宗，这是第二次“入宫”。

元代时，没机会看到人们欣赏《清明上河图》的样子。这幅画收在宫廷的仓库里，过了一段谁也没看过的日子。

在当时，元朝内务府的“装裱匠”看过这张沉睡在仓库的《清明上河图》，装裱匠是负责裱装书画的专业技师，当时的文人一般都具备品鉴书画的能力，家里都雇用了装裱匠。

这位装裱匠曾经听闻对《清明上河图》的好评，思索着怎么把画夹带出宫，准备了一张假画置换真画，卖掉真迹赚钱。这是第二次“出宫”。

之后，几位元朝人陆续成为这幅画的所有者，包括杭州的陈彦廉、蜀的杨准、静山的周氏。到了明代，画仍在民间流传。历经朱鹤坡、徐溥，在一五一五年左右被李东阳收藏。李东阳是明代中期的人物，年纪轻轻就进士及第，是位知名的政治家和诗人。因为非常向往、喜爱《清明上河图》，他的友人徐溥特别让给了李东阳，李东阳在一五一六年过世，所以是在晚年时达成了心愿。

李东阳在《清明上河图》留下长篇的题跋，详细描述了过去收藏的经过。

在李东阳之后，《清明上河图》转到兵部尚书（国防部部长）陆完手上，后才转卖给江苏的顾鼎臣，他曾任礼部尚书（教育部部长），是位重量级的政治家。

这个时期，明朝有位名叫严嵩的官员，透过道教的祭典取得热衷道教的嘉靖皇帝的信任，展开政治贿赂，握有了权势。他爱好收藏艺术品，也对《清明上河图》很有兴趣。虽然派出“搜索队”到处找，但是没有结果。

这个时候，《清明上河图》在陆完手上。兵部尚书是国防部部长，职位不低，却敌不过以皇帝为靠山的严嵩。陆完被罗织罪名，降职发配到福建，最后离奇死亡。

陆完的妻子王氏，知道丈夫深爱这幅《清明上河图》，将这幅画藏在枕头中，每晚睡在这枕上。

王氏有位外甥知道她握有《清明上河图》，使计希望其能将画让渡给他。外甥一边讨她开心，一边拜托她“让我看一眼就好”。王氏行事谨慎，开出条件说“只能在室内看一下，不准带笔进来”。

但是外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请求看画许多次，把画的内容都记下，完成了仿本。

当时，都御史王忬知道严嵩正在找寻《清明上河图》，为了巴结他，花费白银五百两购入这张仿本，但他以为是真迹，还献给了严嵩。但是严嵩的装裱匠看出这是假画，反而向王忬勒索，但王忬不相信，拒绝了装裱匠的索求。

心中大悦的严嵩开席宴客，并向宾客展示“《清明上河图》”。但是装裱匠却在宾客面前爆料说这幅是赝品，泼水在图画上，洗掉伪装古色的药剂。他指着王忬说，他“把假画当真画送，自己却把真画藏起来”。

王忬后来因为打仗战败而被处死，严嵩终于从顾鼎臣手上拿到真迹。

《金瓶梅》的“亲生父母”是？

这一段比较像是故事，没有百分之百的可信度，也还有其他的版本。

由于严嵩对《清明上河图》的执著，促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名作《金瓶梅》的诞生。

《金瓶梅》是明代的通俗小说，简单说就是今天的情色小说。即使在现代中国，如此露骨地描写性爱也会被列为“禁书”。而作者是谁，迄今仍不明。

依据中国文化史学者中野美代子的说法，故事是这样的：王忬其实手中握有《清明上河图》的真迹，严嵩强要王忬给他，所以王忬制作了仿本，正要呈给严嵩时，被大文豪唐荆川看穿，严嵩大怒便杀死王忬。王忬的儿子王世贞也是有名的文人，为了复仇，锁定唐荆川。

王世贞知道唐荆川读书有个习惯，会用手指沾口水翻页。他花了三年写出《金瓶梅》，并在每一页上涂上毒药。

王世贞派人盯梢，趁唐荆川出门的时间，故意在街角大肆宣传，让他买下《金瓶梅》。他在车上看到忘我，车子抵达家门时已经中毒身亡。这个故事还有其他不同的版本，如果要一一介绍可能没完没了。

依据历史的考证，现在没有人认为王世贞是《金瓶梅》的作者。但是王世贞怨恨严嵩杀害自己的父亲，确是事实，在王世贞的著作中有着不少言辞批判严嵩。

无论如何，因为争夺《清明上河图》而产生的怨恨，甚至有《金瓶梅》的这段故事，极有意思。这两部作品类别完全不同，却都广为普罗大众所知。

同样有趣的是，描写北宋时代民众叛变的《水浒传》，后来又衍生出《金瓶梅》。

在《水浒传》中，武松是在梁山泊揭竿起义的英雄之一。潘金莲嫁给武松的哥哥，却与西门庆通奸因而被杀。《金瓶梅》设定的故事背景是潘金莲没有被杀，和西门庆同居，并牵涉到其他女性，在一个大宅院里每天过着欲望横流的日子。

《水浒传》反映的是《清明上河图》主题——开封城市的繁华背后，民众苦于官僚腐败及重税的压力，描写英雄好汉们揭竿起义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据说是南宋时期写出的《水浒传》与《清明上河图》足以相提并论，它们分别代表了以北宋末期为时代舞台的表里，可说是艺术文化作品的双胞胎。而从《水浒传》衍生出来的《金瓶梅》，在作品诞生的流传故事中还隐藏了关于《清明上河图》的爱怨情仇……

能延伸出如此有意思的传奇故事，也是《清明上河图》的魅力之一。

权力者追求的《清明上河图》

再拉回正题。严嵩失势以后，财产遭没收，造就了《清明上河图》的第三度“入宫”。

应该是收藏在宫内的《清明上河图》，流到一位叫做冯保的宦官手上。冯保是“太监”，这是宦官中的最高层级。入宫等于是皇帝的收藏，但宫中是个魑魅魍魉的世界，在紫禁城内，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冯保怎么到手的经过不详。如果是皇帝的恩赐，冯保应该会在跋文

上大肆炫耀，但是都没有提到。应该是偷窃自宫廷的内务府仓库，这在元朝也曾发生过。

这是没有史料根据的一种民间传说、一段插曲：话说《清明上河图》进入明朝皇宫后，有个小官员要偷出来高价卖出。从仓库盗取出来时，正好有人经过，因此慌慌张张地塞进石头的缝隙中。这时候，不巧遇到倾盆大雨，小官员再把画取出时已经完全湿透，无法修复。后来被发现了，小官员被处以刑罚。

但是这故事背后还有故事——这是偷了《清明上河图》的冯保，故意散布谣言，让周围的人都相信《清明上河图》已经不在这世上了。

如果这件事情为真，冯保可说是位了不起的策士。

在明朝入宫的《清明上河图》，又流向民间，这是第三度“出宫”。

冯保在《清明上河图》的留白部分记下了跋文：

> 余侍御之暇，尝阅图籍，见宋时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诚希世之珍欤，宜珍藏之。

可以想见他当时的心情非常地愉悦。

但是后来作恶多端的冯保被弹劾，和他的侄子死于狱中。从这里看，无论是严嵩或是冯保，这些中国权力者的末路都令人不胜唏嘘。或说这是一个魔咒，只要经手《清明上河图》都会遭逢不幸。溥仪也遇到清朝灭亡，再到东北当“皇帝”也是被消灭。

明末清初，《清明上河图》的去向不明，不知《清明上河图》落入何人手中。

二○一一年十一月撰写本书的最后阶段时，有位中国研究《清明上

河图》的学者朋友，电邮来一个新闻报道的链接。

这个报道的标题是“青年学者尚琼解开‘鹭津如寿’之谜”。

看到“鹭津如寿”这几个字也了解意思的人，算是相当了解《清明上河图》的怪人。在《清明上河图》上，共有十四个人题跋。其中十三人都有署名，只有最后一段跋文只写了“鹭津如寿”，也不知是何方神圣，让考证跋文的学者伤透脑筋。

然而，这段跋文写在明末清初《清明上河图》“失踪”的那段时间。河南省许昌市襄城县的民间艺术爱好者尚琼解开了这个谜。

古时候中国人写跋文，写下自己的名字是以“籍贯+姓名”的形式书写，在《清明上河图》上跋文留有姓名的十三个人，其中有八人是以这样的方式。

但是中国没有“鹭津”这个地名，依据尚琼的调查，福建省的厦门过去曾有“鹭岛”、“鹭门”、“鹭江”等名称，都有“鹭”字，“鹭津”也曾是厦门的别名。

我过去曾在厦门大学留学过一年，读到这篇报道时，突然联想到厦门市有饭店名称是“鹭江酒店”、“鹭岛酒店”，都有“鹭”字。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到底在厦门有没有“如寿”这号人物？考证工作极难。尚琼查了厦门的地方志，发现在明代有位僧侣法号“如寿”——离厦门不远的泉州开元寺，曾有位僧侣叫“如寿”，据说“精通书法”，家住在厦门。

不仅如此，这位如寿其实是明朝遗臣，到最后仍拒绝臣服于清，为了守身而出家。

这段跋文是以楷书书写，笔触非常缜密。在史书上也写如寿“精通楷书”，这一点相当吻合。

依据尚琼的结论，《清明上河图》曾经在如寿这号人物的手上，福建省厦门也是明朝遗臣的最后抵抗地点。

这个说法的可信度，依照通报资讯给我的学者，他认为“相当程度上掌握到关键”。

真相如何尚待日后的验证，民间学者提出具有一定说服力的新说法不断传出，这是中国的深奥之处。

清代后再入宫廷

时间来到清朝的最盛时期乾隆皇帝时代，在历史舞台上暂时销声匿迹的《清明上河图》，又传出消息。这次拥有画的人是浙江桐乡的科举进士陆费墀。

陆费墀是翰林院内负责编纂《四库全书》的负责人，他在《清明上河图》上钤印题跋，临终前致赠给友人毕沅。

毕沅是当时著名的学者，钻研金石学，在有关古代青铜器石刻上的铭文和画像方面，留下许多相关研究业绩，也是清朝的高官。

毕沅有个弟弟名叫毕泷，他是著名的古董收藏家。毕沅得到《清明上河图》以后，曾多次和毕泷一同鉴赏。因此在《清明上河图》上留有这两人的印章，毕沅的印章字体是红色的（阳印），毕泷的印章印出来是用红色为底，字体是空的（阴印）。

毕家一家都是读书人，风光一时，却也和过去其他拥有画的人一

样，因为某个事件被抄家，家产都被清廷没收。《清明上河图》在这个时候收进宫廷的仓库，这是第四度“入宫”。

这时候皇帝是嘉庆皇帝，他非常喜爱《清明上河图》，把它收藏在紫禁城内的延春阁，并收录在《石渠宝笈三编》中。这是《清明上河图》首次登载在官方文件中，并被记录为张择端的真迹。

历经颠沛流离的《清明上河图》，从此在清朝的太平盛世中，成为宫廷的收藏，安然度过一百年。

此后，清朝国力渐露衰败之象，渐渐不平静起来。

一八五六年亚罗号事件引发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在一八六○年侵略北京，占领圆明园并加以破坏，掠夺文物近两万件。之后，在一九○○年义和团运动开始时，日、英、德、法、俄等八国驻守北京，皇宫的设施遭到八国联军的破坏。《清明上河图》因为放在深宫，没被破坏。如果当时被掠夺了，现在应该会收藏在某个欧美的美术馆。

然而这个幸运并不长久。一九一二年清廷倒台，《清明上河图》第四度“出宫”。

前面曾经提到过，在辛亥革命以后，住在紫禁城的溥仪在一九二○年代以“赏赐”名义，把大量的文物交给弟弟溥杰，再运到天津的避难地张园。其中也包括《清明上河图》。张园原本是山西商人所建的宅邸，被赶出紫禁城的溥杰，暂时滞留在此。

伪满洲国成立以后，溥仪当皇帝，把《清明上河图》等文物带到伪满洲国首都新京（现在的长春）的皇宫。严格说来，宫廷的文物都是皇帝的东西，但是辛亥革命以后，已退位的溥仪是否仍有文物的处分权，这个问题十分微妙，从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来看，认定是“偷窃”。

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为止，《清明上河图》一直放在皇宫的书库，这幅画的价值极高，但是并无书面文字记录溥仪对于这幅画的钟爱。伪满洲国垮台后皇宫陷入极度混乱，《清明上河图》也不知去向。

谁也不知道《清明上河图》的真迹何在，直到它出现在杨仁恺的面前。

从沈阳到北京

在沈阳发现的《清明上河图》，一九五三年一月在东北博物馆开放对外展示。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将《清明上河图》向一般民众公开。

展览会的主题是“伟大祖国的古代艺术特别展”，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有这样的展览，也是因为杨仁恺认真搜集“东北货”的成果。

同年（一九五三）十月，《清明上河图》从沈阳运到北京。

《人民日报》报道的标题是“陈列我国隋唐至明清的500件名画”，同时报道北京故宫博物院绘画馆正式开馆。报道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的：

> 此次展览最引人注目的是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及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前者是美丽的构图及配置，描绘生活在农村及城市的人们，丰富的生活型态……

参加绘画馆开幕典礼的是中央人民政府的朱德副主席、郭沫若等知名人士，报道中提到中国著名学者郑振铎说：“《清明上河图》是现实主义的杰作，从郊外的村落到城市街道，陈列南北杂货，生活百态，是一幅最棒的风俗画。”

这里提到的“现实主义”，英文是realism，在社会主义的中国，realism是极为肯定的用法。自此之后，在中国评价《清明上河图》时，经常使用“现实主义”的字眼。

对于否定了资产阶级的新中国，《清明上河图》呈现出“政治正确”的姿态，因为它的主题不是豪奢的宫廷生活，而是生动的庶民生活，这也大大提升了《清明上河图》在中国的地位。

《清明上河图》从东北博物馆借给北京的故宫博物院，不再回到沈阳，这是因为北京故宫不肯放手。

依据戴立强的说法，东北博物馆虽然希望要回来，但这是国家层级的事情，一九五九年《清明上河图》正式成为北京故宫的收藏品。

有关这部分的历史，北京故宫这边几乎没有相关资料，也许是把“借”来的东西变成自己的，在道义上感觉不好意思吧。

北京从沈阳“强夺”《清明上河图》，这也和一九四九年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想发扬国威有关。

北京的故宫博物院成立于一九二五年十月十日，这一天是辛亥革命纪念日，在当时的中国被定为“双十节”。从清宫接收大量文物的中华民国，将其当作“革命的成果”展现给一般大众。在中国历史上，这也是首个现代博物馆，把贵重的古董展示给民众一饱眼福。

但是因为日本侵略东北的情势愈趋紧张，一九三三年故宫文物开始运往上海、南京，到中日战争全面展开后，再运往中国西部的四川省。日本投降后，故宫文物几乎回到南京，本应该再运回北京之际，爆发国共内战，国民政府的蒋介石眼看大势已去，运了三千箱故宫文物到台湾，剩下的在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回到北京。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孙文成立的中华民国算是共产党革命的前奏曲，在达成真正的革命以后，当然要把“革命的成果”更加发扬光大。

北京故宫（作者摄影）

新中国诞生后不久，一九五○年时故宫再度开放。但是实际上博物馆内容是空的，展品的安排有困难。尤其不足的是书法和绘画，这两项在中国艺术上有着崇高地位。书画中水准较佳的大半都被蒋介石带到台湾去了，对北京故宫来说，充实书画的收藏变成当务之急。

在这个情况下，沈阳发现的《清明上河图》变成重要、醒目的展示品。之后每年庆祝新中国成立的国庆日时就拿出来展示，每次都吸引大批观光客。

从东北博物馆接收到的《清明上河图》，保存状态相当恶劣，在北京故宫内引起震惊。这也是无可厚非之事，从四百年前明朝末期以来，这幅画都不曾装裱过，毁损状况十分严重。

所谓的装裱不是只有装框而已，在美术馆而言是同时进行修复作

业。北京故宫第一次为《清明上河图》装裱，于一九七三年进行。

《清明上河图》进入北京故宫的二十年岁月中，“文化大革命”的轻视文物及北京故宫的混乱，都是没有好好维持修复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让中国的文化行政陷入困境。故宫成为“破四旧”（打破旧文化、旧习惯、旧风俗、旧思想）行动的攻击对象，屡屡发生红卫兵挟众“破坏故宫”的事件。幸好共产党的指导总部也不允许故宫遭到破坏，故宫闭馆停止对外开放。

一九六八年红卫兵进驻故宫，在故宫内部设立革命委员会。一九六九年时大部分的故宫职员都被下放到农村，故宫的营运陷入完全停滞的状态。

故宫恢复正常营运是一九七一年。当时北京故宫的第一件任务就是要展开《清明上河图》的修复作业。

此后，有关《清明上河图》并没有发生什么新闻，到了一九九四年，突然宣布把《清明上河图》佚失的后半段成功修复回来，“《清明上河图》恢复全貌”的新闻传遍全中国。

依据当时《人民日报》的报道，辽宁省公安厅有位名叫罗东平的人物，四十岁，自幼喜爱绘画，在一九八五年出版的《中国书画》杂志中读了有关《清明上河图》的介绍，脑中浮现一个想法，想亲手把佚失的画修补回来。

他利用公余闲暇，花了五年的时间，参考《东京梦华录》的敘述而完成。《清明上河图》原长五百二十八公分，罗东平的“完整版”达到一千零八十公分，几乎是原来的两倍。

关于增加的内容，罗东平本人说“现在的《清明上河图》大致分为

郊外、城的外部及城内等三部分。进一步把城内的剩余部分、对面城的外部，加上郊外，这样子形成完整的画”。

至此如果是把它当作奇人异事，不过是一条社会新闻。《人民日报》还这样报道：“十一月二十九日故宫进行品评会获得好评，北京故宫当场纳为收藏品。”北京故宫将它列为国家二级文物，纳入收藏。

中国知名鉴定家徐邦达将这个“完整版”带回家三天，仔细慢慢鉴定的结果，认为“正确再现宋代当时的汴河景色，令人惊叹，值得称许”，大加赞赏。

徐邦达是这个领域的最具权威人士，这样新闻的出现不是茶余饭后的小事而已。但是后来并没有把罗东平的“作品”和张择端的真迹联展的相关信息，可见之后也是不了了之。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清明上河图》活跃的舞台更加广大。二○○二年于上海博物馆展示，二○○四年为纪念辽宁省博物馆的新馆完成，从北京借过去展示。此时“事隔半世纪的衣锦还乡”，轰动一时。

二○○七年香港回归十周年时，也到香港展览。

每一次进场看展的观众都破纪录，在外面排队等候五六个小时的人也成为热门的话题。这些热度更加巩固了这幅画代表中国的地位。这是近十年的《清明上河图》。

解开《清明上河图》的历史，深深感受到一个“文物在移动”的事实。

特别是王朝的衰退、战乱情势等带来的不安定，使得它的移动更有活力。

光是有记录的，就看到开封（北宋）→北京（元）→苏州、杭州等江南地区（明）→北京（明）→厦门？（明）→北京（清）→长春（伪满洲国）→沈阳→北京（现在）。

在这背后所显现的是艺术品和货币、金银一样变成可以搬运的“财”，而且在文化上比金钱更有价值，拥有者还有一项附加价值——可对外证明自身的社会地位。这个附加价值，最难能可贵的就是反映权力者的眼光。

过去的王朝，拥有权势者竞相要取得《清明上河图》。

权力者想要利用文物，因为拥有权力，文物得以继续存在；也有相反的看法认为是人类被文物所操弄。文物的力量是个无底洞，《清明上河图》历经多次磨难且奇迹般地留存下来，全都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第二章 散布至全世界的《清明上河图》

世界上的五十件《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是一座迷宫。

这里先以“张择端是《清明上河图》的作者”为前提来讨论，否则这座迷宫真的会让人困在里面。

第一章的介绍，是从《清明上河图》的诞生到现在的历史为纵轴，第二章的切入观点，将以《清明上河图》散布至全世界为横轴。

美术馆收藏的绘画，通常都被认定为具有一定价值的作品，以“清明上河图”为题的作品在全世界达五十件，另外也有一百件的说法。

依据奈良大学名誉教授古原宏伸的调查，全世界确认有四十一件。此外，中国北京故宫相关人士参与编纂的《清明上河图：珍藏版》（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书，揭示了五十件的清单。古原教授的清单和这份清单，资料多少有些差异。

例如，古原教授的论文是这样论述的：

> 《清明上河图》的现存遗品中，日本有十八件，台北有十三件，纽约有六件，伦敦有四件，芝加哥、洛杉矶、布拉格及北京等地各三件，其他去向不明的有四件，共计四十一件，未来可能会再增加数件。

而依据《清明上河图：珍藏版》的说法：中国大陆有十件、中国台湾有十件、日本有十一件、美国有六件、欧洲有六件、其他去向不明的

有五件。

古原教授的清单中，由于比较容易有管道调查传到日本来的《清明上河图》，因此日本的收藏品数量较多。而清单中的“北京”应解读为大陆，“台北”则是台湾。

因为是中国方面的调查，当然比较容易掌握中国境内的收藏品。什么样的作品可以纳入清单，这是定义问题，所以去追究数量的多寡，意义不大。

比较重要的是，竟然有这么多的《清明上河图》散落在世界各地，遍布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美国、欧洲。

北京故宫收藏的张择端真迹，从九百年前诞生到现在，出现各种各样的复制本、仿本、伪本，描绘了各个时代的样貌，《清明上河图》像洪水一般袭击全球的美术界。

复制本或仿本并非都是直接模仿张择端的作品。张择端的作品从宫廷流入民间，除了持有人以外，有很长的一段时期是任何人都看不到的。但是在这段时间，仍有人持续画出《清明上河图》。

因为没有真迹，就依照复制本描绘，或者靠想象来画。复制本的复制本、再复制本……。每一次的复制都会让画的一部分更为写实，因此把明代、清代的要素也都融入进去。

画卷的形式，以东西向的河流作为主体，描绘两岸繁华的街景。比较夸张地说，只要是符合这样的条件，什么样的画都可能冠上《清明上河图》的名衔。

换言之，与其说《清明上河图》是单一绘画的名称，不如把它想成这是一种绘画的类别，更容易理解。

有这么多以“清明上河图”为题的作品，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与其他坊间的作品，在内容上的差异也很大。

《清明上河图》大致可以区分为三大系统。

第一个系统是张择端的真迹。

第二个系统是明代著名画家仇英画的“仇英本”。仇英是明代画美人画的第一把交椅，也能画风俗画和山水画，是一位全能画家。

第三个系统是清代宫廷画家画的“清院本”。

三大系统的《清明上河图》

无论是古原教授的清单，或是北京故宫的清单，世界上拥有最多《清明上河图》的不是中国大陆，也不是中国台湾，而是日本。

为什么是日本？

任谁都无法理解。

提到东京第一流的饭店，大仓饭店（Hotel Okura）必定名列其中。饭店本馆入口的正对面有一个美术馆“大仓集古馆”，在这里收藏着日本最有名的《清明上河图》。

这间饭店建在赤坂的小山丘上，大仓财团从明治到大正期间，花了一代人的时间盖了大仓喜八郎（一八三七—一九二八）的宅邸。

大仓喜八郎一生都在搜集收藏东洋及日本的古董佚品，他秉持着“古董不应该藏私”的信念，在一九一七年建造了大仓集古馆。

由于是日本首座私人美术馆，开幕时颇获好评。当时日本社会的贵族士绅都会竞相到大仓集古馆来培养审美的眼光。

集古馆在一九二三年关东大地震时发生火灾，于一九二八年再度兴建成现在的中国式建筑。

收藏品主要以东洋艺术为主，包括国宝“普贤菩萨骑象像”。大仓喜八郎的收藏具有独特风格，没有什么专家指导，他对收藏品也没有特殊的偏好，作风豪爽，只要看中的就买下来。

日本东京都港区的大仓集古馆（作者摄影）

此外，大仓喜八郎在收藏古董时，经常惦记着要慎防“流出去”。明治维新后的混乱期，加上明治政府打压佛教的“废佛毁释”运动，从没落的地方诸侯及寺庙神社流出的佛像、佛具，被欧美人士买走带到国外，大仓喜八郎不忍这样的情形一再发生。

中国在一九○○年的义和团运动后陷入混乱，从清朝的皇族和紫禁城流出大量的文物。大仓喜八郎秉持着“为了支那、为了东洋”的想法，买下这些文物保护起来。

大仓集古馆的副主任研究员田中知佐子表示，因为大仓集古馆曾经发生火灾，详细的资料已经烧掉，关于大仓喜八郎买入的古董，什么时候买、向谁买、怎么样的形式等，全部都是一团谜。

但是，田中知佐子提到：“从裱装的外观来看，都是日本风格的东西，应该不是直接从中国买来的，而是很早以前就已经进口，后来才到大仓喜八郎的手上。”

大仓集古馆收藏的《清明上河图》，长六一五公分、宽二八点五公分，和张择端的作品尺寸相仿。这是“仇英本”的系统，可以看出是模仿仇英的作品所画。

关于大仓集古馆的《清明上河图》，战前东洋史学家、也是东京大学教授加藤繁曾在一九四四年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有关仇英的《清明上河图》图卷”。当时几乎没有人写过与《清明上河图》相关的论文，因为这篇论文，不仅让日本，也让全世界知道大仓集古馆收藏了这幅画。

事实上世界上最早有关《清明上河图》的论文是英国人所写，相当令人意外。一九一七年英国学者Arthur Waley针对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清明上河图》的仿本，发表论文*A Chinese Picture* 。

加藤繁写这篇文章之时，正是伪满洲国皇帝溥仪把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带出清宫的时期，加藤繁当然不知道这件事。加藤繁的论文中提到“到清朝乾隆时，张氏的原图早已消失”。

加藤繁还提到“在民间有关仇英及其他明清画家的临摹本还有数种

存在，也有传来我国的，集古馆的收藏是其中一件”。关于这一点，目前并无专家有不同的看法。

此外，加藤繁也抛出问题：“这张图是不是直接模仿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所画出的呢？这里所展现的，究竟是不是北宋末年的东京开封府城内外的光景？”

这里提到的“是不是‘直接模仿’”真的很奇怪。

太仓集古馆的《清明上河图》中，运河沿岸的店铺招牌，写着“发卖棉花行”，店门口放着一个大笼子装满棉花，店家老板正在和上门的客人聊天。

专精中国史及古籍的加藤繁引用许多文献，棉花传到开封一带，应该是元代以后的事情。

此外还有店铺招牌写有“描金漆器”，但专家指出“漆器是在明代宣德以后才在中国开始制造”。

从这些事情来看，《清明上河图》的时代背景不是宋代，而是明代以后的景致。加藤繁下结论认为，这张图极有可能不是直接模仿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

加藤繁成长于战前末期，当时还不知道张择端真迹的去向。加藤繁依据扎实的考证，研究发现这张《清明上河图》与真迹之间的差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现在已广为人知，真迹里没有这些“棉花”、“漆器”招牌，更可证明加藤繁推论之正确。

“苏州片”量产的《清明上河图》

仇英是活跃于十六世纪前叶的明代画家。

当时的中国，在江南地方以苏州等地为中心，古董的赝品充斥市场，尤其苏州是制作赝品的“麦加”，苏州生产的赝品称为“苏州片”。而《清明上河图》是“苏州片”中最好的量产题材。在“苏州片”当中粗制滥造的《清明上河图》，基本上以“仇英版”的系统为最多。

当时张择端的真迹在明朝不同的高官之间不断转手，制作这些赝品的画家很可能根本没有亲眼看过仇英或是张择端的真迹。

仇英版的基本构图和张择端的作品虽然很类似，但是仔细看就会发现不是宋代，如同前面所说的，运用了很多明代才有的主题。

东京大学副教授板仓圣哲是钻研日本东洋美术研究的重要学者，他针对仇英版提出他的看法：

> 有关“郊外”、“河”、“桥”、“市街”的基本结构，和北京故宫博物院本（作者按：即张择端的真迹）相同，但是如果注意细部构图，就会发现其实称不上是仿本。

换言之，仇英版是明代本的《清明上河图》。

在日本还有一件《清明上河图》的重要收藏。这是在冈山市的林原美术馆。在战争前后相当活跃的企业家林原一郎过世时，以其古董收藏为主所设立的美术馆，也收藏了冈山诸侯池田家的传家宝。

这里的《清明上河图》是明代画家赵浙的作品，赵浙的知名度不是很高，这张画上记载着万历五年（一五七七）。制作年代十分明确，也早于“苏州片”大量流通的时期，是一幅评价很好的作品。

笔触很美，也画了很多装饰性的东西。虽然也有针对技法和细微错误的批评，整体而言水准很高。

林原美术馆的《清明上河图》是“绢本设色《清明上河图》”，在一九六三年被日本政府指定为重要“文化财”，也是在日本的《清明上河图》中唯一一件被指定的。

日本文化厅的“国家指定文化财资料库”中，并没有记载指定的理由。后来直接询问林原美术馆，得到的答案是“好像是因为制作年代十分明确的缘故吧”。

这幅《清明上河图》并不是池田家本来的传家宝，而是林原一郎透过古董商买进来的个人收藏。很可能是透过明代时期的贸易往来，传到日本，由某位诸侯或武士收购，在所有权移转的过程中转到林原一郎的手上。

古都奈良的奈良县立美术馆也有《清明上河图》。这一件比较特殊的是在外盒上，有日本人写下的一段文字。

尺寸大约是纵高三十六点七公分，横长为七百九十一点一公分，纸本上色，外盒上写着鉴定者的签名“柳里恭”。

柳里恭是江户中期的文人画家柳泽淇园的别名。但是奈良县立美术馆表示，到底是不是柳泽淇园的作品，依据最近的研究显示仍有疑点。究竟是某位日本人模仿画的，还是柳泽根据从中国传来的仿本画的，目前没有定论。

这幅《清明上河图》本来是奈良县立文化会馆的收藏品，当奈良县立美术馆开馆时，成为该美术馆的收藏品。在这之前谁是收藏者，美术馆并没有记录。美术馆的承办人表示，虽然不是常设的展品，“但可以让申请者以研究名义来阅览”。

此外，在茨城县筑波市的热门景点筑波山神社，也收藏了《清明上河图》。

据说是明代作家夏芷的作品。古原宏伸认为这可能是清初的作品。尺寸是纵高三十二点八公分、横长九百三十九点四公分。

筑波山神社表示，“不清楚本神社当初收藏的缘由”。平常并未对外展示，在该神社发行的图鉴《关东名山筑波山》中，收录有照片。

东北地方也有《清明上河图》，是在宫城县的仙台市博物馆。原来是文学家兼美学家阿部次郎遗留下来的收藏，他是活跃于明治及昭和期间的文人。

阿部死后，在一九七一年时将收藏品寄赠给仙台市博物馆。这幅画也是仇英版的系统，绢本设色，宽三十点九公分。品质不如大仓集古馆和林原美术馆的收藏，也不是常设的展示品。

比较有意思的是阿部次郎收藏《清明上河图》的原因。他对于江户文化有着深入的研究，很可能从关心市井小民文化的角度，欣赏描绘北宋时代一般百姓生活的《清明上河图》。

经询问仙台市博物馆有关阿部次郎取得这幅画的背景，得到的回答是“不太清楚”。

冈山县的古刹妙觉寺所收藏的《清明上河图》，是根据很早以前就传到日本的《清明上河图》仿本，由日本的画家再次模仿画出。

根据古原宏伸的研究，长崎县立美术馆也有《清明上河图》。后来长崎县立美术馆和其他的公共设施合并成长崎历史文化博物馆，经询，该博物馆表示，“本馆的收藏清单中并没有《清明上河图》的名字”。

此外，日本的宫内厅和东京国立博物馆也收藏有《清明上河图》，还有许多是个人的收藏。从东北到关东，再到中国地方（译注：指本州岛西部）等地，《清明上河图》散见于日本全国各地。

虽然都叫《清明上河图》，但是每一件都有细微的差异，甚至可以来个日本各地的《清明上河图》之旅。

只是这些《清明上河图》在各地的馆藏都不是常设性展示，平常不容易看到。可以的话，希望把日本各地的《清明上河图》集合起来举办展览或是研讨会，深入探讨“日本与《清明上河图》”这个主题。

最后诞生于世的清院本

接下来讨论清院本。

最后诞生于世的是清院本，目前收藏于台北故宫。我曾经亲眼看过一次，色彩很美，不觉得是骨画。

到台北故宫，商店贩售着《清明上河图》的相关商品，几乎都是以清院本为制作范本。如果想要购买以张择端真迹为范本的商品，可能会很失望。

台北故宫（作者摄影）

有人会问说，清院本的品质是不是比较差？我认为倒也不尽然，以绘画本身来说并不坏，应该说是可以在历史上留名的作品。

所谓“院本”是宫廷画家的画，“清院本”的意思就是清代宫廷画家的作品。

一七三六年十二月，清朝最盛的乾隆皇帝时期，陈枚、孙祜、金昆、戴洪、程志道等五位宫廷画家合力完成该画，献给乾隆皇帝。

在绢本上着色，纵三十五点六公分、横长一千一百五十二点八公分，相当地长。张择端作品的左端结束的形状很奇怪，因此有人推测有部分缺漏遗失了。清院本为了把左侧剩下的部分补足，加上了开封城中心的宫廷和池塘。

虽然是清代的作品，但是画得很有北宋风味。

例如船的形状，比仇英本更接近张择端的真迹。清院本完成的时期，张择端的真迹应该是流传在民间，或者清代的宫廷内有着相当正确的复制本。

战后初期的台湾代表性文化人董作宾曾写道，“此图乃清明上河图最为工致完美之作，由宣和至乾隆六百二十余年间，可称后来居上。……而其艺术价值，且较张择端原作，有过之而无不及”（“宣和”是指北宋徽宗的时代）。

董作宾不是美术专家，而是以研究甲骨文闻名。在民国时期指挥挖掘殷墟，改写了中国的考古学，一九四九年以后和国民党到台湾，在台湾大学教书。

因为蒋介石的决定，撤退台湾时一起运来故宫文物的珍宝，没有带到张择端的真迹，《清明上河图》只带了清院本。

从艺术的价值来谈，两者有明显区别。清院本的确水准较高，五位画家都是清朝有名的宫廷画家。但是毕竟是从张择端原作衍生出来的作品，这样的地位无法改变。

这幅画和张择端的原作相提并论“并不差”，相对于拥有真迹的北京，台湾这边也出现相对较劲的意思。

台北故宫在一九七七年出版《清明上河图》的图书，以清院本为范本，彩色版面整体介绍画的全貌，作者是那志良这号人物。

对于“那志良是作者”的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有点不协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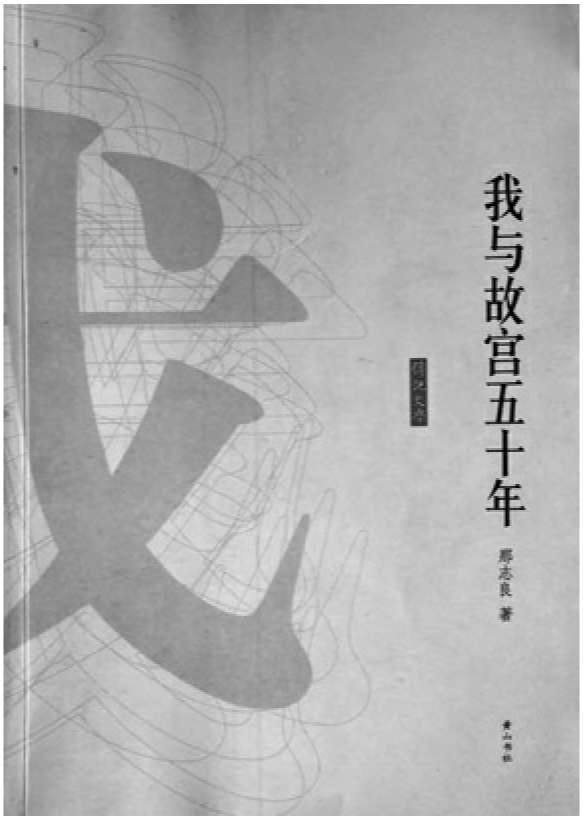
那志良是满人，在北京故宫一九二五年开馆之际就开始在这里工作，当时只有十七岁。之后因为中日战争，文物到上海、南京避难，战局情势恶化后又运到四川省，他与文物一起行动。一九四九年文物运到

台湾时，他也一起横渡台湾海峡，在台湾终老，度过传奇的一生。

他被称为“老故宫”，留下多部与故宫历史相关的著作，如《故宫四十年》、《我与故宫五十年》等。无论是在台湾或是大陆，那志良无疑是故宫的职员中最有名的一号人物。日本历史作家儿岛襄描写中日战争的大作《日中战争》，那志良也是卷入历史大风大浪的主人翁之一。

请这位那志良写书，或者可能是台北故宫的政治判断。那志良是玉器的专家，也有专书著作，对于绘画应该是不甚熟悉。

究竟什么目的，我们不得而知。那志良所写的《清明上河图》一书，张择端的名字误缮为“张端择”，实在很难想象这是出自专家的著作。



那志良著，《我与故宫五十年》书影

在这本书中，那志良以清院本为题材撰写《北京的风物》，实际上却没有描写特定的地点。还故意强调首都“北京”，令人觉得是要强调《清明上河图》的正统性。台湾方面对于《清明上河图》的相关言论举动，都刻意不给北京张择端真迹比较好的评价，带有政治性动机的可能性很高。

一九七七年时的书名是《清明上河图》，到了我手上的一九九三年版就变成《清院本清明上河图》。

这个清院本也有许多有趣之处。

这是献给皇帝的绘画，描绘时尽量避免招致政治批评，本来就是基本铁律。享受优越创作环境的代价，接受这个基本铁律是宫廷画家的宿命，但也有其限制。在中国，基本上书画的呈现掌握在担任要职的文人官员手里，这也意味着，中国美术的整体呈现，局限于体制容许的范围内。

清朝乾隆皇帝

但是这个清院本，据说是“违反政治铁律，发生许多不祥之事，充斥着危险的题材，批判刚就位的皇帝施政”（古原，前揭书）。

例如，在道路旁有好几个乞讨的乞丐、在路上摔倒的男子、落马的男子、吵架骚动的画面、粪水洒了一地、周遭的人掩鼻的样子、私塾前的尿尿小童、餐厅前瘫在朋友身上作呕吐状的男子、背着死狗的男子后面有狗追他等不吉利的场景。

为何拥有强大权势并自夸盛世的乾隆皇帝，可以容许这样的绘画内容呢？

因为这幅清院本与清朝盛世无关，绘画内容是虚构的，或者说是描绘过去的世界，在一个虚构的土地上发生的事情。因此不会伤害到清朝皇帝的威严。画家们也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完成了清院本。

乾隆皇帝展开空前的文物搜集事业，把许多贵重的古董收入手中。现在北京和台北两个故宫的收藏品，可以说是以乾隆皇帝的收藏为原型。乾隆皇帝也没看过张择端的真迹，他看到的是明代流通的仇英仿本。乾隆皇帝自己也想看到《清明上河图》的真迹，但当时他以为原作已经消失，因此接受了“复活”的清院本。

最后我想简短提一下“张择端本”。

有关张择端真迹的历史，我已在第一章详述，张择端真迹的仿作有不少还在，依据古原宏伸的研究至少有十件以上。前面提到的《清明上河图：珍藏版》即是张择端版本，在大英博物馆、台北故宫等地都有，每一张的描绘都比真迹还要写实。

战后发生的国际真迹争论

散布到世界各地的《清明上河图》，真迹究竟是哪一个？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开始在国际上引发论战。

这一切都是因为在中国沈阳戏剧性地发现真迹而起，这在第一章介绍过。在此之前，普遍认为真迹大概已经消失了，因此也不曾有人挑起真迹的争论。

点火的是台湾文化人董作宾。

董作宾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二年间在台湾的学术期刊及美国的杂志上公开主张，住在芝加哥的孟义所收藏的“元府秘”就是张择端的真迹。一九五三年还把详细的内容写成著作出版。所谓“元府秘”就是元朝的仓库。

现收藏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清明上河图》，被董作宾判定是真迹。因为停泊在虹桥旁的政府船只上有着“枢密院”、“平章”等文字，符合北宋当时的政治体制，画中也可看到“官窑瓷器”、“棉花行”、“糖果蜜饯”、“南货发行”等存在于北宋时代的招牌，这些都是证据。

但是，芝加哥的这幅《清明上河图》，有着与时代背景不符的炼瓦虹桥，很明显这不是北宋时代的作品。

大陆的徐邦达反驳董作宾的主张，他在一九五八年写下《清明上河图的初步研究》；同一年郑振铎也写了《清明上河图的研究》。

两份研究都指出董作宾的矛盾及谬误，代表大陆提出反驳的这两位，背景都很有趣。

徐邦达在中国的绘画鉴定界是第一把交椅，他的鉴识眼光被称为“国眼”。一九一一年出生于上海，精通古书画的鉴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重建北京故宫，重新搜集散落各地的书画，他扮演了

重要的角色。

郑振铎是民国时期文化界的重要人物，美术史却不是他的专长。战后他支持共产党，曾任文物局长、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及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两人都是中国文化界的重量级人物，“由这么重要的人物来反驳”，宣传效果十足，邀请他们担任反驳的角色，可能也是国家的政策。

从相同的观点来看，董作宾是甲骨文的研究学者，也非中国美术的专家，他之所以要向世界主张芝加哥的那幅画是真迹，其原因昭然若揭——与台北故宫名人那志良撰写《清明上河图》的著作，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在沈阳发现《清明上河图》是一九五○年。这个新闻在大陆有报道，台湾当然也应该会知道。但是当时算是大陆单方面的主张，还没有得到世界的公认。

在还没确定北京的《清明上河图》是真迹之前，台湾抛出关于真迹的论战，企图混淆视听。这样的目的，也可以在董氏的主张中看到影子。然而想从学术的角度说明其为真迹，却是证据不足，反而令人觉得矫情。

考证画中的招牌，是中国人擅长的强项，就算不是专家，只要稍微调查一下就可以知道。

因为蒋介石的决定，伴随着“中华民国”撤迁台湾，大量的故宫文物也运到台湾，这部分前面已经说过。蒋介石的理论是“文物的所有者=中华之王”，手里握着中华文化的精髓，就是得到正统，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终有一日可以把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赶出大陆。

照这个脉络，脍炙人口的《清明上河图》和“真迹”都不该缺席——但历史的因果却是溥仪被赶出故宫也把画带走了，因而没有运到台湾。

目前已知的是，台湾的清院本是清朝时所作，与张择端的北宋末期，时代差距甚远。虽然如此，台湾方面仍极力形塑这幅清院本是《清明上河图》中“最佳”的意象。

台北故宫的蒋介石雕像（作者摄影）

一九八四年九月台北故宫发行的学术期刊《故宫文物月刊》，曾刊登该刊资料室所写的《清院本清明上河图中的小镜头》一文。

文中指出“《清明上河图》散在世界各地，仅是本院即有典藏七幅，众多版本中以本院的‘清院本《清明上河图》’最具盛名”。

此外，那志良也在他的书中检讨比较世界各地的代表性《清明上河图》，总结说：“《清明上河图》是一幅风俗画，我们寻求的是用艺术的手法描绘出那个时代的实际情景。”他同时斩钉截铁地说：“《清明上

河图》的作者不止一人，如果说南宋时非常重视这幅画，真伪问题、是否有真迹、描绘的是哪个时代等，都不成问题。”

简言之，《清明上河图》不管在哪个时代都有许多不同的人画出，究竟哪幅是真迹、有没有真迹存在、哪个时代画的，讨论这些问题都没有意义。其基础的理论是每一幅《清明上河图》都有其各自的艺术价值，这些明显都是强词夺理的文章。

进入一九七○年代，“文化大革命”告一段落，大陆陆续公开《清明上河图》的资讯，真迹就收藏在北京故宫的这个事实，无可动摇。

与北京收藏张择端真迹的消息出来之前相比较，台湾清院本的重要性相对降低。为了打破这个困境，台湾想出的办法是把北宋的归北宋、明代的归明代、清代的归清代，《清明上河图》各版本有其各时代的背景，既然在真迹的讨论上敌不过北京故宫，就采取改变战场的策略，其目的明显可见。

蒋介石在一九七五年逝世，其子蒋经国接任，一党独裁体制仍然无法撼动，而艺术从属于权力也是无可奈何的事。那志良既是故宫文物搬迁的有功人士，又是名人，却得在内容大有疑点的文章留下作者之名，我不禁对那志良深表同情。

饶富趣味的论文巨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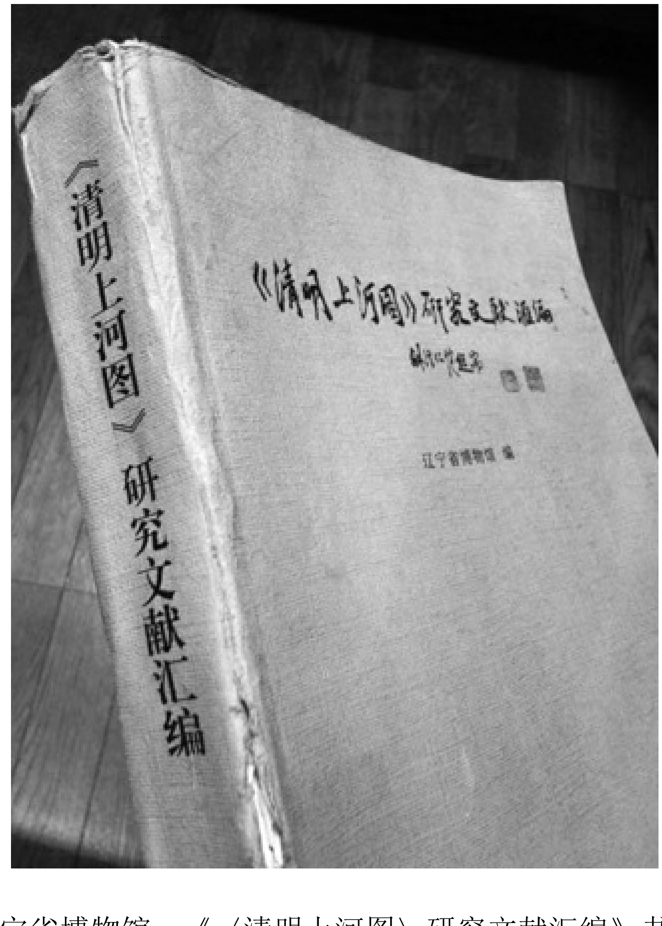
第一章介绍了《清明上河图》惊涛骇浪般的历史，第二章说明了《清明上河图》向世界的拓展，提供了有关这幅画各种各样的观点。

针对《清明上河图》这幅画，世界各国发表了数百篇相关学术论文，衍生出“清明上河学”这个学术领域。其相关主题不只是美术而已，

还有历史、建筑、船舶技术、民俗、饮食文化、社会史、桥梁技术、土木、服装史等，遍及各种专业。

我手边有本厚厚的中文论文集，是由辽宁省博物馆编纂的《〈清明上河图〉研究文献汇编》，集结了与《清明上河图》相关的研究论文。

全书七百九十五页，收录一百零二篇论文，字数超过一百万字，分为“收藏及版本”、“关于清明上河图之命名”、“经济史”、“地志学”、“医学史”、“科学技术史”、“关于虹桥”等十章，也以附录的方式列出没有收录进来的论文。有了这些资讯，要查询这幅画的相关资讯就非常方便了。



辽宁省博物馆，《〈清明上河图〉研究文献汇编》书影

刚开始进行《清明上河图》的采访时，想尽办法要找到这本论文

集，总是遍寻不着。正当要放弃的时候，在中国的拍卖古书网站找到，才以定价的十倍买到这本书。

辽宁省博物馆与《清明上河图》关系匪浅，因此深信该馆必是苦心编纂该书。但是当我访问沈阳时，访谈博物馆的前研究员戴立强，得到的真相令我大吃一惊。

住在沈阳的资深公务员黄应烈及康凤桂两人，在退休之前就对于《清明上河图》十分感兴趣，逐步搜集所有论文，集结成“专辑”，超过一百篇论文。碰巧戴立强认识这两人，看到这本论文的目录，对于内容之充实程度非常感佩。因而在博物馆的内部会议进行检讨，联系各地的专家增加论文数量，在这两人的同意下，以博物馆的名义出版。

二○○七年出版时只印了几百本，主要是分发给公家机关，在市场上几乎看不到，变成“稀有书”。

民间人士能够做成这本论文集的基础，令人印象深刻。有关《清明上河图》的观点非常丰富，超越一般学术性的资料，而迄今仍有诸多未解的谜题。一般人也不知不觉深受吸引，加入解谜的行列。

民间普遍的关切，促成《清明上河图》站上全民画作的地位，从这本论文巨作可见一斑。

第三章 美食之都——开封

看了《清明上河图》，有一句中文一直浮现在脑海中：

民以食为天。

这是孟子的话，这句名言充分表达了中华民族是个重视饮食的民族。

《清明上河图》上，有关“食”的描绘可真多。

因为是描绘人们的日常生活，自不待言，从这样的一张画可以看出我们的生活与“食”密切相关。

《清明上河图》描写了北宋末期整体社会情况，从这张图特别挑出“饮食”这个主题，而且用一个章节来说明，这是有原因的。

《东京梦华录》作者孟元老对于北宋末期的开封风貌，如此记述：

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

位于交通要塞的开封，来自东西南北各地的珍贵食材全都汇集在此。上流社会和一般庶民吃的东西也许不同，然而天下美味全都集中在开封，这是毋庸置疑的。

对民众来说，食就是生活。

这当然可以适用于任何国家，但是自古以来，大概没有其他民族像

中华民族一样，在探索“食”这件事上发挥得那么淋漓尽致。

把饮食这项生理需求提升至文化的层次，政治和经济的安定不可或缺。如同“衣食足”的意义所显示——在一个连“食”都有问题的社会环境，是不会出现老饕或是饮食文化的。

北宋是人民对饮食大大发挥探索好奇心的时代，《清明上河图》处处提供了充分的佐证。

孙羊正店

《清明上河图》上有家大型餐厅“孙羊正店”。

这家店的热闹与豪华，比起现在中国大都市里的大餐厅，毫不逊色。

光从这家店就可以谈起许多与“食”相关的故事。

“孙”是老板的姓氏，“羊”是指这家餐厅专卖羊肉料理。当时，羊是最昂贵的常见肉类。

中国传统食用的家畜共有六种：马、牛、羊、鸡、狗、猪，称为“六畜”。原来是野生，后改饲养作为食用。我们现在的餐桌上，有些还会出现，有些则已经没有。例如现在中国几乎不吃马肉，但在日本比较常吃；日本完全不吃狗肉，但中国东北地方及朝鲜半岛则经常食用。

原来在中原的汉族，以吃六畜中的猪肉和鸡肉为主。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带来羊肉的文化，再渗透进汉族。宋代基本是汉族王朝，但是继承了隋唐的游牧民族饮食文化，延续了对羊肉的喜好。

开封清明上河园再现“孙羊正店”（作者摄影）

吃肉也有南北差异。江南的苏州、杭州，以鱼为主。虽然也吃羊肉，但是消费量不如中国北方。即使是现在，南北也不同，北方喜爱吃羊肉，这是羊肉的“南北落差”。

研究中国饮食文化的关西大学讲师卓悟曾表示：在《东京梦华录》中出现的肉类料理，计有一百八十三道，其中羊肉出现比例为压倒性的百分之三十六，最高；猪肉是百分之十二；鸡肉等家禽类为百分之十一；鱼贝类是百分之十五，完全没有提到马肉、牛肉和狗肉。

羊肉在这个时代的饮食文化中，究竟居于何种优先地位，是个有趣的题目。

说到当时究竟都吃哪些菜，在《东京梦华录》中收录了各式各样的菜名。我一面读一面想，这个吃过，这个没吃过，很有意思。

这本书的《卷一·外诸司》，有个名叫“牛羊司”的官署，专职饲养牛羊，以供祭祀及宫中饮食之用，配置士兵一千人。

《卷二·宣德楼前省府宫宇》，有一家“薛家”餐馆，卖“羊饭”和“熟羊肉”。

这道“薛家”的“羊饭”，在南宋时代不知名作家所写的《枫窗小牍》这本札记中出现过，曾是开封的名菜之一，相当好吃。这道“羊饭”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一般的“羊料理”，另一个是“使用羊和米的料理”。

“羊饭”令人想到中东或阿富汗吃的燉羊饭，羊肉和蔬菜混杂在米中一起煮，用香料提味，和香草一起吃。刚开始会有点腥味，习惯之后就会爱上那种滋味。

《卷二·州桥夜市》，市场卖着“白肠”、“辣脚子”、“批切羊头”。“辣脚子”是用辣椒调味燉煮羊脚，我曾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吃过这道料理。

《卷二·东角楼街巷》写着卖“羊头”、“赤白腰子”。“腰子”是指肾脏，现在中文还是这么说。“赤白”是指肉类有两种，颜色不同，因此取名赤白。在台湾是放进麻油鸡汤一起吃，可以品尝到麻油的香味。

《卷二·饮食果子》中提到“茶饭”，以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下酒菜，列举了很多的菜名：“乳炊羊肫”、“羊闹厅”、“羊角”、“炙腰子”、“虚汁垂丝羊头”、“入炉羊羊头”、“羊脚子”、“点羊头”等。

《卷四·食店》中提到“软羊”、“入炉羊罨”、“生软羊面”，等等。

这些料理大概的样子，有些知道，有些完全不知。

“乳炊羊”是用羊奶煮的，“羊肫”大概就是现在的燉煮料理，花较长

时间温火慢燉羊肉；“羊头签”的“签”是切成短短签状的意思，把羊头的脸颊肉削下来；“羊闹厅”、“炙腰子”、“虚汁垂丝羊头”就不知道是什么了。

无论如何，北宋时代的羊肉料理相当普遍。当时中国分为“北食”和“南食”两类，“北食”的代表食材无疑就是羊，开封羊食文化的丰富，从《清明上河图》上的最大餐厅“孙羊正店”可以看出。

历史上有关羊的奇闻逸事，屡见不鲜。

春秋战国时代的宋国，有位出名的将军叫华元。与郑国交战，出征前晚杀羊以飨士兵，却忘了叫自己战车的马夫来吃。马夫怀恨在心，第二天打仗时把载着华元的战车驾到敌方阵营，使华元遭到俘虏。巧的是这位马夫的名字叫羊斟，之后华元脱逃，承认自己的过错，也原谅了羊斟。

因为羊料理，让一个将军的性命陷入危险，也曾经灭亡了一个国家。

战国时代有个小国中山，君王在宴会上准备了羊汤，因为分量太少，正好在司马子期将军面前吃完了。

司马子期感到无比羞辱，愤而投奔敌国，率军灭了中山。君王感叹地说：“吾以一杯羊羹亡国。”

宋太祖赵匡胤打下北宋江山，也留下几个和羊汤有关的逸事。太祖小时候住在长安，生活贫困。手中只有一个变硬的面团，他在街上闲晃看到一个卖羊汤的摊贩，就把面团丢进羊汤里泡软，十分美味。赵匡胤当上皇帝以后，仍对这个味道念念不忘，悄悄造访这个摊子，依旧美味，对他大大褒奖一番。

放面团到羊汤的这道菜，就是陕西省的名菜“羊肉泡馍”，现在也能吃得到。

在中文里，羊汤写成“羊羹”。“羹”这个字的意思自古至今都没有改变，在日文里也有句谚语“羹惩脍吹”，意思是记取之前失败的教训。

这个“羊羹”似曾相识，其实就是日本甜点“羊羹”二字，两者要说完全没关系，好像也不是如此。

中国的羊汤是把羊肉的胶原蛋白引出，冷了以后变成果冻状，作为一道菜；日本羊羹就是由此得到的灵感，把红豆和砂糖混合，固定成棒状——哎呀，开始讲羊的故事就停不下来。

然而这个“正店”，看起来就是大型餐馆。北宋当时的餐饮店采取执照制度，“正店”的开设有着严格规定。在神宗时，曾经有记录说开封的正店有七十家。依据《东京梦华录》，当时开封有七十二家“正店”。该书列了几家“正店”的名称，却不包括“孙羊”。或许这是张择端想象出来的产物，大餐馆在当时的开封林立，的确是不争的事实。

“正店”的店铺结构不太一样，它是一栋三层建筑。一楼到三楼都可以让宾客入座，许多人进进出出，看得出来相当热闹。

中国餐馆从以前就是这样，建筑的窗户采半开放式，从窗户可以窥见桌子上的酒器，两个人觥筹交错；也能看到一个背影坐在椅子上，左手扶着栏杆，桌上摆的酒器造型俏丽。

依据《东京梦华录》，开封大型餐馆的酒器都以金银装饰，也许这家店的酒器也有金银装饰。

餐馆外有一些像花圈的装饰物，造型相当华丽。一流的餐馆在店门口有花草或颜色装饰，到了晚上，用蜡烛照得通亮。“孙羊正店”的店门

也有着巨大的花圈摆饰。

正店里面有女侍和妓女。妓女不仅是提供性服务而已，扮演的角色比较偏向唱歌跳舞娱乐客人，可以拿小费，类似日本的艺伎。

店内有专门侍奉茶酒的“茶博士”、“酒博士”。当时“博士”的意思和现在不同，比较像是“专家”，有如现在的“侍酒师”。

脚店也有正店的等级

相对于“正店”，其他不具“正店”资格的饮食店铺就叫做“脚店”。

“脚店”有像“正店”等级的大型店铺，也有只有一张小桌的小店。

《清明上河图》上有一家大型的“脚店”，叫做“十千脚店”。地点就在虹桥的西南边上，位置绝佳。这家店的规模不输“孙羊正店”。

屋檐下用竹子搭成一座门，这个门叫“彩楼欢门”，当作招揽客人的看板。有人说是后周太祖造访开封时设置，似乎是开封独有的风俗习惯。用木材纵横组合而成，装饰并不华丽，露出木头组合的纹路。上方突出的棒子，垂下蓝白的布，染上“新酒”二字。门的左右挂上写着“天之”、“美禄”的门联，在风中摇曳，“天之美禄”就是“美酒”的意思。

“十千脚店”的门前，拴着一匹白马。店员手拿着碗，从店里走出去。路上有人在卖花，带着小孩的老人正在询价。“十千脚店”的前方停着一辆大型单轮车，货都卖完了，车主手上拿着一串钱。还有另一个人也拿着一串钱，正从店里走出来。店的内侧是一栋两层楼的建筑，可以窥看到有两桌摆放着酒菜。

开封是个国际都市，来自国内外各种菜系的料理都汇集于此。餐饮

业是很大的产业，《清明上河图》也呈现了“老饕城市”开封的实况。张择端对于餐饮业的着墨关心，也可以看出当时开封整体社会对于餐饮业的重视。

开封清明上河园再现“十千脚店”（作者摄影）

宋代的饮食

《清明上河图》上到处可见餐厅或是小酒馆摆排桌椅的风光，中国一直到三国时代，生活模式还是以坐在地板上为主，坐椅子是到了唐代逐渐普及，宋代才完全演变进入坐椅子的时代，《清明上河图》也反映出家具史的珍贵资料。

那么，各家餐馆的桌上究竟放了什么餐点料理呢？

前面提过，我曾与卓悟谈话，他告诉我“《清明上河图》上有很多

餐饮店登场，但是桌子上几乎没有餐点”。

的确如此。《清明上河图》上，有人在谈天说笑，也有一个人坐着的，桌上几乎没有餐点这类的东西。但是在餐厅，应该不会只坐着而不点餐。张择端是故意不画餐点，或是有其他理由呢？

既然《清明上河图》上看不到关键的料理，那就只能依靠《东京梦华录》。根据该书，当时有丰盛的下酒菜，称为“下酒”。

其中汤类很受欢迎。虾、鸡、腰子等羹汤，意思是比较浓稠的汤，也有一道菜叫“百羹汤”，这类的羹汤也会加面进去。

在中国称为“汤”，这是比较晚近的说法。台湾还有“羹”的说法，像“花枝羹”、“蛇羹”、“赤肉羹”。现在中文的用法上，“羹”是指比较浓稠的汤，其他的都称“汤”。

我造访开封时，也发现卖汤的店很多，到处都可以看到“牛肉汤”、“羊肉汤”。进入巷子里，就可以发现好吃的羊肉汤店。巨大的铁锅里，羊肉的肥肉切块浮在锅边，在白色混浊的汤里，燉煮着一块块切好的羊腿肉。

点了一碗人民币十元的羊肉汤，上面放了葱，用来消除腥味。喝了一口，慢火燉煮的美味香气在嘴里发散。店老板用手指着桌上的盐巴胡椒说“味道比较淡，你可以自己调味”。其实味道已经很好，装在大碗的汤，三分之一喝原味，三分之一加了盐，三分之一再加上胡椒，全部喝光光。

作者于开封品尝羊肉汤（作者摄影）

很久没喝到这么美味的汤了。

出租车司机说，开封人喜欢喝汤，习惯肚子饿就喝点汤。虽然无法断言，但直觉上认为这就是继承了《清明上河图》时代以来的喝汤文化。

《东京梦华录》上还可以看到其他肉类，如羊、兔、鹿、鹅、鸭、鸡等。开封是内陆城市，基本上是吃肉为主，如前面所说，当时以羊肉最为上等。

开封市的街边售卖新鲜的兔肉（作者摄影）

开封市内摆卖水果的摊贩（作者摄影）

古代的六畜，除了羊，还会吃猪、鸡等。这时候并不吃牛，因为牛作为农耕之用，使得牛肉成为禁忌。

烤鸡、鸭、羊脚、羊头、酒蟹（上海菜中的“呛蟹”）都高挂在店头。银杏、栗子、梨子、桃子、葡萄、枣子都摆在摊子上卖，现在中国也吃这些坚果和水果。此外，小酒馆内也卖“煎鱼”、“炒鸡肉”和“炒兔肉”。

这些料理和食材几乎在今天的中国菜中也都能吃到。可见中国的饮食文化至北宋达到了成熟完整的时期。

权力阶级崇尚粗食

这里要谈谈北宋时代的社会饮食观。

中国社会无论贫富贵贱，对于“吃”极度重视。成功人士用奢华的饮食来证明自己的成就，也是事实。然而，北宋时期对于过去崇拜美食的风潮，开始思索辩证，士大夫阶层反而以质朴的饮食为主流。

中国饮食研究第一人王仁湘，在《饮食与中国文化》一书中，对于宋代饮食指出：“形成普遍崇尚质朴饮食的社会风潮，前所未闻。尤其是士大夫阶层，以淡泊、质朴、高雅为标准态度。”

与北宋《清明上河图》大约处在同一时期的，有大名人苏轼。他是官员，也是擅长诗文书画的文人，同时是在日本知名度最高的中国历史人物之一。

苏东坡是美食家，自称“老饕”，至今中文也仍使用这个说法。他留下《老饕赋》等作品，也是“东坡肉”的发明人，在料理史上留名。（“东坡肉”的日文是“豚の角 煮”。）

开封市内，苏轼执行公务铜像（作者摄影）

苏轼不是奢华的美食家，他比较偏好使用便宜的食材加上美味的烹煮方法。“东坡肉”就是使用便宜的三层肉，苏轼《猪肉颂》如此描述：

黄州好猪肉，价钱如泥土。

贵人不肯吃，贫人不解煮。

慢着火，少着水。

火候足时它自美。

后来，他又把注意力从肉食转向蔬菜，强调养生的重要。在《送乔仝寄贺君》中，劝诫人勿奢侈：

狂吟醉舞知无益，

粟米藜羹间养神。

意思是热衷于饮食，只是知道毫无助益，应以粟米蔬菜汤养生。

晚年苏轼的饮食基本原则是“已饥方食，未饱先止，散步逍遥，务令腹空”。他规定每餐只喝一杯酒，吃一碗肉，有客人来，也只出三道菜。

与苏轼齐名的北宋名人司马光，在日本也颇负盛名。司马光是史学家，编纂有《资治通鉴》，在哲宗时担任宰相，也是以质朴简约为守则之人。

司马光在自家招募学者讲书，偶尔会以酒食犒赏。原则上是“一杯、一饭、一面、一肉、一菜”而已，对于接待自己的场合，也以同样的标准要求对方。出身山西乡下的司马光回乡祭祖，曾留下一段佳话：乡里的老人用土器，只装了粟米饭和蔬菜款待，他却觉得比肉类更为美味，就像吃到牛肉、羊肉、猪肉般的欣喜。

另一方面，《水浒传》记录着与这些文人完全不同的饮食观。《水浒传》是一部英雄传奇，没有记录菜肴或烹饪方法，但是英雄豪杰的食量惊人。

当然小说多少有比较夸张之处，鲁智深、史进、宋江等人豪迈大快朵颐的对象，都是肉食，大概是现代成年男子好几人份的食量。士大夫的那套“粗食”取向，看来并没有普及于一般社会大众。

宋代的酒

《清明上河图》也提供了不少与“酒”有关的话题。

前面提到的“正店”，取得特权可以卖酒。北宋时期，酒的专卖事业是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政府不直接经手酒类的买卖，正店就是所谓的

批发，此外市区内有两万家“脚店”，加上小型的餐馆作为买卖网络的末端。

当时喝的是酿造酒，还没有蒸馏酒也就是所谓的“烧酒”。造酒的蒸馏技术是在阿拉伯成熟运用，约莫十一、十二世纪时传到欧洲，大约在元代传到中国。日本“烧酎”这个词就是源自于“烧酒”。

基本上，当时的酒在北方是用小麦加麹，南方是用米。依据史书记载，它的味道混合着药草，有点像是带杂味的日本酒，也有加入柑橘、葡萄、梅子的水果酒或药酒。《清明上河图》“孙羊正店”的后院，可以看到酒瓶堆积如山。

以下是我的猜想：对于餐饮业而言，被选为“正店”极为重要，这也包括转卖酒类所产生的差价利润。倘真如此，对于负责指定“正店”的公务部门，当然会有相应的营业活动（包括贿赂在内）。如果得罪高官，也很可能被取消“正店”的资格。

开封清明上河园再现北宋时代的酒坊（作者摄影）

这里讲到酒，还可以再深入谈下去。《清明上河图》上有个地方摆着“小酒”的招牌，靠近河岸的空地，老板在店门口招徕步行中的客人。

店门口是组合式的木门，上面挂着写着“小酒”的旗子。这种小酒不是“正店”正规卖的酒，而是卖给一般百姓的便宜酒。

根据《宋史·食货志》，从春天开始到秋天酿出的酒，马上就可以销售，价格非常便宜。虽然不清楚币值，但是大约是五钱到三十钱这样的便宜价格就可以买到。

宋代的茶

说完酒，话题自然就转到茶。

有人说，茶是中国饮食文化的精髓，英国红茶或是日本茶的原产地都是中国，甚至可说茶是中国最伟大的发明。传说神农氏在山野遍尝百草，如果中毒就用茶来解毒，这好像也和中药的起源有关。

传说第一个喝茶的是神农氏，但有关茶的起源，比较可靠且广为人知的说法来自云南省的少数民族，据说他们把嚼食云南省原产的茶树叶当作药物。

日文把喝茶叫做“吃茶”，没有想太多就把“吃茶店”当作一般用语。“吃”在中文的原意是“吃”或是“放进嘴里”。纯粹“喝”的情形，就叫做“饮茶”。在日本是先有“吃茶”的意思，因此把动词“吃”放在前面，之后才有“饮”，但是“吃”已经留在语言当中了。

可是现在中国用了另一个动词“喝茶”，语言里还留着“吃”，与“吃”发音相同，置换了吃字，不只是使用简体字的大陆，连使用繁体字的台湾也说“吃饭”。

究竟茶是用“喝”的，还是“吃”的，又是另一个大问题。

怎么说呢？古代中国一开始是喝茶和吃茶两种并行。

开始把茶当成饮料是在汉代（公元前二○二年到公元二二○年），最初是仅限于皇帝及贵族饮用的高级品，后来大量栽种及生产技术广泛流通之后，到唐代才普及于一般百姓。在京城长安到处可见茶馆。中国的“茶圣”陆羽也是唐代人，流传至今的《茶经》由他所写，详细解说茶的历史、栽种及饮用方法。

《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北宋，喝茶的风气更为兴盛。在开封，每隔数十米就有茶馆，《清明上河图》中的茶馆也令人印象深刻。

当时喝的茶有两种，一种是固体茶，也就是日本说的抹茶；另一种

是我们通常喝的茶叶。日本人脑中的中国茶就是像乌龙茶或绿茶的茶叶，但依据中国古代的文献，比较流行的喝法是把固体茶磨碎以后再喝。

原本茶就是从茶树采下茶叶，一开始喝茶的方式就是用茶叶，后来才发展成磨碎来喝。到了三国时代之后的晋朝，抹茶才开始普及。中国“茶圣”陆羽生活的唐代，已经进入抹茶的全盛时代。

然而抹茶的制作过程需要繁复的手续，成本较高，因此一般百姓喜欢用茶叶。

宋代是从固体茶进入茶叶的重要时期。在《宋史·食货志》中记载“茶有二类，曰片茶，曰散茶”。片茶就是固体茶，散茶就是茶叶。固体茶是高级品，百姓就喝茶叶。日本茶道使用的是抹茶，从这点来看，现在的日本也可说是沿用这样的区分方式。

宋代开始有“茶书”专门写茶，提到茶的诗和文章也逐渐增加。就连宋徽宗自己也著有《大观茶论》，详细记载茶的文化。

关于茶，中文有句话说“兴于唐代、盛在宋代”，意思就是“自唐代开始，兴盛于宋代”。到了宋代，茶已不只是一种饮料而已，透过多元的茶文化广泛传播，也是一种休闲雅兴。

其中之一是“茶”的风气。

爱茶人士竞相取得当年优质的新茶，彼此比赛茶汤的颜色及茶叶的展开方式。因此茶碗大卖，蔚为流行。

此后固体茶和茶叶的两种饮用方式并存。明太祖洪武帝认为固体茶耗费民众劳力，下令停止饮用固体茶改喝茶叶，因此茶叶成为主流。讽刺的是当时日本正值室町幕府时代，抹茶文化在武士之间大放异彩。

现在我们体验“可以吃的茶”有“擂茶”。在台湾客家文化兴盛的高雄美浓就可以喝到这种独特茶饮。我喝过好几次擂茶，很像汤的味道，与其说是喝茶，不如说比较像是茶泡饭。

《清明上河图》中的茶屋

擂茶是客家传统的喝茶方法，其由来不详。不过在宋代文献中，的确记载着将茶叶和芝麻磨碎后煮了来喝的方法。

饮食文化专家青木正儿曾指出，擂茶是从茶叶演变到抹茶的过渡时期喝法，但在学说上并无定论。客家人保留了许多古代中国文化，也有着“流浪之民”的称号。我曾造访客家人移居过的高山地区，与当地少数

民族交流，感觉是客家人吸收了少数民族的擂茶。

第四章 幸福时代——北宋及大都会开封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希望生在中国宋朝。”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Toynbee）曾这么说过。

近代中国思想家严复说，“中国之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恶为善，故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十八九可断言也”。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宋代具有特殊的意义。

终止了五代十国以来的政治不安定。

将政治的主轴从武转文。

绽放中国艺术文化高峰花朵的诗人、画家、思想家人才辈出，留名千古。

当时的开封是世界最大的都会，也是最富裕的城市。

《清明上河图》把这样的宋代浓缩在一张五百二十八公分的画轴里，传达给我们。

《清明上河图》描绘了“东京”。

这么形容下来，日本人任谁都会联想到“日本的东京”。

当然不是东京。《清明上河图》的舞台——北宋首府开封，如果用日语发音是“TOUKEI”，而日本的东京也曾被称为“TOUKEI”。

开封正式的名称是“东京开封府”，北宋设有四京制，其他尚有“西京河南府”（现在的洛阳）、“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

四都当中，开封的规格不同，皇帝的宫殿设置于此，人口超过一百万人。

《清明上河图》描绘出开封繁华的高峰，而用文字描写的高峰就是《东京梦华录》。

作者孟元老，幼时住在开封“城墙边道路的南边”一直到成人，他如此评论开封的繁荣：

> 正当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

《东京梦华录》是孟元老的回忆录。在孟元老有生之年，北宋被金消灭，开封变成废墟，再次造访开封的孟元老看到变成废墟的开封，心都碎了，开始想用文字把开封的陈年往事一一记录下来。在一一四七年，也就是北宋灭亡的二十年后，他完成了详细的采访报告。

孟元老自序中提到，此书以“梦游华胥之国”的典故，命名为“梦华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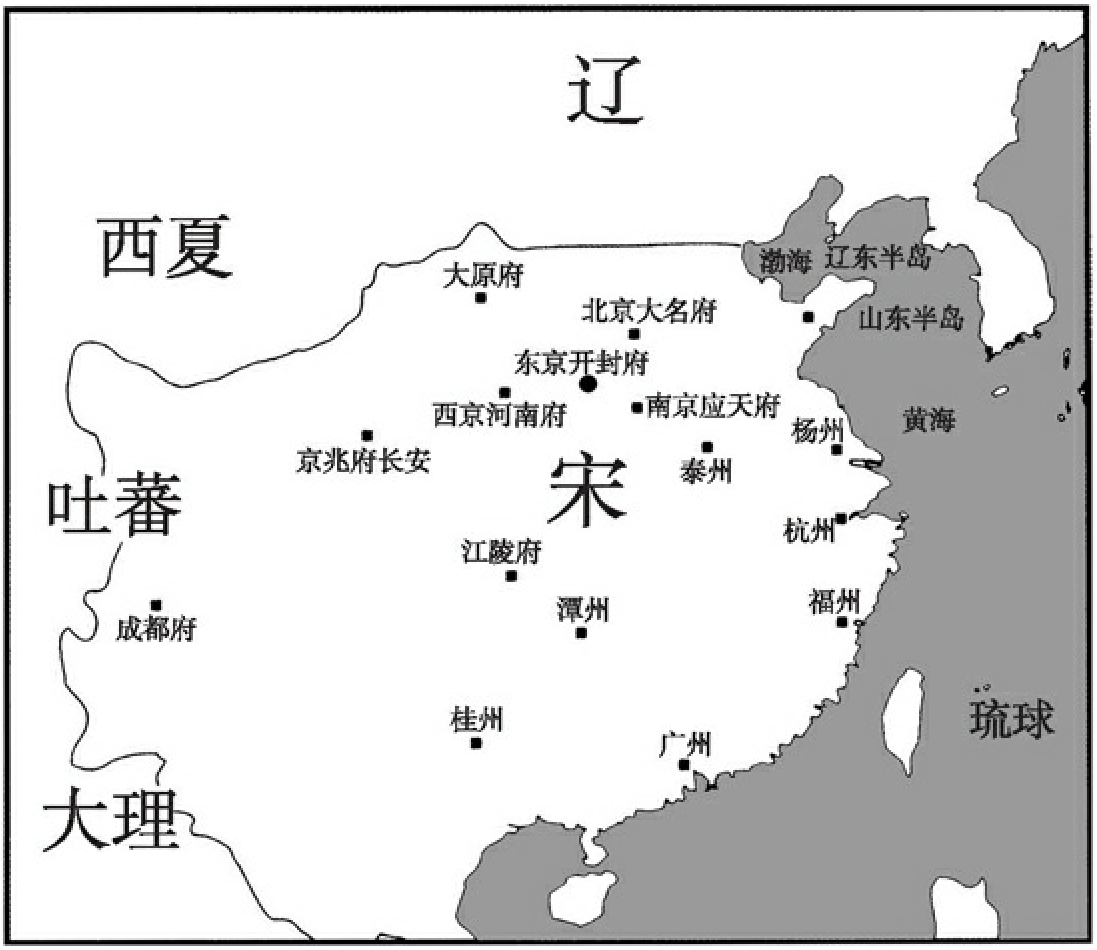
这个典故是远古的圣王黄帝对于政治情势感到忧心，在睡梦中梦到“华胥氏之国”，那是个没有君王、一切顺应自然的理想国度。孟元老认为开封是世上最好的地方，就将怀古之情寓于书名中。

《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可说正是“梦幻都市”的记录。

“梦幻都市”的记录

开封是个超级古都，连日本的京都都被比下去，它的古老与其他几

个中国都市相比，亦是首屈一指。



宋代地图

大约四千年前，“夏”、“商”逐鹿中原，夏族以开封一带为据点，夏王朝建立名叫“老丘”的都市，虽然离现在开封的所在地有点距离，但开封附近可说是人类开发建立最早城市的土地之一。

其后在周朝时称“封”，战国时代的魏设首都称“大梁”，秦国灭魏一统天下，到了汉朝才开始称“开封”。

三国时代的魏晋称此为“汴州”，到了唐朝已确立了大都市的地位。在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王朝短命的时代，第一个把首都设于开封的是后梁，之后许多朝代都把首都设在这里。

传说北宋开国之君赵匡胤本想迁都至洛阳，但遭到部下的反对，因此首都仍选在开封。

如此长年积累的都市繁荣，在北宋达到了顶点。

> 曾观大海难为水，除却梁园总是村。

梁园就是开封，这是北宋军人柴宋庆所作，意指北宋的繁华都市虽不只开封，但是很多地方跟开封比起来就像村落。

北宋灭亡后这里随之没落；金在一二一四年将首都移到开封；元代时开封仍不起眼；到了明朝这个与宋朝同样是汉族统治的王朝，开封才又恢复昔日光辉。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将第五子周王册封于开封，周王建设周王府，妥善治理。当时称为“汴梁”，繁荣的景象被称为“势若两京”（好像两个都会），与首都南京相提并论。

周王不仅在经济上，也在文化、音乐、杂技上着力甚深。到了清朝，开封继续维持其中国北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位。有许多外地人因为做生意滞留于开封，建了很多地方的“会馆”，直到现在开封市区内仍保有许多传统建筑的古迹。

新中国成立以后，河南省的省会原来是开封，但考虑到交通的便利性，将省会定于距离开封约一百公里的郑州。现在的开封除了古都的地位以外，只是中国数十、数百个地方城市之一而已。

水运孕育的都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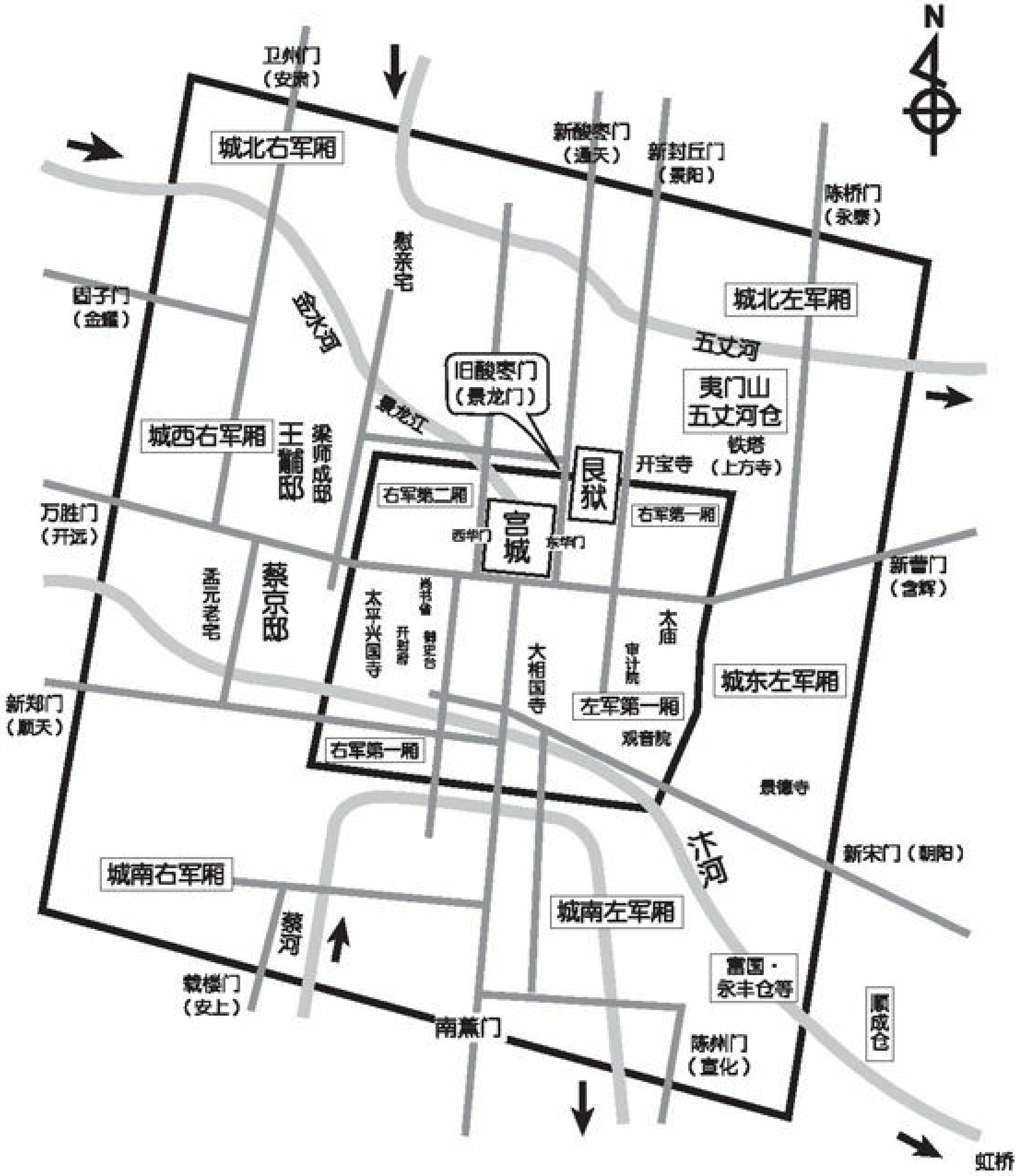
开封的发展和水运的关系难割难舍，可以说是水运促进了开封的繁

荣。不用多说，主角就是汴河。

《清明上河图》的主题是清明节或是虹桥，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个人认为汴河才是主题。

画中的汴河和河岸边的景致，占了整体面积的三成。

如果没有汴河，虹桥、船舶、街道的繁华景致就不会存在。汴河是开封的主要河流，同时也是《清明上河图》中的主要河流。



北宋·徽宗时代后期的开封地图

开封并无天然的要塞，不像长安有个函谷关守护着。开封在平缓的黄河平原上，位于自然天成的地点。

自古以来，“防御”就是都市最重要的功能。唐代的都市商业发达，首都偏好选在交通便利的地点，贯穿南北的大运河汴河流经开封，另外

还有三条河流交汇，水运位置极佳。

这三条河流包括流经开封城内北边的金水河、城内南边的蔡河，以及贯穿城内最北边东西向的五丈河。

金水河从西北进入城内，作为饮用水的来源；从安徽省流过来的蔡河称为惠民河；五丈河是运河，又称为广济河，是从山东省流进来的。

水运的成本比陆运便宜好几倍，运输的速度又快，在河的要塞部署士兵，降低了盗匪抢夺货物的危险性。因此商人特别喜欢利用水路运输。

日本的平安时代，曾有日本人访问开封。

他是天台宗的僧侣成寻，能力高强，曾把大量的佛经送到日本。北宋皇帝神宗很欣赏他，因而不让他回日本，最后死于开封。

成寻在《参天台五台山记》这本书中，记录了开封水运的兴盛，这是一○七二年的事：

> （汴河）左右着船，不可称计，一万斛，七八千斛，多多庄严，大船不知其数。

这条汴河是隋炀帝时兴建的大运河，当时的名字是“通济渠”，建设的经费造成隋朝财政的沉重负担，也是导致隋朝灭亡的原因之一。

汴河的意义在于联结北边的黄河和南边的长江，帮助长江下游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让南方物资有效运往北边。运河的开凿是国家重要的基础建设，炀帝的目的非常正确。

只可惜隋朝很快倒台，运河实际发挥功能要等到唐朝以后。而当唐朝发生大规模动乱“安史之乱”（七五五—七六三）使得北方陆路治安恶化时，必须依赖南方物资，汴河的重要性更显提高：

汴河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膏脂是此河。

用隋朝百姓的劳苦交换得来，汴河连通淮河利益最多，联结各地，民脂民膏都被这条河运走。唐朝诗人李敬芳有诗《汴河直进船》，提及汴河的经济价值。从诗中可知唐朝时汴河已是国家的生命线，淮河是位于长江和黄河之间的中国第三大河，汴河从北边流入淮河，连接长江下游的江南地方。

唐朝倒台后，后梁的创始者朱全忠曾担任汴州节度使一职，掌握汴河，并非偶然。朱全忠建都于开封，创立后梁。后梁以后的朝代都倾力开发水路。

开封借由汴河联结黄河、淮河、长江等各大河流水系，北宋时建立了经济体系，汴河将各地的财富集中到开封来。

北宋水运经济极为发达，依据《宋史》，从十世纪到十一世纪，长江及淮河间以水路运送的粮食，每年有六百万石到七百万石，而这只是军用粮食，如果加上民间用途的话一定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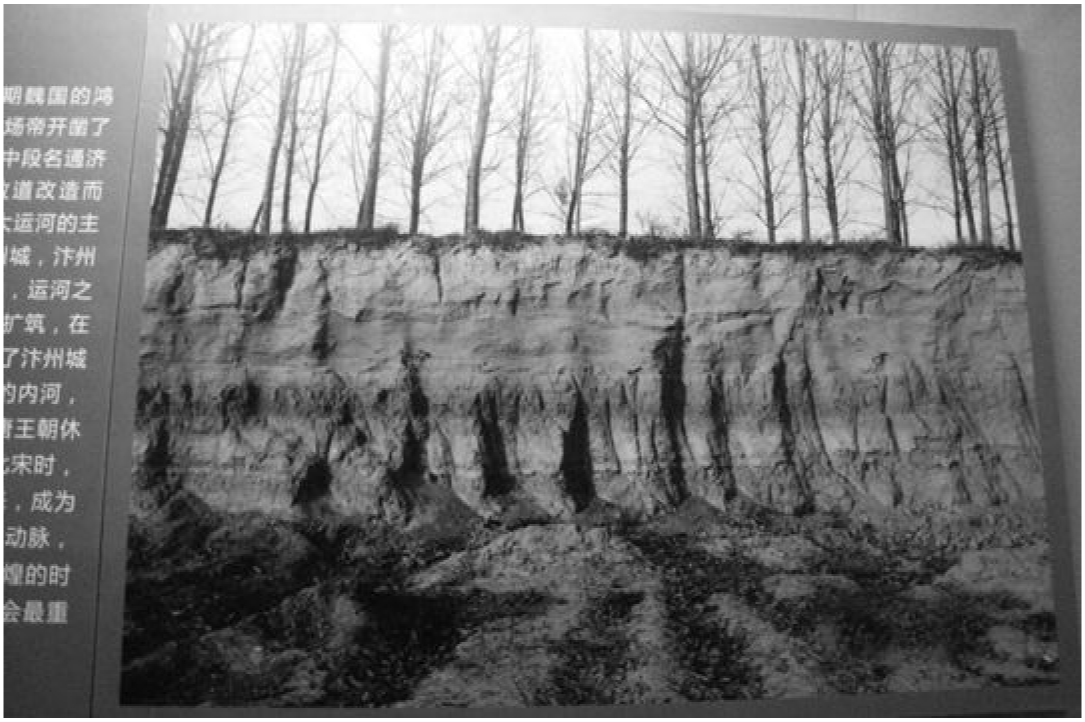
不过汴河是一条人工河，缺点是如果取水口没保护好，就会枯竭。上游的取水口是黄河，当时的黄河流量比现在多，是条每年反复泛滥的“暴河”。

黄河的泛滥对于流域内的农业不可或缺，但是如不能稳定供给一定的水量，水运就会出现问题。北宋每年都编列高额预算，用于开凿黄河取水口的土木工程。

针对黄河的取水问题，以从事变法运动著称的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完成取水大工程，除了黄河的取水口以外，也从洛阳一带的洛水取水。在黄河泛滥的夏季期间，就可以改从洛水取水。

但是冬天时黄河的水量减少，同时从黄河带来大量的泥沙，使得汴河的河床垫高，水深变浅，船只的航行变得困难。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寒冷的时代，河水的冰块从黄河流到汴河，破坏船只的问题愈形严重，因此北宋不得不在每年的十月到隔年的二月封锁汴河，禁止船只航行。



于发掘调查中发现的汴河河道遗迹。作者摄于开封博物馆

此间不能用水路运送物资，要等待春天到来，动员数十万的工人除去河床的泥巴，确保水深足以让船舶航行。大约要到清明节左右，汴河才开始通航。

《清明上河图》如果是描绘清明时节的热闹景象，其实焦点不在人群或商店，而是经过漫长冬季，终于航行在汴河上的各种船舶。《清明上河图》正充分展现了汴河水运所建立的经济发展样貌。

其后，金建都于燕京，限制与南方交易，联结南北的汴河失去必要

性，终以枯竭收场。

南宋诗人范成大在其诗作《咏汴河》注记说：“汴河自泗洲以北皆涸，草木生之。”意思是“汴河从泗洲以北的地方都干涸了，长出杂草树木”，泗洲是位于开封南边的城市。

了解汴河精彩往事的宋人，在诗句中隐含了悲伤之情。

北宋政治及风流天子

北宋王朝以文人统治为国家基本方针。

此前的中国统治阶层是军人，握有国家的枢纽。但宋太祖赵匡胤决定导入科举制度，权力核心从军人移到文官手上。

北宋形成重文轻武的风气，恢复汉族文化的复古主义势力渐增。目前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也是源自于北宋宫廷的收藏。皇帝以搜集和收藏文物为务，并以此作为统治中华的权威之证明，这样的意识在掌权者之间形塑下来，也是从北宋时期开始。

实施文治主义的北宋，在“风流天子”宋徽宗时达到巅峰。中国历史上诸多皇帝当中，他在艺术方面的才华独霸群雄。

北宋的艺术学院称为“翰林院”，徽宗仍不满意，他开设了学堂教授绘画，自己也曾担任考试官。

徽宗每十天就带着宫中收藏的书画，训练学生的鉴赏力，自己出考题来测验学生，投注热情之高，远超过正常皇帝的范围，政治的事务也不怎么管。徽宗比较年轻的时期其实对政治还颇为热衷，但是宰相蔡京从中操弄，鼓励徽宗朝艺术方面发展。

北宋·徽宗

这里讲个有趣的故事。

学生们正在写生孔雀，规定画出的体态是孔雀振翅且右脚上抬，每个学生照着画出抬右脚的孔雀，但是徽宗看了大怒："孔雀准备起飞时应该是先抬起左脚的。"——事实的确如此，所有人都十分佩服徽宗的观察力。

如果他是个艺术家，真是相当了不起；但作为一个皇帝，与其知道孔雀哪只脚先抬起来，不如多多关心百姓的生活。这段故事多少有着讽刺皇帝沉溺于艺术的意味。

《水浒传》有助于让我们了解北宋徽宗时代的另一面相。

武侠豪杰、有良心的军人、地方官员集合到梁山泊这个地方，山脚

下有个湖泊形成天然的要塞，官兵不易进攻。

《水浒传》是本以起义造反故事为主要内容的小说。在徽宗时代，《清明上河图》象征的是富饶消费文化的花朵绽放，另一面则是百姓生活清苦，尤其是郁积了对于贪官污吏的不满。

虽然如此，徽宗对于艺术的贡献相当大。

在北宋灭亡的七年之前，也就是在一一二○年，徽宗下令编纂《宣和画谱》和《宣和书谱》。

这是中国第一次真正编纂书画目录，可以说是集中华文明之大成，显示北宋文治政治到达了巅峰。

依照《清明上河图》题跋所述，这幅画卷是呈给徽宗的作品，卷首有着徽宗用瘦金体所写“清明上河图”五字标题，可却没有收录在宫廷制作的收藏目录里，原因是什么？

有一种猜测是徽宗并不喜欢《清明上河图》和张择端。然而，既然徽宗写了五字标题，应该是喜欢才会写，放进目录也很自然才对啊。

另一个可能性是政治上的理由，故意把张择端的作品排除在外。

书谱中，并未纳入苏轼、黄庭坚、司马光等当代的一流书法家。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是苏轼等人属于“旧党”，而当权者是蔡京、王安石的“新党”。

新党王安石等人和旧党司马光等人之间彼此对立，即使在王安石退场之后，两派的斗争依旧十分激烈。

但是这个说法不太具说服力。张择端虽然获得官职成为派系中的一人，但是他的官位没有重要到需要刻意把他的作品排除在外。官方没有

记录，意味着张择端不过是个纯粹的职业画家，新党没有必要对付一个职业画家。

开封市内，司马光执行公务铜像（作者摄影）

还有其他的可能性——《清明上河图》画的可能不是北宋时代。认定该画属于北宋时代的依据，是金人张著在跋文上写着呈给徽宗。但在北宋的官方记录中并没有记载，跋文不是官方的文书，拥有者很可能依当时的心情写下了不正确的资讯。

北宋开封的样貌，大致可以从《东京梦华录》中得到佐证。画风接近宋代的画作，但如果说是南宋时代画的，或是活到金代的北宋画家所画，也不是不可能。

对于这些疑点我也没有确定的答案。但在当时北宋宫廷的画坛权威下，像《清明上河图》这样描绘社会风俗的作品绝非主流，这是我很容

易想象得到的事情。

艺术作品在当代不受好评，在作者死后才大放异彩变成“名作”的也非稀奇之事。我们应该这么看：张择端和《清明上河图》也是属于这种“死后获得好评”的诸多名画之一。

开封的繁华至北宋到达顶点，徽宗事实上是北宋的末代皇帝，在此画上了休止符。

一一二七年三月金人包围开封，北宋投降。金人命令继承徽宗的钦宗退位，将徽宗、钦宗、皇后、皇太子、皇族等三千人带至北方。连官员、侍女、工匠、艺术家、演员等所有民间的专业人士和奴隶也都带走。不只是带走人，还带走了皇帝的座车、仪式用的服装器皿、青铜礼器等。徽宗一生搜集的书画宝物用了两千五百辆车子运到金的京城。

依照通说，《清明上河图》是北宋末期画的，应该也在这批运送行李当中。张择端作为优异的画家，可能也一起被带去，或者逃到南宋。今天的我们，无从得知真相。

带到金的许多名作，有些后来被卖掉并消失于民间。《宣和画谱》收录的作品超过六千件，目前可以确认还存在的不到当初的百分之一。

开封的繁华，在一夜之间变成过眼云烟，《清明上河图》呈现的艺术风气也随风而去。

徽宗是亡国的皇帝，在中国历代帝王中，他被形容成无能的人物。《宋史·徽宗本纪》这么记载：“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为戒。”措辞非常直截了当。

只能说徽宗志在艺术，不在政治。不应只针对徽宗个人，应该说在这个皇帝领导下的北宋王朝，其实是这个时代所造就出来的整体氛围。

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时代背景，《清明上河图》才得以诞生。

北宋文化对日本影响很大，这个时代制作的青瓷和白瓷，掳获了日本人的心。日本正值室町时代，拥有北宋的绘画和陶瓷器成为贵族身份的象征。

这个时代崇尚的质感是简约透亮，日本人迄今仍传承着这个价值观。例如在日本人眼中，中国陶瓷器的名品就是汝窑的青瓷。汝窑呈现“雨过天青”，这是徽宗指定烧造的颜色。世界上仍保存的青瓷件数相当稀少，展现出洗练及高雅。

每当我欣赏汝窑的青瓷时，就想到徽宗的艺术。看到《清明上河图》时就想到徽宗的治世。政治方面没有为后世留下什么，固然应该受到批评，但是从艺术的意义来看，徽宗应当可以被原谅。

北宋时期的汝窑，青瓷无纹水仙盆（原件现收藏于台北故宫）

科学技术的发达

宋代除了美术以外，还有第三章介绍的饮食文化，科学技术方面也有突飞猛进的发展。

尤其是天文学上，有着令人惊艳的成就。历史上第一个观测超新星爆炸的记录，就是发生在宋代。朝廷设置“天文院”，作为观测天文的机关。使用先进的天文仪器，从事大规模的天文观测活动，还有科学调查出一年有三百六十五点二四天。

在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指南针的实际应用方面，宋代开始使用精密的航海用罗盘，这在官员科学家沈括的著作《梦溪笔谈》中曾经提到。另一项四大发明是火药，唐代时发现混合硝石、硫黄、炭，就会产生激烈的燃烧，不过作为武器用途则是在宋代。

有人说，宋代重文轻武导致国力渐衰，但这不过就是在“文”的领域导入施行了公平的科举制度，贯彻能力主义，因此成为科学发达的背景因素。

宋代也是文人政治家的时代。

王安石

北宋开始出现衰败之象时，王安石主张整顿财政、救济弱者等新法改革政策，才四十五岁就被第六代皇帝神宗拔擢为宰相，具有相当的个人魅力，建立起新党的势力。

反对王安石变法改革的另一派势力的代表是司马光。他编纂历史大作《资治通鉴》，属于保守派的政治家，扮演旧党的领袖角色。

此外，南宋朱熹完成的朱子学，对于日本、韩国的影响甚巨。朱熹整理且重新建构北宋儒学家程颐的学说，并推而广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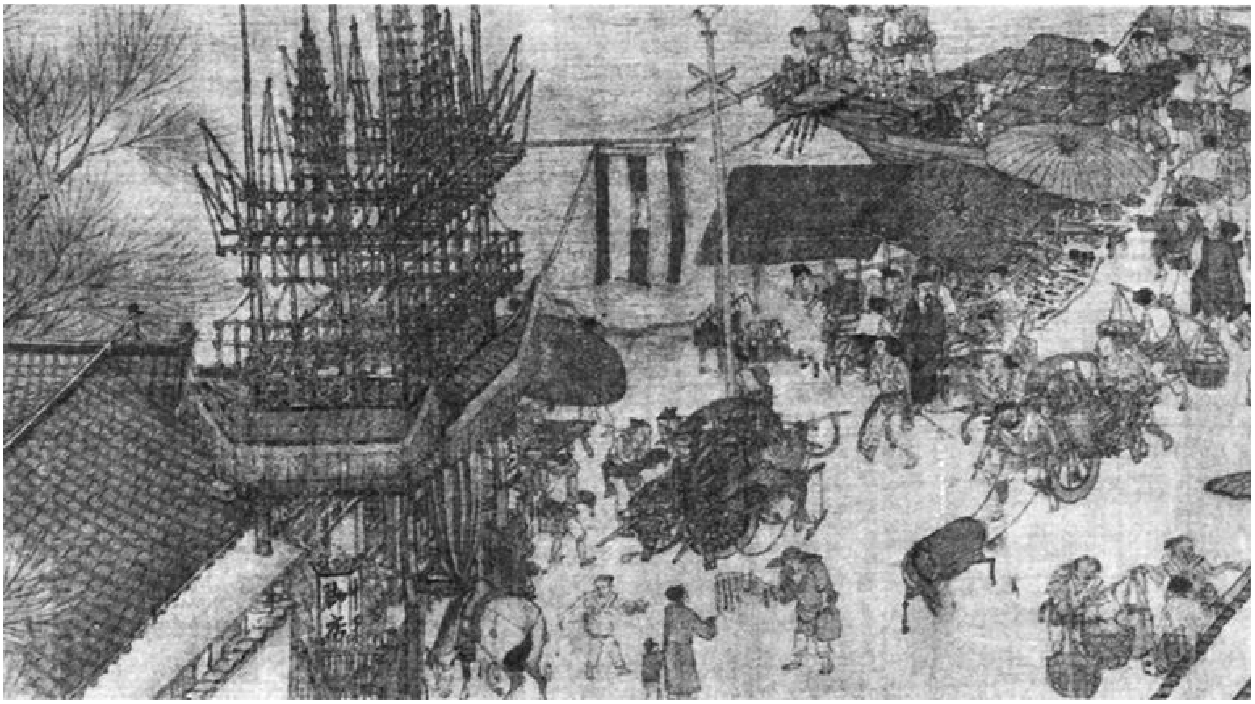
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专精诗词书画的文人，不胜枚举。

除了皇帝和军人以外，日本人熟知的中国人物，最多的大概只有宋代。

货币经济在宋代完全稳定下来，这也是历史上的重要大事。

《清明上河图》上有个“十千脚店”，店门口有个人抱着铜钱。当时因为矿产丰富，每年生产数亿枚甚至数十亿枚铜钱。历代皇帝均依其年号铸造新币，货币在全国各地流通，也为商业的兴盛扮演了重要角色。

宋钱也影响至日本，平安时代借由日本与宋代贸易运送大量的宋钱到日本，事实上在其后的镰仓时代及室町时代，成为日本的公用货币。



正在“十千脚店”前支付铜钱

九百年后的开封

二○一一年秋天，我造访了开封。开封是《清明上河图》的舞台，不能不去看看。

从大学时代起，我多次到中国自助旅行，出了社会以后也因为留学

或出差到过中国多次。省会级的城市大多去过，就是没去过开封。我想，不去开封的理由其实就是交通不便。

过去位居水上交通要道的开封，已经没有这项优势。现在中国主要的交通方式是靠铁路网，开封位于末端，位置不佳。从北京、上海前往的话，必须先到郑州换车。

这次我是搭飞机到开封，从日本先飞到北京，换国内航线到郑州附近的新郑机场，再从新郑机场搭一个半小时的出租车。清早从日本出发，抵达开封的“开封宾馆”已经天黑了。

开封名产是夜市的小吃。这或许是从宋代以来的外食产业传统，电灯泡照得通亮的街道上，到处都有小摊，摆着桌子，开封市民在此大快朵颐。

开封市内摊贩的样子（作者摄影）

我选了一家摊贩，点了开封名产灌汤包和肚肺汤。觉得大概应该是二十元人民币的小吃，看我是外国人要我付八十元，于是和老板吵了起来。最后邻桌的人帮忙讲话，价格降到二十五元。

《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北宋时代，迄今在开封仍留存的建筑物仅有两处。一个是“铁塔”，一个是“繁塔”。两个都是瘦长高塔形的建筑。

好，也有不少观光客。公园内的道路立着巨大的石碑“天下第一塔”，塔

至今仍耸立于开封市内的“铁塔”（作者摄影）

“铁塔”建于一○四九年，八角十三层，现在的高度是五十五米。一九六一年被指定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周边是“铁塔公园”，整理得很好，也有不少观光客。公园内的道路立着巨大的石碑“天下第一塔”，塔

的前面有解说，“在历史上遭受到暴风、大雨、地震、水患等自然灾害，仍屹立不倒，显示我国劳动人民在高层建筑上的卓越创造性，这是珍贵的文化遗产”。

我也到了“繁塔”。这里位于开封市东南方两公里处，连出租车司机都不知道。到了现场，发现是在杂草丛生的高台上。高台这一带姓“繁”的人不少，因此被称为“繁塔”。原来是二百四十米高，但是因为遭到雷击折断，现在只有三十六米高。

据说两个塔的基部，都埋在地底下数十米深。

根据开封博物馆的调查，北宋的“开封”被洪水淹没，到了明代建成“汴梁”。而这个“汴梁”又被洪水淹没，建成今日的“开封”。探勘调查发现这里有多层结构的都市遗址。

其中，都市规模范围最大的就是北宋。

《清明上河图》的记忆全都沉睡在开封的地底下。

掩埋的开封再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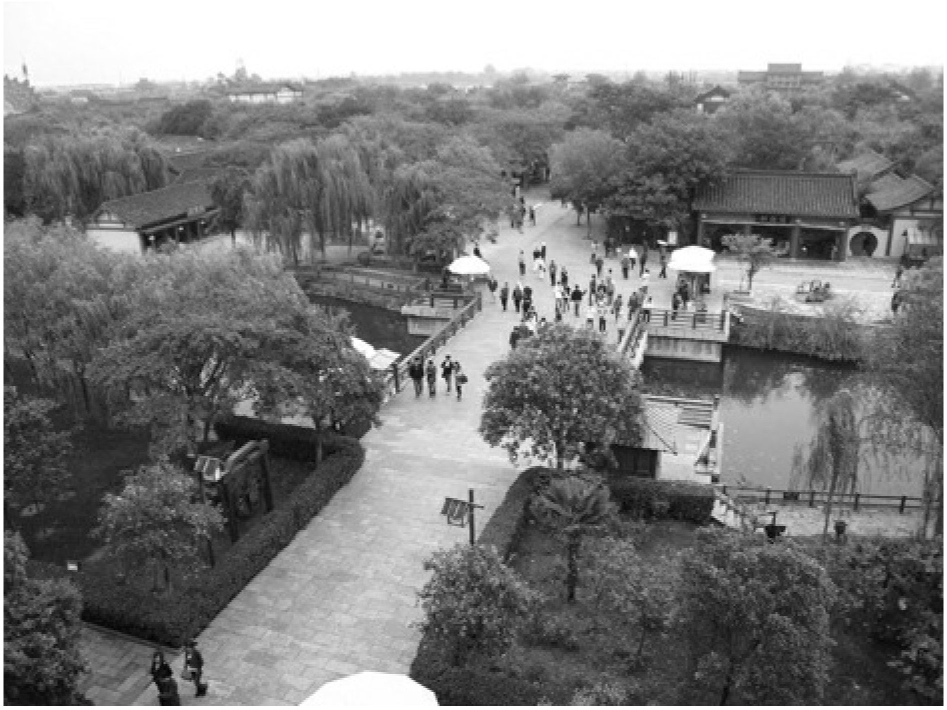
有个地方重新呈现了《清明上河图》的世界。

那就是《清明上河图》的主题公园“清明上河园”，位于开封市区的北边。

开封清明上河园入口。中国游客摄影留念（作者摄影）

一九九八年十月开园，门票全价是八十元人民币，有点贵。买了门票进去，拿到一份简介，简介上写着“一千年前，张择端把现实世界带入画卷中，过了一千年后，开封再次把画卷呈现到现实的世界”。充满甜言蜜语。

以主题乐园作为观光胜地是世界上共通的做法，然而中国的主题公园，偏离期待的特别多。这里的实际景物虽不如预期，但这个清明上河园相当忠实地试图呈现名画的世界。



开封清明上河园全景（作者摄影）

穿过大门，迎面就是巨大的男性雕像，两手捧着画卷，对着来访的宾客微笑，这是《清明上河图》作者张择端的雕像。历史上对于张择端的容貌，当然没有任何记录。主题公园的职员表示，树立这个巨大的张择端雕像，是为了呈现张择端将《清明上河图》献给皇帝的样子，也意味着将画献给到访主题公园的人们。

中国人喜好造人像，把历史具象化。在中国，到处可见历史上有名的画家或书法家的立像，但是像这么庞大的艺术家人像倒是没看过。反而很像树立在各城市中心的毛泽东像，高约八米。

开封清明上河园，张择端手持《清明上河图》的立像（作者摄影）

与历史上其他留下著名作品的知名中国画家相较，张择端显得默默无名，但在后世却造了一个如此巨大的立像，成为受人尊敬的对象，这

是他本人做梦也没想到的吧。

主题公园的内部，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忠实再现《清明上河图》的世界，另一部分是游乐设施，基本上与《清明上河图》无关。

再现的部分，忠实呈现虹桥及繁华市街，看得出来花了不少功夫。转了一圈，可以大致了解原来当时的风景是长这样子啊，有很多值得参考的地方。《清明上河图》是用“神的观点”来俯瞰在地面上生活的人们及风景，很难体会到细节。

再现的工作，补充了这个不足，同时呈现出趣味性。游乐设施方面，除了滑水、游船以外，还造了一个人工池。

每晚在这个人工池上演“大宋·东京梦华”水舞秀。如果要看这个秀，必须另外再付一百三十九元人民币。简介上说，“大宋·东京梦华是清明上河园投资一亿三千五百万元人民币，由中国知名导演梅帅元企划的大型水上实景演出”。基本上就是马儿绕几圈，美女挥动水袖跳舞，激光照射夜空，施放烟火，实在提不起劲为了看秀而留到晚上。

开封清明上河园再现虹桥（作者摄影）

无论如何，从一幅画可以衍生出一座主题公园，也只有《清明上河图》做得到。如果是宋代的山水画，就绝对不可能——玄幽的山上，有个民家——这种风情只有爱好隐居生活的退隐人士才可能欣赏领会。

历经悠久年代依然禁得起欣赏玩味的绘画，这就是《清明上河图》。

第五章 体验《清明上河图》

享受“都市体验”的画

欣赏《清明上河图》时，我们应该抱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就像到目前所讨论的，我们看《清明上河图》不只是从美术史的角度，还可以从历史、建筑、风俗、经济、饮食文化等各种不同的层面切入，无须固定在一个坐标上。

如果读者纯粹是抱着好奇，我主张从“都市体验”的角度去欣赏。

“都市体验”是一种过程，我们旅行初踏入一个城市，通常会兴奋地漫步在都市的街角，用眼睛去观察，用心去体会。有时甚至会让你感到惊艳而头晕目眩。有时因为满足了好奇心而觉得兴奋，有时也会因为与预期不同而感到失望。所有的城市都有各自的脸孔及身躯，没有亲身观察就无法体会。

中国的画卷描绘的方式，让你的视线从右向左移动。《清明上河图》大致可以分为“农村”、“河边的商业区”及“都市”等三部分。

一开始映入眼帘的是农村，然后是河边的商业区，最后是繁华的都市。作者张择端把不同风貌的土地放在一起，向世人传达大都会“开封”的全貌。

带着走进《清明上河图》的心情，由右向左移动你的视线吧！

从荒郊野外开始

这幅画从悠闲的郊外风光开始，看到荒凉的田野、柳树、农家，感觉逐渐要接近“都市”。

突然间听到“哒哒哒哒”驴子的蹄声（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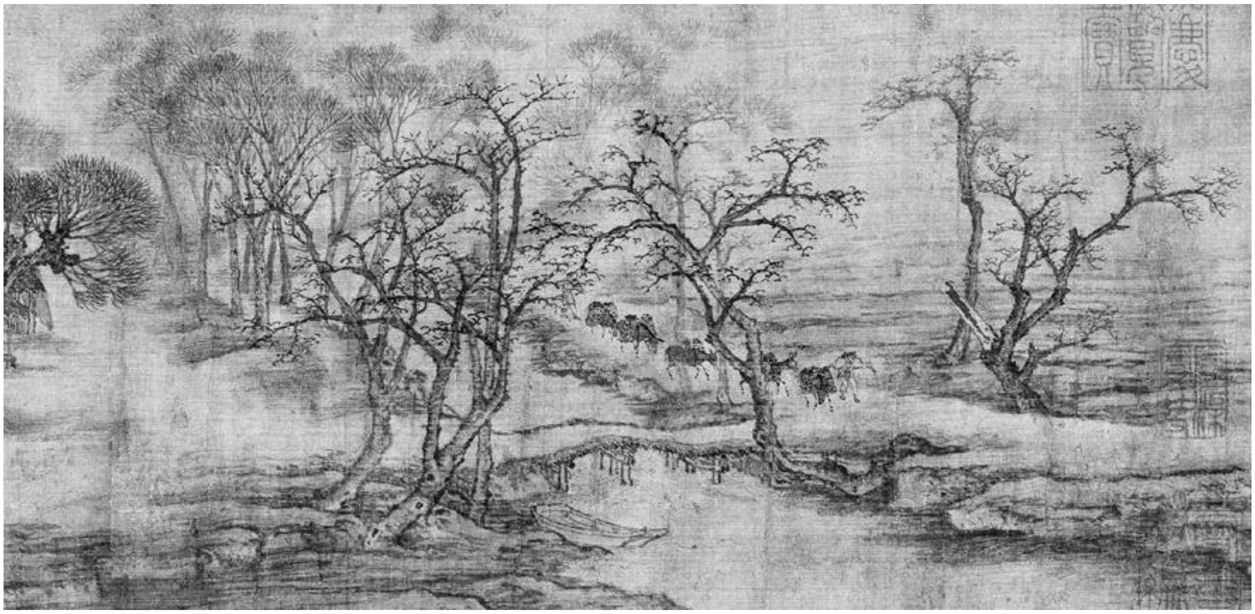


图**1**

从右边开始看这幅长达五公尺的《清明上河图》，首先看到的是五头驴子组成的商队，从荒野走进城里。

每头驴子上都负载着两大袋的货物。

道路两旁树上的叶子都掉光了，让人感觉到天气的寒冷。

驴子载了什么东西呢？有人说，没有叶子的树木象征“冬天”，驴子载着取暖用的木炭。如果这是清明时节，应该是不需要木炭的季节了。但是也有人认为，《清明上河图》里有很多餐厅需要木炭，不能说与季节无关。

沿着他们走过的小径，小河流水潺潺，架着简便的小桥。领头的牧童似乎已经骑着驴子渡河了，桥的后面出现村落，人烟稀少。一旁有六间左右的茅草小屋，还有猪舍。某户人家的横梁歪掉了，用建筑木材补强，但钉得不好，也显示了这一带居民生活的经济水准。

打开画卷之初，感觉到空气中的一股凉意，这与后面展现的热闹活力相比，令人留下强烈的对比印象。从这个地方看到作者的某种意图，充满想象的空间。

这也可从都市隐含的明与暗来看，展现丰饶与贫困的不同层次，让这幅写实画不仅只是描写街道的繁华。

接着往下看，缓坡的起伏，其中有农业用的水塘。八棵杨柳树看起来就要发出新芽，再仔细一看，杨柳的树干下方几乎没有树枝。很可能是因为当时正在修整汴河，砍下树枝作为堤防之用。

西边的杨柳下的茅草小屋，屋里有个商人模样的人，静静地等待客人。这间小屋的前方，两个看起来身份地位颇高的人物骑着驴子，带了三个仆人进来（图2）。头上戴着防寒的护具，穿着厚重的衣服。清明节是春天到访的节日，这里传达了“不像春天”的信息，也有人认为此时仍是寒冷的气候。

在驴子商队的上方，有一列抬着轿子的队伍（图3）。

这一行人中是由仆人担任前导，绣了几朵花的轿子里坐着一位女性，后方的仆人肩上挑着一些东西，看起来像是一家之主的男性骑着马。

北宋初期，轿子是一种奢侈的交通工具，据说按规定如果不是官

图**2**

图**3**

北宋初期，轿子是一种奢侈的交通工具，据说按规定如果不是官员，不能乘坐轿子。但到中期以后，富裕的商人也开始乘轿，规定就自

然而然地消失了。到了北宋末期，甚至连普通老百姓也可以乘坐轿子了。

当时，在清明节这一天，无论是王公贵人或是庶民百姓都忙着到郊外扫墓，大批人马出动，郊外也像市区一样热闹。

《东京梦华录》有关轿子的敘述是这样的：

> 轿子即以杨柳杂花装簇顶上，四垂遮映。

这句话证明了这幅画是描绘清明节的样子，因此可以解释称为“清明上河图”的原因。不过针对这一点，也有专家持不同的看法，我在前面已经介绍过。

有一头惊慌奔跑的马（或驴子？），在小屋前还有一只跳起来的驴子（图4）以及受到惊吓的客人。但是因为过去的修复和品质劣化的原因，马的上半身不见了。建筑物前的两头牛吃惊地张开大眼，看着“惊慌乱跑”的马。还有一个老人慌慌张张地抱着孙子，应该是担心会被暴冲的马儿连累。这个部分是《清明上河图》的第一个舞台，浮现动物与人一起生活，一半农村一半郊外的生活。

图4

小屋的后面有一片农地，栽种着蔬菜供城里的人们食用。但是好像没看到作物，而这附近也不像春天。有一口井用于灌溉，一个农夫挑着水桶向农村走去。

以上是《清明上河图》“第一幕”的概要。

汴河的热闹

“第二幕”的主角是汴河，这是《清明上河图》中最具震撼力的部分。从农村过来，画面下方开始出现汴河的滔滔河水，河边停靠着几艘船，看到挑夫们从船上运出谷子等货物。

郊外的风景和汴河的风景连接处，有着柳树，两艘木造船停泊着，架上踏板接上岸，船帆收起（图5），前面的一艘船已经卸货完毕，后

方的船上有船夫背着米袋上岸，地面上堆起米袋。

一个貌似老板的人站在米袋上，很有威严地叉腰，指挥船夫工作。这一带都是河岸边卸货的样子，这样的景致古今皆同。

沿河的路边上有四家店（图6），形成一排商店街。

正对面的店，在店铺前立了一根竹竿，两侧拉着绳子，挂了二十几面小旗。这是为了吸引客人而挂，现代也常常看到户外的餐厅用小旗装饰，也许是从这个时代开始流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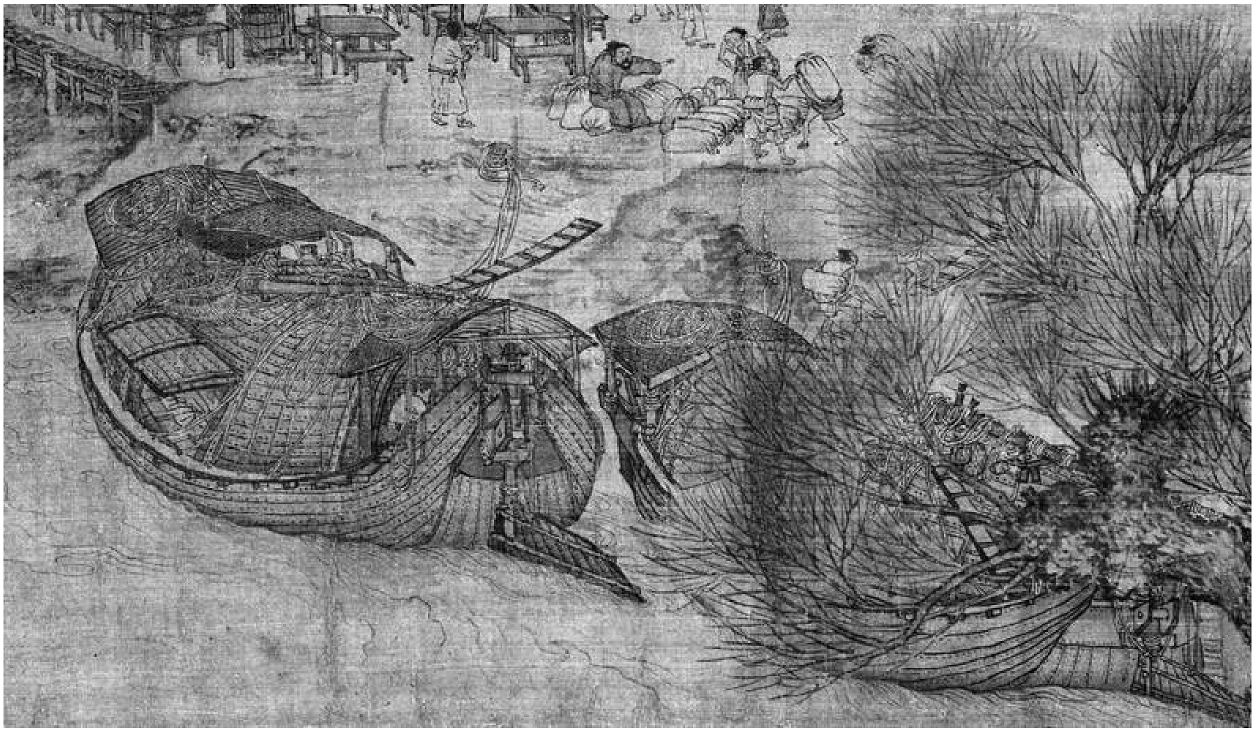


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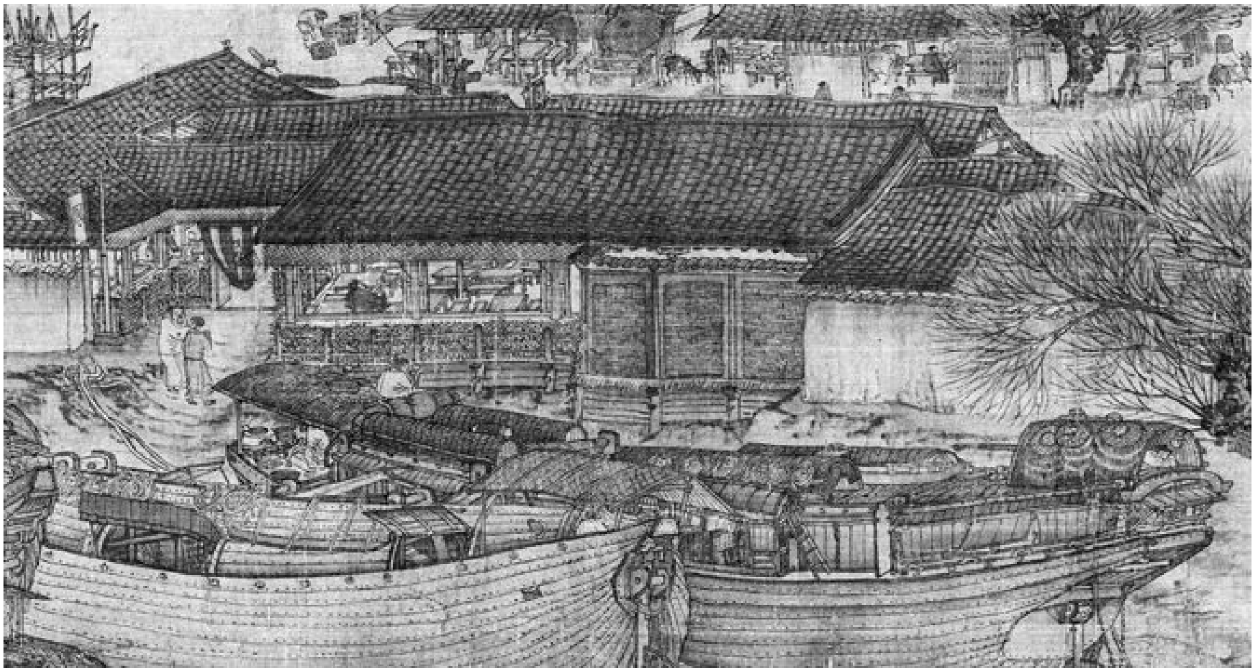


图6

其他的店铺在面河的位置设下座位，这样的店铺设计，到现在仍然沿用，但是图上看不到宾客的模样。《清明上河图》上餐厅生意清淡，几乎是共通的情况。可以推测是因为描绘的不是午饭或晚饭的时间。

另一侧则有店铺打出招牌，卖的是馒头。这样的街头小吃文化到现在都一样。另一家店挂出写着“小酒”的长方形招牌，门口立着一根长长尖尖的门柱。“小酒”就是一般老百姓喝的便宜酒，这在第三章已经介绍过了。

主要建筑的后方是中庭，栽种着树木，有个正方形屋顶的凉亭。里面放着长方形的餐桌，这里没有看到客人。还有一间店铺的招牌是“王氏纸马”。纸马是祭祖时使用的，用色纸扎成房屋的样子，扫墓时作为供品。招牌的意思是“王先生的纸马店”。纸马店开在这里，也可视为证明这幅画的季节是清明节。

在纸马店的西边有一条路往北走，带着两名侍从的骑马人物向北方慢慢前进。这条路上有两家餐馆，有几位客人。牛或是驴子也在里面吃东西。西侧还有一家小餐馆，门口放着菜笼。它的对面有块招牌图写着“年”。

往北有条大马路，东侧有个大餐馆，大门比较大，五面布旗当招牌。它对面的店门口停着一辆货车，有一匹马、两头驴拉着（图7）。好像看到车夫正在货物上写字，靠河边的另一家店里有四位客人正在聊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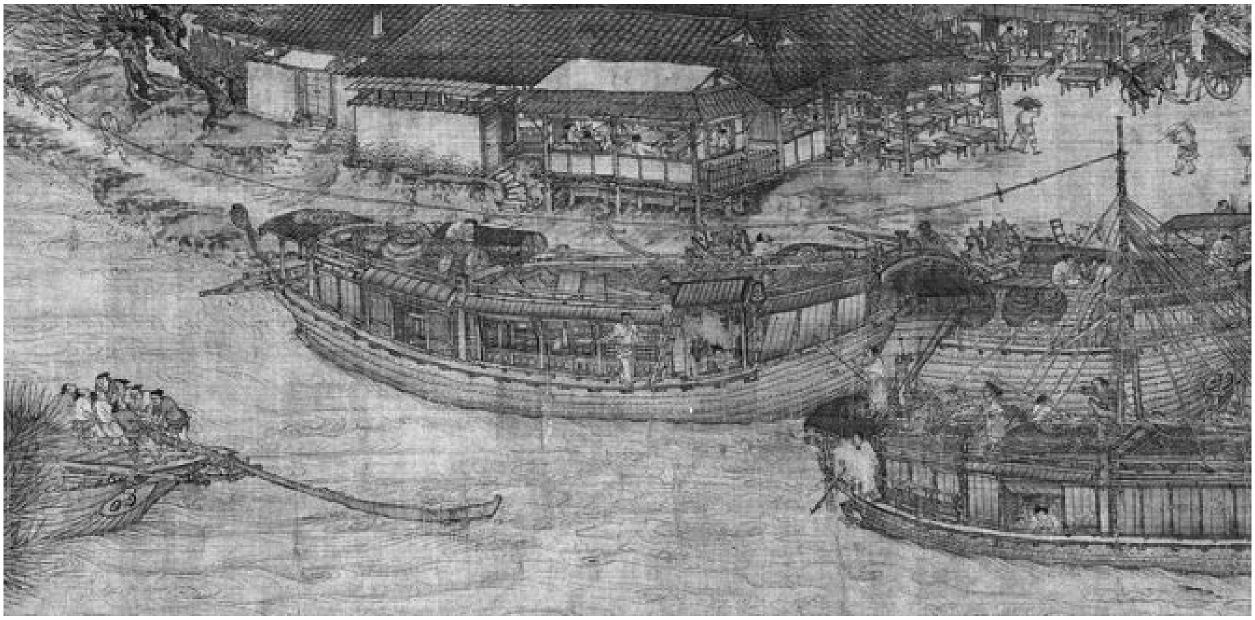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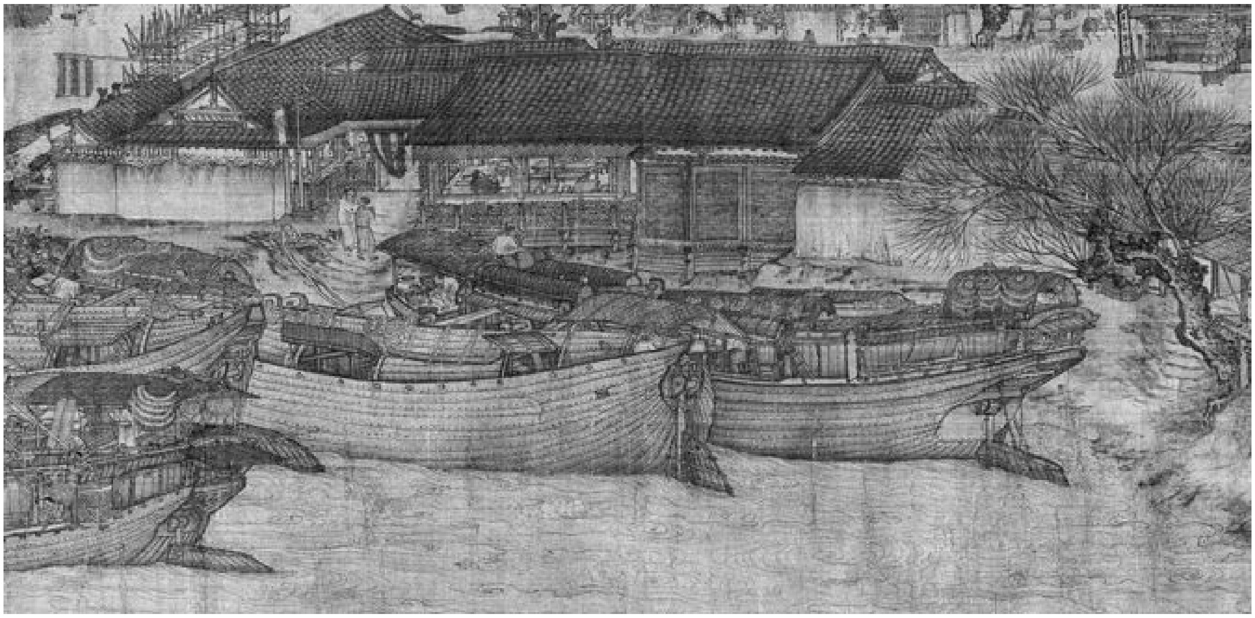


图7



汴河的岸边停靠有五六艘大型木船，靠岸的一艘船正在卸货，载的都是粮食。船夫背着粮食走小路，横越大马路。好像差不多卸货完毕，船夫们谈笑风生。

停泊在前方的大船，可以从开着的窗子看到船内的摆设，里面有餐桌、椅子，像是寝室的设备。形状像日本的屋形船，里面有座位。

有一个女人往外眺望，其他的船夫从船屋的屋顶往下走，船桅直挺挺的，船缆牢牢地绑在岸上的系缆桩，这些船大概是客船，客人都已经下船。

还有比这艘更大的船。船上有十一个人在工作。有个男人站在船头对着附近的船大喊，这个人大概是船长。其他人各忙各的，好像在进行什么作业。

有着大型船舵的船，船头不尖，呈现扁平的形状。运河上无浪，用于航海的船只必须要乘风破浪，所以船头是尖的。仔细看运送旅客的客船，每艘船都有细微的差异，从这里可以感受到张择端的用心。船的描绘极为精密，连钉子都一根一根画上去。

这段以船为主的描绘，非常融入生活，而且很写实。可以看出作者尝试如实画出汴河的所有动态。

河水渐渐流至画面的中央。零零星星看到航行于汴河的船只。在船头有八个人合力掌舵，为了怕撞到正面迎来的大船，船夫们紧张地把船开向南方（图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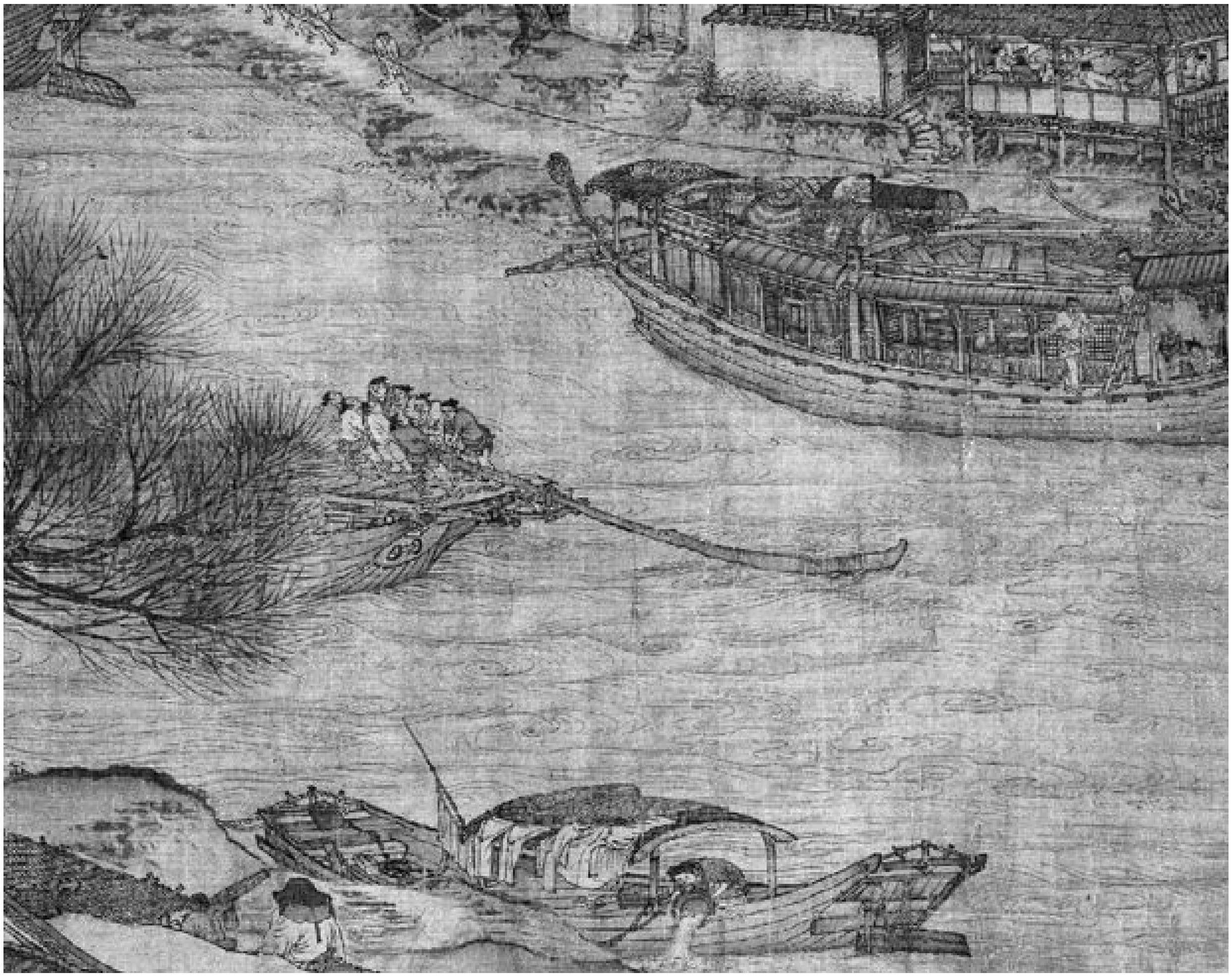


图**8**

南侧的岸边停泊着小船，船顶上晒着衣服，有个少年把水往河里倒，大概是煮饭所用的水吧。也许他们大半的生活都是在船上度过的。这种船是用来搬运或是近距离的载客之用。

不久之后，架在汴河的“虹桥”慢慢进入视线。

最高潮——虹桥渡桥

“虹桥渡桥”的风景可以说是《清明上河图》的最高潮（图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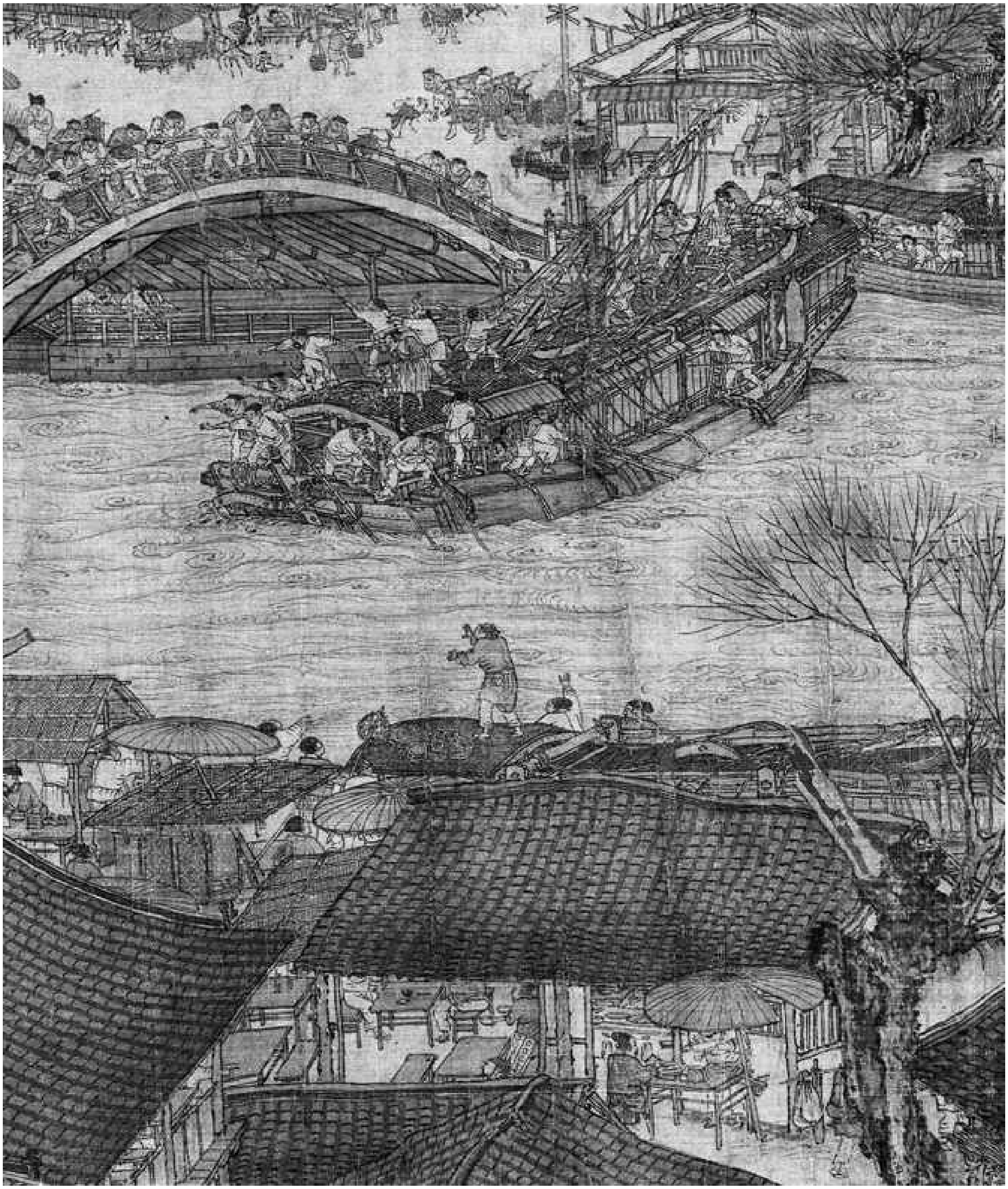
为了要让船只通过，虹桥没有桥脚。还有一个原因是，到了冬天，从上游会流下冰块。这种形状的桥称为“飞桥”。

画面上，有一艘船正要通过虹桥下，看到这个情景的人都捏了一把冷汗。

船体呈现歪斜，好像是为了能够通过桥下，必须以斜的角度才过得去；或是因为被意外的河流力量所冲撞——不管是哪种情形，情况一定都非常危急。

桥上有很多人围观大叫着，身子超出栏杆外几乎就要掉进汴河。大概是喊着“加油！”南边的岸上也有男人大叫着。

图**9**



从栏杆上有两个男人向船丢出绳缆，也有人从桥上伸出木棒。在船上也有人拼命想要接到这个绳缆和木棒，船上的人数达二十四人。

船员慌慌张张地把倒下的桅杆再立起来，带着小孩的中年妇女正大叫着指挥船员。这些乘客自己出来下指导棋，这是专业船员显露不出的趣味。

船是逆流前进，因此船尾有几个人往河里撑竿，用尽力气要修正角度。

这个船要通过桥下的景致是《清明上河图》最具震撼力的一幕，几乎是人们的一致看法。

这一幕也可以让我们知道汴河在北宋当时的重要地位。

船只航行河上，显示了水上交通的活跃。人们努力要让船通过，路人又拼命凑热闹。看到这幅景象，令人脑中浮现出以汴河为中心的北宋都市生活。

桥两边的店面

另一方面，还有行走在桥上的人们，对于船只过桥的骚动不以为意。

有人抬着箱型的轿子，有两个男人走在前面。骑马的官员从对面过来，也看到许多商人。

横跨南北两端的桥上，人们从两边不断涌入，看到的都是“人、人、人”。几乎可以说连站的地方都没有。

会觉得桥上很拥挤的原因之一是道路两边都开了店——有店面，也有摊贩（应该是违规的吧）。在桥头这边，有个男人为了叫住通行的人，拉着他的袖子。

仔细看，桥的四角都立了鹤型的棒子——这叫做“华表”，是中国建筑的象征。这幅《清明上河图》里，这座桥扮演着标示繁华大街的角色。

桥的南北两侧，商店密集林立。

特别是桥的南边，位于南北东西向的十字路口，人们往来通行的身影密密麻麻。

往东的道路，沿河有几家摊贩。有个客人坐在方桌前，店员正端菜过去给他。方桌上有个筷筒和汤碗。

对面还有几家店，其中一家放置着四脚的桌子。只有两个客人，店员正要拿碗过去。里面是厨房，可以看到。这附近的建筑物和前面的家屋一样，梁柱歪歪的。

桥的南边十字路口处，道路两旁各有一家店。东侧的店在门口旁边挂着两个雨伞作的小招牌，上面写着“饮子”。“饮子”是卖饮料的摊贩，有三个男人站在这个摊子前面，想要买饮料。

“饮子”的对面是“十千脚店”，是一家酒楼，也是餐厅。店门口立着一个用竹子组成的大型栌（图10），当成招揽客人的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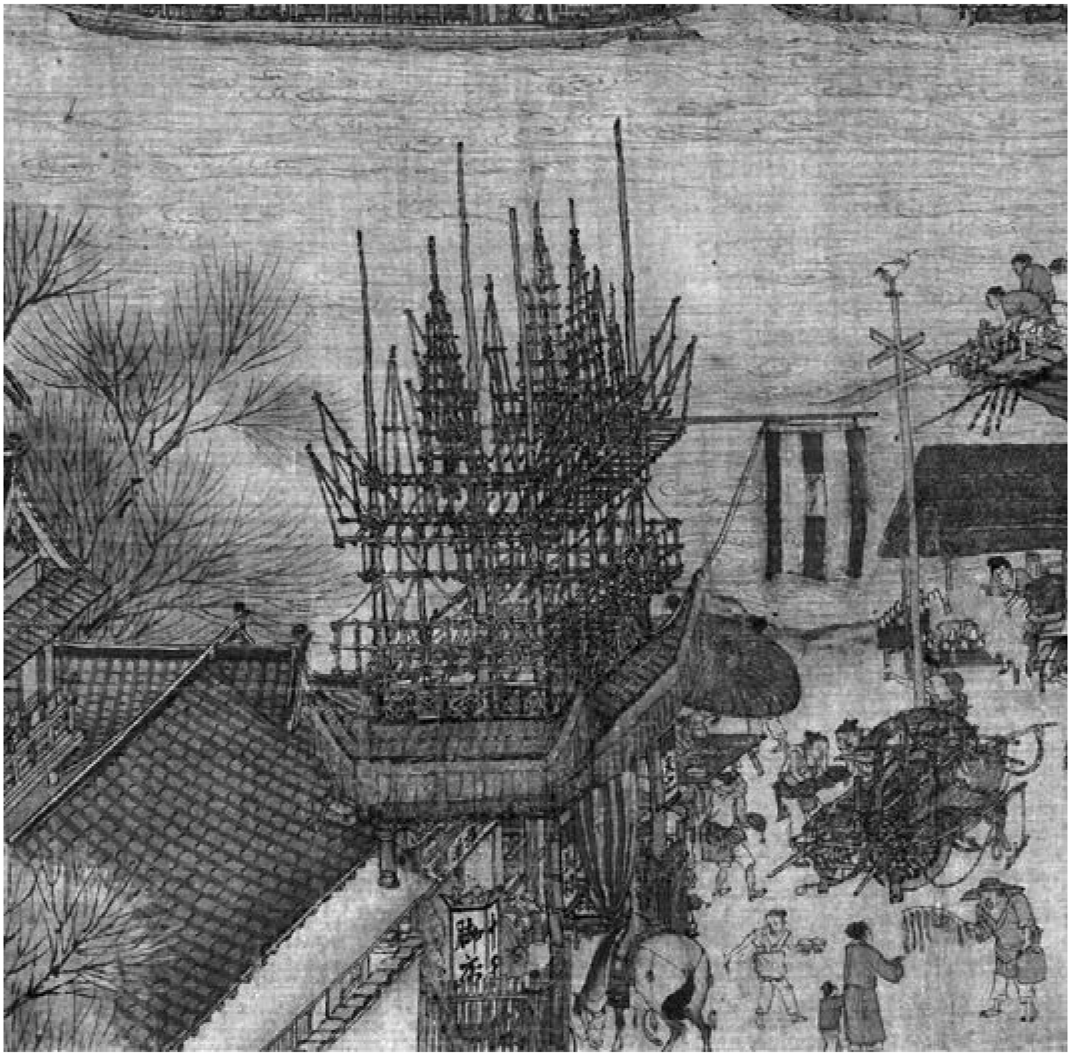


图**10**

上方突出的棒子挂着蓝白布，染出“新酒”两字。门的左右两边挂着一副对联，分别写着“天之”、“美禄”，随风飘逸。

这个栌，称为“彩楼欢门”。据说是后周太祖访视开封后就设立的，也可看出开封独特的风俗民情。木材纵横组合，装饰并不华丽，甚至露出木材接缝的地方。

看得到店里面有享受美食的食客，也有端酒的店员。这里的建筑物和之前的有点不同，屋顶的梁柱变得很直。感觉是过了虹桥以后的街

道，水准更高了一层。从这里开始的建筑物，梁柱大体都很笔直。

“十千脚店”的门口前系了一匹白马，店员手上拿着碗走出店铺。马路上有人在卖一串一串的东西，带着小孩的老人正在讨价还价。“十千脚店”前停放着一部大型的单轮车，伙计把东西都卖完了，拿着用绳子串起的铜钱。

还有一个人拿着成串的铜钱，从店里走出来，这家店是一栋两层楼建筑，可以看到里面有两桌摆满酒菜。

河水在虹桥之后，往北转了一个大弯就消失在画面。东侧的一艘船内，可以看到室内有东西。

河中央有两艘船行驶着。一艘顺流而下，站在船头的六个人掌着栌控制船，生怕船走偏了。另一艘船有一支桅杆，逆流而上。

汴河在开封这段相当湍急，人如果掉进水里就会被冲走。要逆流而上，想必十分辛苦。

到这里是第二幕，最后第三幕就是热闹的街景。

沿着汴河的南北向道路上，有三头载货的驴子走着（图11）。卖药的老人在路边席地而坐，把药摊开在地面上，十几个老人听着他说。说话的老人一定经验老到，如果讲得没意思是不可能聚集人潮的。

有一个人走在路中央，挑着装有食物的箱子沿街叫卖着“便宜卖喔”。

在这里，画面的重心从汴河转为贯穿东西的街道。

东西向和南北向的道路交会的十字路口特别热闹。四角形的桌子有九只脚，排了三排，但这里客人并不多。还有一匹低头吃草的马，侍从

在一旁照料着。当时开封也有业者专卖马的粮草，这些动物担负交通工具的角色，它们的粮食就相当于现代汽车的汽油。因此这些专卖店非常重要。

十字路口的南侧大马路上，有一群身份不明的人（图12）。一辆有车顶的车子，有两头牛拉着，侍从拿着鞭子指挥牛要转弯，中间有一个贵妇人；车后有个男人骑着白马，穿着长袍，戴着帽子，看起来像妇人的保镖或者丈夫。

图**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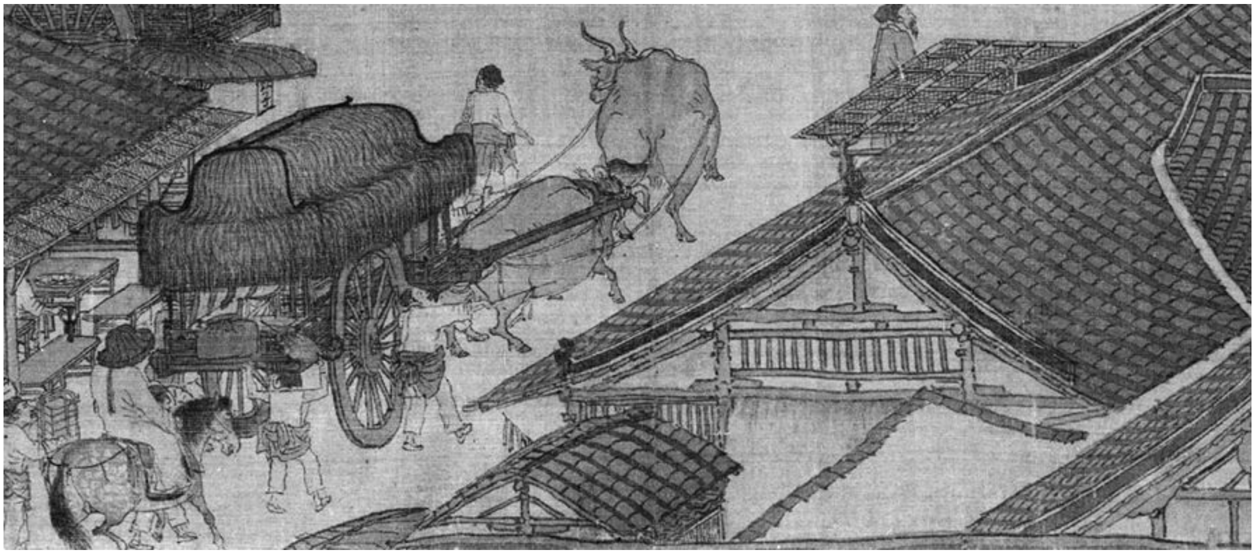


图**12**

东西向的大马路上，有很多马车、牛车。马路两旁都是餐馆，有家店里有三个客人正在喝茶聊天，一旁的客人静静地倾听。

马路北边有棵柳树，一个男人正舒服地进入梦乡。

后方还有间小房子，挂着“神课”、“看命”、“决疑”三个牌子，一看就知道是算命的店（图13）。

中间坐着一位穿着黑衣黑帽、打扮古怪的算命师，客人坐在对面听他占卜吉凶，后面还有三个人仔细听着算命师说话。

在中国，无论古今，占卜的形式没有太大的变化。

中文将占卜命运称为“算命”，说“看命”也通。“神课”是中国自古传下来的“六壬神课”，以天干、地支和天文组合出来的占卜方法；“决疑”的意思是“下决心”，因此牌子就是在说“以神课占卜你的命运，帮助下决心”。

西边也有一座小桥，过桥之后有一间像是官府的建筑物。有一座大

门，门外有六个像是官员的人，有的坐着，有的闲躺着，好像在休息。门上贴了告示，建筑物的中庭有一匹马趴在地上（图14）。描绘倦怠闲散的官府，可以解读出讽刺的意味。

图**13**

图**14**

再往西走，沿着河有南北向的小路，商店林立。河上架起跨河拱形的小木桥，桥的前方有一匹马，两台轿子，四个侍从，也有要乘马的人。看起来像是才刚出发要到远方去。

桥上有人抬着轿子。通水沟北边的树下，有三头驴子，都载着木柴。

旁边有一个妇人抱着婴儿，正看着车水马龙的热闹街景（图15）。妇人的附近有七头肥猪，让人感觉到在都市里还留有农村的景致。

北边有一间小店，有个人正拿着秤。小店的西边是寺庙，大门紧闭着。两侧有阿吽仁王像，守护着寺庙。东西两边的门是打开着的，穿着袈裟的僧侣朝着东方走，没有看到参拜者的身影。

寺庙的西边是两层楼的建筑，门前挂着五面布旗，应该是一间小餐馆吧。

看起来像是汴河支流的小河，岸边上种了很多柳树（图16）。树下有人在卖花和团扇，也有人正在询价。跨在河上的是平面的桥，看起来像观光客的人们手扶在栏杆上，专注地看着河流，好像在打发时间，看来不像是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

图**15**

图**16**

穿过城门的骆驼队伍

马路通往巨大的“城门”。这个门看起来是“坊门”（图17）。

坊门是为了限制各地之间的通行而设，与唐代不同的是，开封是不夜城，每个门都是全天开放的。

门的座台建得十分牢固，门的上部呈现水平，是东西向，门的上方有城楼，宽五间、纵深三间，有窗有栏杆。南面设了楼梯可以上下。

这里最有意思的是骆驼商队正要通过城门。三头骆驼载满丝绸和茶叶往城外走，领头的第一头骆驼正要穿过大门。

张择端借由骆驼从这里进来，成功地强调了市区街景的连续性。本来巨型的大门会切断观赏者的视线，骆驼商队的存在正好让视线从右到

左顺利移动。

门的东侧有拉车的二人组、拿着秤的男人、靠着城门正在谈笑的两个人、乘在马背上的贵妇，显现了都市生活的缩影。

南边的街道入口旁有一家理发店，一个客人正在修脸（图18）。大马路南边有家“曹三”的小餐馆，门前装了欢门，“曹三”意思是曹家的第三个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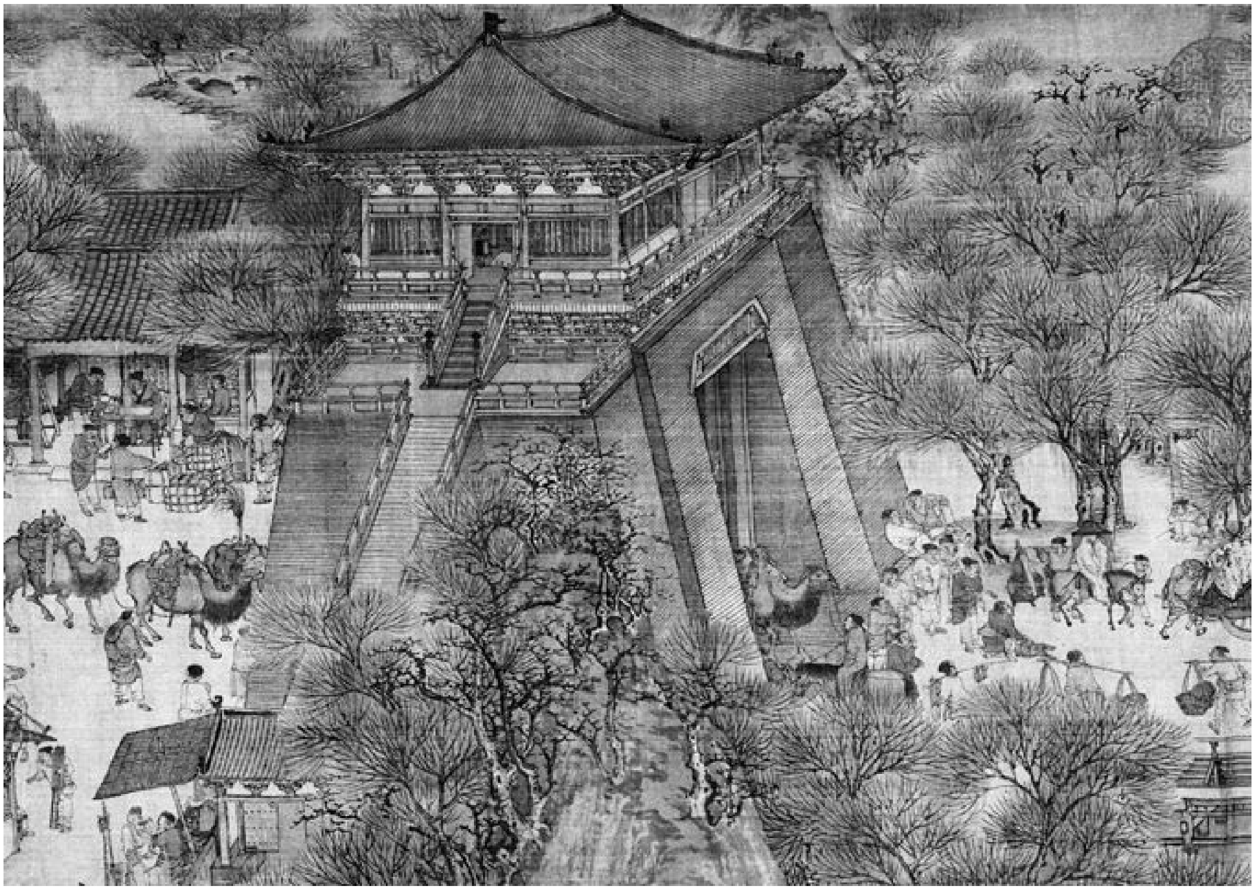


图**17**

图**18**

隔壁有个“李家输卖”的招牌，再往西边的招牌写着“久住王员外家”（图19）。中庭有栋较高的独栋建筑，二楼的墙上挂了两幅字画。还有一个男人正在读书。

“久住”是指长期居住的意思，可以看成是现代的商务旅馆。

将目光移向大马路上，进一步看到都市的多元层面。

中年男性骑着白马，一名侍从跟着走。两台轿子加上十三人的一行队伍往东行，前面的那台轿子正转弯向北，再往前看到“孙羊”的招牌，这是《清明上河图》首屈一指的“正店”，这一行人大概就是要去这家大型餐厅用餐吧。

进入“孙羊正店”就是其主建筑，这是由好几栋组合成的复合式建筑。店面豪华隆重，把其他餐馆都比下去了，有种鹤立鸡群的存在感（图20）。宾客满座，生意兴隆。东侧包厢的桌上摆着酒器，中间有个壶嘴很长的酒壶。

建筑物有个非常华丽的彩楼欢门。欢门上看不到柱子，招牌写着“孙羊店”显示店名，门前有木条型的栅栏围着。

图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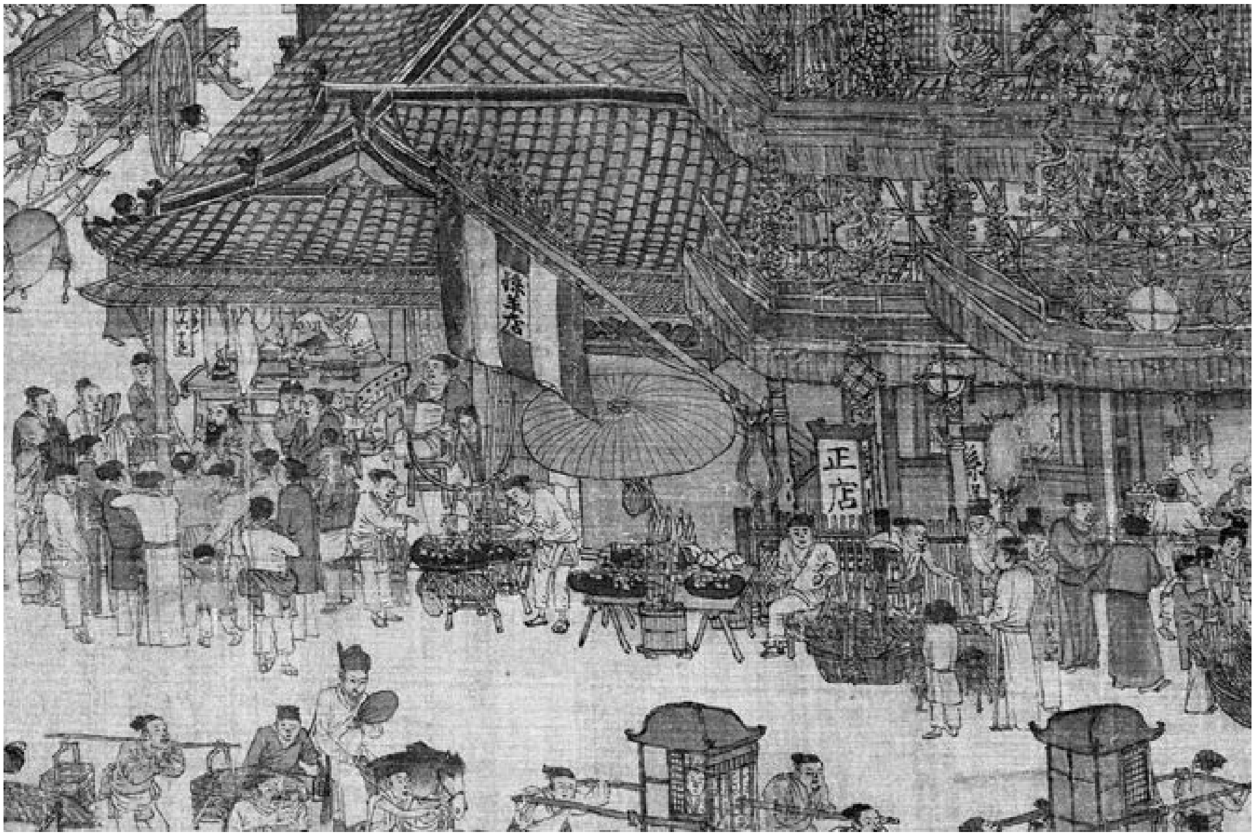


图**20**

店门口人来人往川流不息，看到运送食物的店员，也有卖竹艺品的商人，卖花的小贩，大胡子说书人对着大批围观听众滔滔不绝。

宋代是出版传奇小说、历史小说非常活跃的朝代。像这样的说书人在大街上讲小说故事，是一种相当盛行的商业活动。有名气的说书人通常都可以吸引很多的粉丝来听讲。

在说书人后方的建筑物，里面放了一张很大的书桌，有人正在低头工作。室内挂了一幅写着“六十”的布条，意义不明。

前面的十字路口，驴子拖着的货车上载有两个大酒桶（图21）。这里也有个说书人，坐着的听众听得入神。往南的道路上，有个白衣人正要骑上马，一旁是栋有屋瓦的建筑，立着两块遮阳板，挂着一块四方的

招牌写着“解”字。

对于这个“解”字，各方讨论意见很多，比较有说服力的是解读为现代的当铺。门下停放着一台轿子，室内摆了长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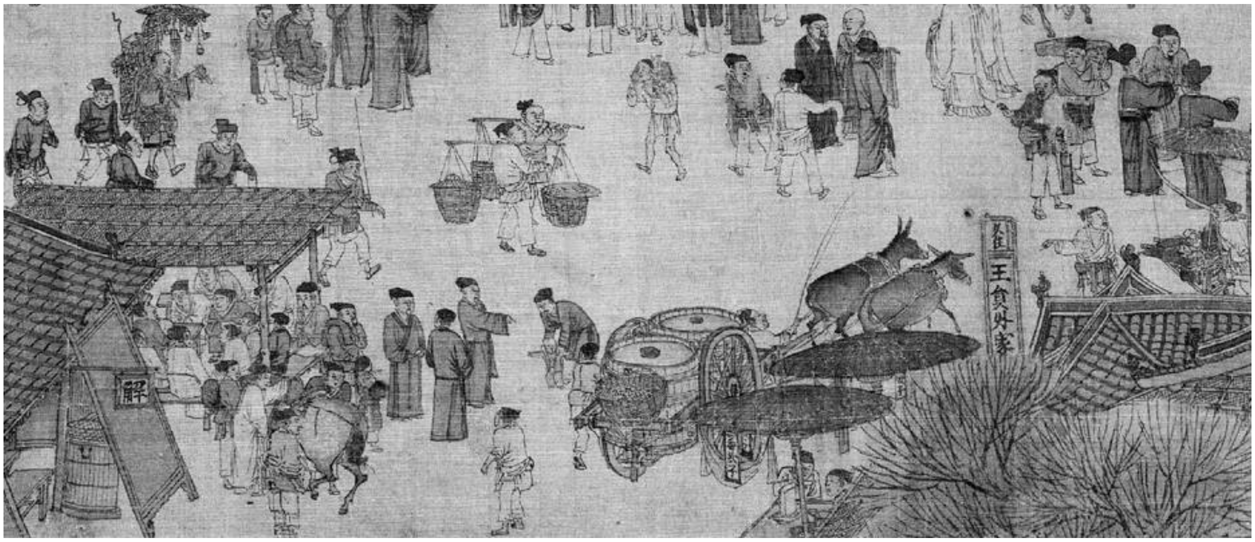


图**21**

十字路口北边的马路，两辆四头驴子拉的大车，往南走来（图22）。车上没有载货，看来是送完货回来的样子。马路的东边有一块招牌，但是招牌上的字看不清楚。它的北边有个“杨家应症”的招牌，大概是医院吧。

北边的道路往西转弯的地方，有卖馒头的小摊贩，想到古时候就有街头上卖馒头的，觉得有点开心。

往南有大型建筑盖着屋瓦，像是餐馆，招牌上的字看不清楚。

横幅的招牌是“刘家上色沉檀拣香”，是卖香的店，这家店的南边，有个小贩打起大伞遮阳，卖的是佛具。

十字路口往西的马路，柳树下有一口井（图23）。看起来好像有四

个人同时在取水，实际上只有三个人在取水。井的西边是药房“赵太丞家”，柜台前放着长凳，一位妇人抱着婴儿坐着。旁边有两名侍女正和妇人在交谈。

药房里有“五劳七伤回春图”、“大理中丸医肠胃丸”、“治酒所伤真方集香丸”等招牌，这是药品的广告，同时也在宣传疗效。

这家药房的隔壁房子，敞开着大门，里面有卷上来的门帘和屏风。门的西侧有两个人坐着，满脸胡须，穿着长袍，腰上系着细绳。

图**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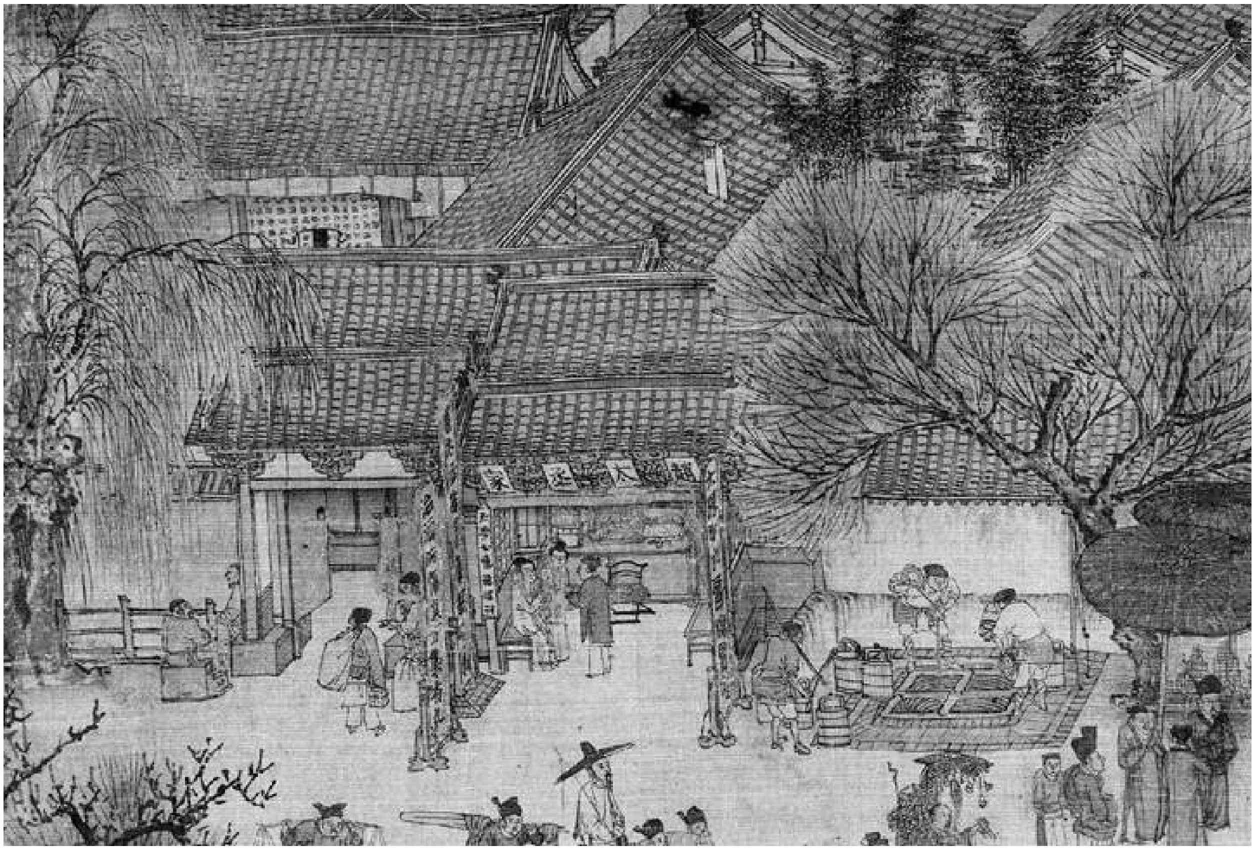


图**23**

画卷在此处突然结束。有人认为从这里开始有一部分不见了，也有人持相反意见，但是两边都没有确切的证据。

俯瞰的角度因地而异

综览这幅画时，我注意到在不同的地点，俯瞰的角度也不同。

一开始的村落风光，俯瞰的角度很小，连天空也都画进去了，感觉是从水平的视线看过去。再过来俯瞰的角度变大，然后变小，再变大，可以看出俯瞰的角度有着频繁的变化。

为了让虹桥、楼门等目标物看起来很大，俯瞰的角度变小，感觉好

像是从很远的地方看过去。而对于河上的船只、人们交织的画面，俯瞰的角度很大而且非常接近目标物，带出从画面上逐渐扩大的视觉效果。

这也证明了张择端不只是一个单纯描绘精密写实画的“画匠”而已，对于整体构图是经过缜密计算的，显示出他的技法高超。

体验“都市的形形色色”，包括开封大都会的广阔、汴河水运的繁盛、北宋鼎盛的商业气息，还有开封市民的消费生活等。看完这幅超过五公尺的画卷，张择端的用心与巧思历历在目。

第六章 现代生活中的《清明上河图》

会动的《清明上河图》

当我知道有这种机会观赏《清明上河图》时，二○一一年九月特别从日本来到中国台湾。季节正是闷热的晚夏，以前曾在台北担任报社特派员三年，我很熟悉这种气温。

《清明上河图》是“会动的”。

二○一○年中国举办了上海世界博览会，大会的主题是“Better City，Better Life”（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其象征之一就是在“中国国家馆”展示动画《会动的清明上河图》。

中国急速地摆脱贫穷、发展经济，要成为一个可以享受生活的中国。上海世博会就是要让世人看到富足起来的中国，在多彩的展示馆准备展览、影像及服务，以欢迎到场嘉宾。

其中尤其是试图展示中国威信的中国国家馆，采用代表中国的红色，以“东方之冠”的意象，设计出倒金字塔的斗拱建筑，备受瞩目。

总造价高达两百七十亿日元，完全采事前预约方式进场，每日预约人数上限为五万人，必须是团体才能预约，一般的观光客无法进入。中国国家馆的主题是“都市发展的中华智慧”，以长达一百二十八米的大型银幕，上映《会动的清明上河图》。

展现最尖端的科技

这部《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是由水晶石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开发。

这家公司总部设在北京，创办人卢正刚毕业于南京工业大学建筑学系，目前担任该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二○○七年，上海世博的中国国家馆标案正式公开招标，包括水晶石科技在内的十几家公司投标，其中有将近一半公司的企划案以《清明上河图》为主题。

思索以最尖端科技表现“中国”或“中华文化”时，多数的公司会想到将《清明上河图》当作图腾象征。

中国上海世界博览会中国国家馆

卢正刚曾在上海东方卫视节目《财富人生》（二○一○年七月二十四日播出）中提到，他选择《清明上河图》为题目的理由：

> 《清明上河图》本身就传达了古代都市的一个篇章，把宋代最为繁荣的都市情景浓缩在一个画面里。上海世博的主题就是“城市”，因此相当吻合。这也是为什么这么

多的公司都选择了这幅画作为主题。

各家公司为了取得标案，无不运用各种创意和技术。水晶石数字科技运用了“根雕”这项传统工艺来诠释《清明上河图》，该公司也拥有处理数字影像的领先技术，这是其他公司无法匹敌的。

“用影像来重新呈现《清明上河图》的时代”，这是卢正刚的初衷。再把《清明上河图》中出现过的六百个人分为十二类，如“车夫”、“士大夫”、“说书人”、“小贩”、“旅人”、“女性和小孩”等，确定四十八种登场人物之后，进一步详细分析张择端的人物描绘方式，发现有着人物的头部比较大、斜肩等特征。

全图分为七个部分，以六千张图构成。耗时两年，动员两千位技术人力，制作成四分钟的《会动的清明上河图》动画。

动画分为白天版和夜晚版，原画就是描绘白天活动的样子，夜晚版加上电影的手法，更加展现了都市活力。虽然是电脑动画，但是影像相当逼真。

在台湾的展场是运用原来举办世界花卉博览会（简称“花博”）的建筑物，花博在八月底结束后，九月上旬在台北上映《会动的清明上河图》，十月至十二月移到台中。

因为想在台北看，特别利用周末飞到台北。

老实说，我原来想象这不过是部《清明上河图》的动画版而已，但台湾的朋友很兴奋地告诉我“内容相当不得了，一定要去看”。

先讲我的感想：跑这一趟真的太棒了。

到了傍晚，进入会场时，正在举办“入场六十万人次纪念活动”，大批媒体正在访问主办单位，最后总计是超过六十五万人次入场。

令我最惊讶的是台湾人静静地驻足在会场中，认真地观赏《会动的清明上河图》。

在我的认知里，台湾人对于艺术品的兴趣并不高，多半是为了赶潮流就去看一眼，随便看看就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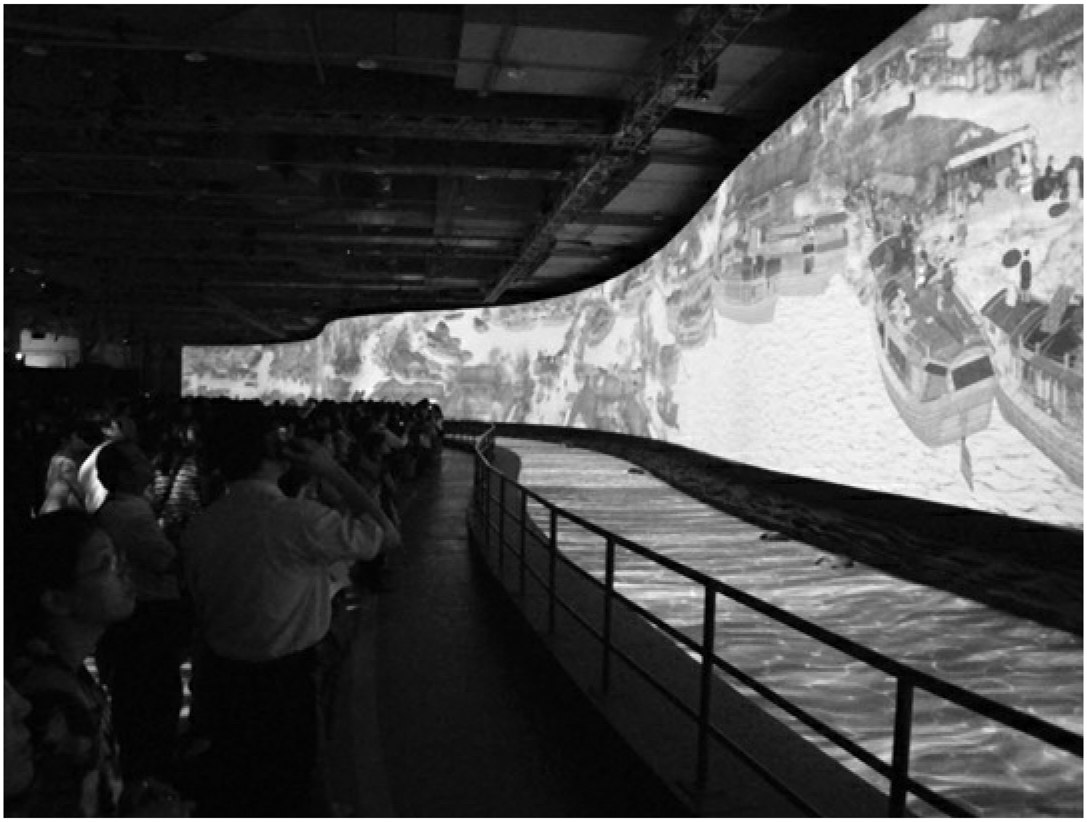
但是这次完全不同。观众被《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深深吸引，一次又一次重复欣赏四分钟的动画影像。

有对情侣坐在地板上看得入神，我在一旁听到他们的对话，并不是在讨论画中的人物，而是在聊天，就像是在天文馆里看星象的感觉。

我也加入人群坐了下来，靠在墙上，观察台湾的民众们凝神观看《会动的清明上河图》。

从白天转换到夜晚，画面的氛围马上改变，在这一瞬间，会场内的民众发出赞叹声。接着水流的声音、马蹄的声音、走路的脚步声，不绝于耳。

长达一百二十米的大银幕，从右往左慢慢移动，观众可以充分欣赏《会动的清明上河图》。



台北展出的《会动的清明上河图》（作者摄影）

我看到这个景象后，终于了解为何《清明上河图》会有“中国的国画”之称。

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清明上河图》并不能归类为一流的绘画作品。与主流的文人画和山水画相较，这幅画不过就是写实描绘城市街景，看不到作者的想法或是反映出他的心境，因而可能被当成“二流作家画出的通俗画作”。

虽然如此，由于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市井小民强力支持，这幅画提升到“国画”的地位。

台北展出的《会动的清明上河图》虹桥部分（作者摄影）

人们为什么喜欢《清明上河图》，原因就在眼前。

《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不是充满空灵的山水湖泊，而是杂沓的人间生活与社会实景。工作、吃饭等日常生活就在这里，画中的人物也代表了自己。因此容易投射感情，触动想象的空间。

我在会场问了几个人的感想。有个二十几岁上班族女性的回答，最让我印象深刻："如果不会动，我是不会来看的。看了以后才知道这幅画这么有趣。"

原来如此，《清明上河图》是这样的一幅画。

专家的千言万语，恐怕也难传递这幅画的魅力。

去看、去感觉、发现趣味，这就是欣赏《清明上河图》的方法。

中国绘画的发展上，宋代以表现文人崇高心境的山水画为主流，否定了写实临摹自然景观或人物。基于敏锐的自我内省至极限，发展成为世界观，确实令人赞叹不已——但却排除了泥土上的人间社会百态，欠缺了浅显易懂的“喜怒哀乐”。虽知山水画的好，但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理解精英社会的精神世界，更谈不上喜好了。

这也是世界共通的疑问：什么是名画？

在中国的绘画史上，《清明上河图》的艺术评价并不是太高，却在现代因为人们的喜爱而拥有“中国第一画”的称号。

如果站在“人们喜爱的画就是名画”的立场来看，《清明上河图》当然是中国史上最棒的作品，这幅画发射出“生命”的极光，持续吸引着我们的目光。

诸多未解之谜

我要再次强调，《清明上河图》的魅力仍在于它是“充满谜题的画”。

写到这里，画作的谜题几乎还是没有揭晓答案。

张择端是谁？

《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是哪个季节？

这幅画是在哪个时代画的？

画的是开封的什么地方？或根本不是开封？

是要画清明节的情景？还是天下太平盛世？

画的标题真的是“清明上河图”吗？

北京故宫的《清明上河图》真的是真迹吗？

无论是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或是日本，没人可以百分之百确定这些疑问的答案是什么。

最近几年来，对于不同的谜题也有人提出新的见解，形成讨论的话题。

例如，关于画卷的长度，原来是认为画的后半部分散佚了——热闹的街景突然被打住就结束，看起来很不自然。

中国的权威学者们也都支持散佚说，只是凭着“看起来像是这样”，其实并没有资料、文献或是跋文的有力资料证明。

散佚说虽然成为一般论，但在二○○七年时为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清明上河图》出借至香港展览，偶然有人发现“张择端密码”（不是“达·芬奇密码”），提出了散佚说的有力反证。

《清明上河图》的长度是五百二十八公分，连同跋文的空白部分在内，最少需要十米长的玻璃柜。但是香港艺术馆没有这样的柜子，紧急从英国订制了两个相同尺寸的玻璃柜，在展览现场组装。

两只柜子并在一起时，接缝处有一条线，调整照明的光度时，司徒元杰馆长在现场发现了一件事。

五百二十八公分画卷的正中央，大约是在二百六十四公分的位置，而两只柜子的正中央也落在二百六十四公分之处，在灯光照明下，出现了柜子接缝处的一条阴影线，正好落在画卷的最高潮——虹桥的桥顶。

司徒馆长下了一个结论：“虹桥落在画卷的正中央，很可能是张择端精密计算出来的设计，中间线落在虹桥的桥顶，并非巧合。”

的确宛如电影《达·芬奇密码》中兰登教授发现隐藏的密码，充满戏剧性。原来就知道虹桥位于画的中央，但是令人意外的是——竟没人说过从尺寸正确丈量的角度去发现中心位置。

除了“二分法”外，中国民间研究人员也以“十二分法”来证明没有散佚。

十二分法是以四十四公分宽为一个部分。

从右边看过来，第一部分是郊外的荒野，第二部分是农村，第三部分是从农村突然转换为街景。

第四部分开始出现汴河，绘画的主题转移到汴河。第五部分则以河和船为中心。第六部分是整幅画的中心点，刚好到了虹桥要结束的地方。

第七部分是桥，第八部分汴河消失，又以街景为主。第九部分和第十部分都是热闹的市街，第十一部分还是街景。第十二部分以南北向大马路作结束。

照这样看，的确是分割为十二个部分，每一部分都蕴含主题，悉心考虑构图的配置。

包括北京大学教授杭侃的“完整说”（曾在前言介绍过）在内，最近反驳“散佚说”的势力有增强趋势。

但是这样的新主张，说服力还没有强到可以完全打败“散佚说”。说不定明天世界上又有某人提出有力的论证。

有关《清明上河图》的客观文献明显不足，专家虽然提出见解，仍然不出“推论”的范围，很快又有另一个说法出炉。《清明上河图》真是“以谜养谜”，把它形容为一部侦探小说也恰如其分。

回过头来说，谜题之多，也绝对无损于《清明上河图》的价值。

反而是谜题越多，人们越有兴趣，就像捕蛾灯一般吸引各种昆虫自然而然地靠近，我也是其中一人。

来历的趣味

《清明上河图》的“来历”充满趣味，也是其重要的魅力之一。

近来的艺术品拍卖会上，“来历”备受重视。艺术价值在另一个空间中，一件作品的历程与人同步进行，找到共同连带感。曾经听过拍卖公司的专业人员表示，有“来历”会抬高得标的金额。

我在第一章中已经详述了《清明上河图》的“来历”。在中国，具有类似“来历”的艺术品还有几件。

中国最早画在纸上的绘画《五牛图》，是件一百四十公分的画卷，五头牛充满张力，是唐代韩滉的作品，现收藏于北京故宫。

北宋徽宗很喜欢这幅画，它和《清明上河图》一样卷进战乱，数度在宫廷和民间流传着。到了清代，收藏于宫中。一九○○年因为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被盗，后来被某位香港的富豪买下。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这个香港人因为企业经营不善，打算以十万港元的底价在拍卖会上卖出，这个消息传到了中国总理周恩来的耳中。

周恩来向党中央报告，指示文化部派专家去鉴定真伪，经过交涉

后，成功以六万港元买回。这段故事成为周恩来总理的佳话，迄今仍流传着。《五牛图》的知名度也因此大大提高。

最近的艺术品中，因为“来历”而成为新闻话题的，首推元代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这是元代四大画家之一的黄公望于晚年所作的山水画，在中国水墨画中评价极高。

原来是将近七公尺的画卷，清代的拥有者是吴宏裕，大约在一六五○年时他在遗嘱上交代死后将画一起火葬。结果画虽丢进火中，他的儿子吴静庵却突然改变主意把画救出，躲掉了烧毁的命运，靠近卷头的部分烧掉一些，因此分为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

其后，比较短的前半部分被取名“剩山图”，流落民间，最后收藏在浙江省博物馆。后半部分是主要的画作，收藏在清朝宫廷，跟着蒋介石被运到台湾，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收藏品。

二○○八年台湾马英九政府上台后，两岸关系极速改善，展开密切的文化交流。原来失散在大陆和台湾两地的画——《富春山居图》二○一一年在台北举办了历史性的联展。两部分的画在分隔三百六十年后重逢合一，在熟知这幅画历史的华人圈中，引起广大反响。

无论是《五牛图》或是《富春山居图》，都在千钧一发之际躲过散佚的命运，至今留存着，引发中国人无限的共鸣。套句经常听到的话是“古物有灵”——古物有神灵保佑着它。

能和《清明上河图》匹敌“来历”的艺术品，可以说几乎没有。

对于普罗大众的吸引力、解谜的乐趣，以及惊涛骇浪般的历史，这三项优势都让《清明上河图》获得压倒性的胜利，因此同时拥有“天下第一画”和“天下第一奇画”的美誉。

结语

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与《清明上河图》结缘的那一刻。

那是发生在二○○七年的香港。当时我被派到台湾担任特派员，正好到香港出差，为纪念香港回归十周年，香港艺术馆正在展出《清明上河图》的真迹，引起很大的反响。

我自认是香港通，二十岁时曾在香港中文大学留学过一年，此后几乎每年都去香港，足迹遍及大街小巷。对于香港人的思考方式大概摸得一清二楚，可以让性急又现实的香港人排队等候的，应该只有名牌的拍卖会或是到知名餐厅吃饭。

为了看《清明上河图》要排上四五个小时，每天都有长长的队伍，着实让我吃了一惊。因为忙于工作，我自己没去排队，但是有站在香港艺术馆前，好好地观察“香港人的排队”。

对中国来说，《清明上河图》是足不出户的名画。拿出北京故宫之外的仅有两次，一次是二○○二年到上海博物馆，另一次是二○○四年到辽宁省博物馆。因为《清明上河图》是北京故宫从辽宁省博物馆“抢来的”，当辽宁省博物馆重新整修后提出借展的要求时，这个当年欠下的人情不好不还。

宋代的画已经相当古老，接触到外面的空气会加速劣化，因此尽量不出门，可它却到了高温潮湿的香港。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对内地来说不是国外，但属于“境外”。“境外”就是“本体之外”。在制度上，内地人

要去香港必须取得许可证。

《清明上河图》首度“境外展出”，这让香港人非常兴奋。

这个巨大效果应该会让中国的领导阶层感到欣慰，他们希望展现香港的治理是多么成功。

之后再听到有关《清明上河图》的消息，就是在二○一○年的上海世博会，这场博览会是中国向世界宣传经济发展成就的场域。这次用的不是张择端的真迹，而是在中国国家馆展示动画《会动的清明上河图》。

《会动的清明上河图》后来也到了澳门、香港等地上映，二○一一年两岸关系迅速改善之后，也到台湾上映。《会动的清明上河图》的版权是上海世博公司拥有，在台湾吸引大批游客，对于主办单位而言是个可以回收成本的生意。

在台湾上映《会动的清明上河图》，也是个可达宣传两岸关系改善之效的大好机会，对于大陆及台湾两方都符合其政治目的。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政治运用《清明上河图》的情形更加积极。

我不是美术或艺术方面的专家，但持续关心着政治与文化的关联性。

在中华世界里，文化的领域脱离不了政治，两者极为密切。国家权力经常将文化作为统治工具之用；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文化须有政治的庇荫才能得以蓬勃发展，关系极其微妙。

因为对此议题的持续关心，我以分别存在于两岸的故宫为焦点，写了《两个故宫的离合》一书（日文版于二○一一年六月由新潮社出版；

中文繁体版已在二○一二年七月由联经出版）。在采访的历程中，或多或少积累了一些中国艺术的相关知识，正在思考针对《清明上河图》写点综合性的文章，勉诚出版社的冈田林太郎先生就在同一年的夏天邀请我写本入门书。

《两个故宫的离合》描写巨大博物馆收藏文物所历经的曲折历史，从宏观角度解析中国的文化与政治关系。而本书则是从一幅画谈起，捕捉丰富动荡的历史、宋代的繁荣、画作真伪的辩论以及政治运用的实况。

从这层意义上来看，两本书可以说是以不同的手法来论述相同的议题。

写作当中，正巧当时北京故宫决定在二○一二年一月至二月间到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大型展览，以纪念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各界对于中国文物的兴趣提高，本书出版时很侥幸遇到这样的时机。

我也利用周末假日到了很多地方，包括《清明上河图》的舞台河南省开封、《清明上河图》被“再度发现”的辽宁省沈阳、上映《会动的清明上河图》的台北，以及现在收藏《清明上河图》的北京故宫博物院。如果只是按照已经出版发行的资料来写，好像略显不足。因此作为媒体人的我，是从各个采访中点滴累积催生了这本书。

写作的过程中曾向日本、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等地多位相关人士请益，包括全世界最了解《清明上河图》的人之一的伊原弘先生，本书才得以出炉。

曾经看过《清明上河图》的读者们，如果想要知道更多有关这幅不可思议、谜团重重、魅力十足的画作，建议您可把本书当作知识的入口。身为作者，备感欣喜。

二○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于台北旅次

参考文献

中文图书

董作宾：《清明上河图》，大陆杂志社，一九五八

那志良：《清明上河图》，台北故宫博物院，一九八一

刘渊临：《清明上河图之综合研究》，艺文印书馆，一九八三

李程远：《清明上河图传奇》，世一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二○○二

薛永年：《中国绘画欣赏》，五南图书出版公司，二○○二

《谁“动”了清明上河图》，明报出版社，二○一○

曹星原：《同舟共济》，石头出版社，二○一一

杭侃、宋峰：《东京梦清明上河图》，香港商务印书馆，二○○七

傅抱石：《中国绘画变迁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八

杜金鹏：《国宝》，长江文艺出版社，二○○七

辽宁省博物馆编《〈清明上河图〉研究文献汇编》，万卷出版公司，二○○七

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文史馆：《杨仁恺纪念集》，辽海出版社，二○○八

中国国家博物馆：《文物宋元史》，中华书局，二○○九

陈诏：《解画清明上河图》，世纪出版，二○一○

徐光荣：《国家鉴定大师杨仁恺的传奇人生》，中国文史出版社，二○一○

中文论文

《清院本清明上河图中的小镜头》（《故宫文物月刊》一九八四年九月号）

童月娥：《稿本乎！摹本乎！清院本清明上河图的孪生兄弟》（《故宫文物月刊》二○一○年五月号）

张临生：《细读清明上河图》（《故宫文物月刊》二○一一年八月号）

日文图书

篠田统：《中国食物史》，柴田书店，一九七四

张競：《中华料理的文化史》，筑摩新书，一九九七

竹内实：《中国历史的旅行》，朝日选书，一九九八

伴野朗：《消失的中国秘宝》，讲谈社，一九九八

后藤多闻：《两个故宫》（下），NHK出版，一九九九

《清明上河图》，故宫博物院（台北），一九九九

伊原弘编《读清明上河图》，勉诚出版，二○○三

《中国的美术》，昭和堂，二○○三

周藤吉之、中岛敏：《五代和宋朝的兴亡》，讲谈社学术文库，二○○四

古原宏伸：《中国图画的研究》，中央公论美术出版社，二○○五

半田晴久：《美术与市场》，立花出版，二○○七

伊原弘：《中国城市的形象》，勉诚出版，二○○九

日文论文

杉村丁：《清明上河图》，（《博物馆》一九五八年七月）

郑振铎：《清明上河图的研究》，（《国华》一九七三年六月号）

小野胜年：《故宫博物院和清明上河图》，（《佛教美术》一九六九年十二月）

古原宏伸：《清明上河图》，（《国华》一九七三年二、三月号）

木田知生：《宋代开封和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史林》一九七八年九月）

新藤武弘：《都市的绘画》，（《迹见学园女子大学纪要》十九，一九七八年九月）

杨伯达：《试论、风俗画、宋张择端笔“清明上河图”的艺术特色与

位置》，（《国华》一九八七年十月）

小泉和子：《清明上河图为什么女子很少》，（《月刊》二○○○年二月号）

高村正彦：《中国中世纪的都市和建筑——解读清明上河图》，（《城市社会的分析构造》二○○○年十月）

田中传：《清明上河图》——转换期绘画的诸项》，（成城大学院修士论文，二○○五年）

田中知佐子：《寻找亚洲美术》，（“大仓典藏品对亚洲的憧憬”展，东京大学出版社，二○○七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谜一样的清明上河图：精致版/（日）野岛刚著；张惠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8

ISBN 978-7-5097-6252-3

Ⅰ.①谜… Ⅱ.①野…②张… Ⅲ.①《清明上河图》—研究 Ⅳ.①K244.03②J212.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54672号

谜一样的清明上河图（精致版）

著者/〔日〕野岛刚

译者/张惠君

出版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100029

责任部门/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010）59367004 责任编辑/段其刚 张骋

责任校对/王秋霞

电子信箱/bianyibu@ssap.cn 责任印制/岳阳

项目统筹/段其刚 董风云

经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7

版次/2014年8月第1版 字数/125千字

印次/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6252-3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13-6273号

定价/39.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在《清明上河图》问世至今的上千年历史中，『五度入宫，四度出宫』『靖康之变』『中日战争』，严嵩，溥仪……多少历史事件、多少历史人物伴随其左右？甚至有传言说，《金瓶梅》的诞生也与这幅名画的身世有关。《清明上河图》经历了怎样惊涛骇浪般的历史，卷入了哪些麻烦？最会讲故事的媒体人、日本知名作家野岛刚新书《谜一样的清明上河图》为您讲述名画背后的流转故事。

ISBN 978-7-5097-6252-3

定价：39.00元

www.ssap.com.cn